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朱德周恩来胜利指挥第四次反『围剿』

我们随万里在农村改革前沿搏击

孙中山的民主思想

邓叔群：开创大西北生态林业的先行者

从历史的深层看日本

2001/

10

总第 115 期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庆祝《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

求实创新，
毋忘历史，
面向未来。

祝贺《炎黄春秋》
创刊十周年！

王蒙 2000年4月15日

刘宾雁
2001.2.5日

实事求是	立刊之本
说真话	刊真文
冲破阻力	赢得人心
锐意进取	永世长存

《炎黄春秋》十年大庆的回顾与前瞻

李庄 二〇〇〇年三月

誉人不增其美
毁人不益其恶

祝

《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

李昭敬贺
二〇〇〇年三月

炎黄春秋 十年大庆
历史的唯一基础是真实，
没有真实便没有一切。

曾彦修拜贺

炎黄春秋

专 稿

2 我们随万里在农村改革前沿搏击……………张广友

春 秋 笔

10 辛亥革命断想:政治自觉与学术自觉……………张岂之

14 孙中山的民主思想……………杨天石

18 为宪政流血的“第一人”宋教仁……………贺 渊

22 辛亥革命前后的梁漱溟……………汪东林

英 杰 谱

26 邓叔群:开创大西北生态林业的先行者……………黄 俭

求 实 篇

30 朱德周恩来胜利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度 平

36 黄克诚被诬的“黄金案”始末……………易知难

38 顶着风浪为武训辩护的郝瑞琛……………李公天

古 今 谈

42 从历史的深层看日本……………武 寅

46 戴罪功臣林则徐……………梁 衡

陨 星 篇

50 “未名社”成员赵赤坪烈士……………天国 锡九 韦顺

55 何功伟烈士留给我的记忆……………吕 鸿

文 荟 苑

58 茅盾在作协往事……………涂光群

62 地下影人的重庆回忆……………钱筱璋遗作

人 海 浪

66 邓小平之弟邓蜀平的故事……………尹 骐

70 解放前夕谢筱迺在福州作地下工作……………许翰如

民 族 园

73 汉族是一个越滚越大越结实的雪球… 孟凡夏 刘振贵

76 平凡而又非凡的瀛生……………刘 路

遗 闻 录

79 我为在玉田的朝鲜慰安妇作证……………刘大为

编 读 窗

35 也谈陈独秀晚年的生活来源……………吴孟明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陈 沂

杜润生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其庸 曲润海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学勤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镏 张岂之

张国琦 郑 惠 凌 云

曾彦修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 长(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杨继绳

吴 思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陈 渊

理事单位:深圳市亚大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邮编:100007

电话:64072452 84020890

印刷: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

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网上书店

网址:www.dragonsource.com

gb.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价:4.80 元

改革是一场革命,没有求真务实的精神,改革就不能前进一步;改革是一个过程,没有勇于创新的精神,今后的改革便搞不好

我们随万里在农村改革前沿搏击

● 张广友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农村发生了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对于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的这第一次改革,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深圳、珠海视察时曾经说过: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万里是立了功的。

我作为新华社总社记者,有幸跟随万里参加了发生在安徽农村的这场大变革的全过程,作过大量的报道。回顾并记叙这段历史,对于我们汲取历史经验,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无疑是很有裨益的。

历史的机遇把我推到 农村改革第一线

我是根据万里和安徽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的建议和要求,经总社领导同意,于1977年9月到安徽的。

安徽历史上既是多灾的农业省份,又是一个长期受极左路线严重破坏的重灾区。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全国各地一片欢腾,都在积极揭批“四人帮”,从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而当时安徽省主要领导人却制造了一个“安徽特殊论”,清算“四人帮”的工作搞得冷冷清清,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人民怨声载道。1977年6月22日万里被中央派到安徽,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发动群众彻底清查与“四人帮”篡权有关的人和事,建立健全各级领导班子。首先稳定住形势。根据安徽既是个农业大省又是一个穷省的实际,省委各级领导班子初步健全后,便集中主要

精力,在解决各地县领导班子的同时,深入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坚持进行调查研究。

1977年11月,我随万里一行四人走访了皖南的芜湖、徽州、池州三个地区十几个县(市)。一路上同各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广泛交谈。这里由于长期以来受“左”的政策的影响,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农民生活普遍下降。许多农民反映说:解放前,我们这里养了几万子弟兵,一般说来吃饱饭不成问题。现在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为什么生产反不如那时呢?

皖南三千里巡行之后不久,我们又到了老灾区淮北阜阳地区农村访问。腊月廿三(过小年)那天,我们跟随万里深入调查了太和县城北的一个村庄,发现有些农户连吃顿饺子的面都没有,万里当即指示有关部门,千方百计给每个农民调剂三斤麦子,让人们过年都能吃上饺子。

1978年1月下旬,我们去皖东农村考察。从肥东至定远,一路上随机停车,徒步进庄,走门串户。先后在八斗岭、高塘铺、江巷等三个村庄,走访了十几户人家。在八斗岭我们到了一户姓张的农民家,这家7口人,两个大人,5个孩子,只有一床破被子,什么家当都没有。万里打开锅盖一看,锅里是用地瓜面和胡萝卜缨子煮成的稀粥……

走出张家,万里忧心忡忡地说:“过去只是听说这里很穷,但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你看他这家的全部家当也不值30块钱,一根木棒就可以全部搬走!”

这年春天,我们在定远县城的卢桥镇附近,看到一位挑担子的年轻农民,就同他聊天,在拉了一段生产生

活情况之后,万里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打开挽着的棉袄襟,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要求,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了!”万里说,这个要求太低了,问他还有什么要求?这位农民又打开袄襟拍拍肚皮说:“里面少装点儿山芋(红薯)干子!”事后万里对我说:“你看,我们的农民多好啊!他们的要求不高啊,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可是解放28年了,我们连农民这点最起码的要求都没有满足!”

万里到安徽不久,就来到以讨饭闻名的花鼓之乡凤阳。此后他多次去凤阳。他说,讨饭这是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原因是吃不饱,吃不饱是因为生产没搞好。问题是为什么生产搞不好?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楚。

万里出了这个题目并让大家蹲点调查。凤阳县有个前王生产队,紧靠津浦铁路。这个10户人家68口人的生产队,4户没有门(什么门都没有),3户没水缸,5户没有桌子。队长史成德是个复员军人,一家10口人只有7个饭碗、一床被子。我们开座谈会时,全村找不到一个小板凳,大家只好蹲着。队干部介绍说:初级社时全村有127人,三年困难时期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下十几个人。后来,虽然逐渐好了些,但逃荒讨饭从没有停止过。

万里认为农民生产搞不好,吃不饱,主要是政策不对头,生产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他在贫困地区县委书记座谈会上,动情地说:“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你们要求什么样的政策都可以;但必须保证今后绝不能再讨饭!咱们有言在先,如果今年秋后再发生讨饭的,我就带着他们到你县委书记家里去讨!”

在各级领导干部会议上,万里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亲眼看到农民还如此贫困,实在心里不安哪!”

农民生活贫困是因为农业生产上不去,农业生产上不去,是因为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是因为长期以来一系列“左”的政策的危害和影响。这是我国农村问题症结所在,是我们走访长江南北和淮河两岸农村所得出的共识。

安徽《六条》—— 农村改革的“序曲”

1977年9月、10月间,经过省委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深入调查研究,反复讨论制定了《中共安徽省委

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并于11月下旬下发。其主要内容是:搞好经营管理,允许生产队根据生产需要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强调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社队和社员负担;落实按劳分配政策,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共六条,所以简称《六条》。这些内容今天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在当时,其中许多规定都涉及到“原则问题”,是不能越过雷池一步的禁区。当时正是全国学大寨,搞“穷过渡”的高潮时期。1977年冬天,差不多与安徽《六条》发布的同一时间,中共中央发布了个“49号文件”,提出今冬明春要把10%的生产队过渡到大队核算。安徽《六条》与学大寨和中央“49号文件”精神是背道而驰的,然而,这《六条》规定却受到了安徽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

1977年底,文件下达后,万里要我们到农村去听反应。我和新华社安徽分社的几名记者分别到六安、滁县等地作调查。回来我向万里汇报说:群众对《六条》反应很好,最高兴的是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产品还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这条。还有对实行责任制、减轻农民负担等项规定也很满意。但也有人担心,怕说话不算数,怕政策再变。对生产队自主权,队干部比较满意,很多群众觉得很新鲜,有的说过去好像没听说过,不太懂……

万里说:生产队自主权是当前农村中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强调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就是反对瞎指挥。我看只要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去掉瞎指挥,就可以增产10%以上。这一点,在原来起草文件时只是一句话,后来才把它单独列出一条。生产队的自主权应该包括:生产的自主权;分配的自主权;劳动力支配的自主权等。自主权的实质是要生产者真正当家作主。这既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最起码条件,也是尊重农民权益的最基本的内容,没有这个,还谈什么独立核算?还谈什么经营管理,还谈什么调动积极性?现在很多人对这个问题不太懂,更不理解它的深刻意义,所以应当很好地进行宣传。

1977年底,我着手起草一篇全省性综合报道。这篇3500多字题为《安徽大步赶上来》的报道,在报道全省政治和生产形势取得可喜成就的同时,重点介绍了省委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狠抓经营管理和农村经济政



1978年万里在安徽长丰县农村调查时与农民一起劳动

策的落实,针对农村普遍存在的重要问题,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制订出《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对全省大好形势的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这篇报道很快得到了当时新华社国内部领导杜导正和陈大斌的积极支持。新华社于1978年1月14日发了通稿,《人民日报》在15日头版头条突出位置刊出,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映。

敏感的新闻单位闻风而动,1977年年底便来到安徽的《人民日报》农村部负责人姚力文,与我们共同研究确定,继《安徽大步赶上来了》之后,重点宣传报道省委《六条》,由新华社安徽分社田文喜陪同姚力文去采写。2月3日,《人民日报》在一版重要位置,以《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为题,刊登了这两位同志写的长篇通讯,并加了“编者按”。接着,我同分社一起研究,选择贯彻落实《六条》比较好的滁县地区,写了《滁县地区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报道,在《人民日报》2月15日头版头条刊出。

2月16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头条,以醒目大标题发表了《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必增产——安徽省定远县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状况的调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原稿中有一段写安徽省委领导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编者单独拿出来,改为“本报评论员”文章配合调查报告同时发表。

这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我收到了很多来信,普遍认为这篇文章抓住了生产队自主权这一要害。万里在这篇文章发表后对我说:你们写的报道,新

华社和人民日报社领导都很重视,要抓住这方面的问题,继续深入报道。

3月初,我们到贯彻落实《六条》政策比较好的滁县去采访,写了一篇《落实农村经济好措施——滁县地区各生产队制订〈一年早知道〉》,新华社于4月上旬发通稿,《人民日报》在4月8日四版头条刊用。

春耕大忙开始,我同安徽分社的记者田文喜、端木来娣同志,走访了江淮一带的滁县、六安地区农村,有感于《六条》下达后出现的喜人形势,欣然写下了《政策调动千军万马——安徽省滁县和六安地区农村见

闻》的长篇通讯,《人民日报》以醒目大标题加“编者按”在4月18日二版上半个版全文刊出。

仅在1月15日到4月18日的三个月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就发了通讯报道和调查报告六篇,计2万多字,且有三篇连续上了三个《人民日报》头版头条。2月16日,定远县生产队自主权一稿见报后,新华社副社长穆青见到我高兴地说:“这几天你们把人家《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都给包了!”

引发了晋皖之间的一场笔战

安徽省《六条》大量宣传报道以后,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引起了全国上下普遍关注,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但是也引起了“凡是派”,特别是当时主管农业的一些领导人的不满和反对。有的人认为安徽在搞资本主义,方向道路有问题。有的人说,安徽落实的农村经济政策是“为行小惠,言不及义”,调动的是资产阶级积极性,丢掉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于是在他们的影响和指使下,一些人针对安徽进行批判。就在《政策调动千军万马》发表后不久,1978年5月13日,《人民日报》一篇长达6千多字的题为《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的长篇文章,署名“学大寨联合报道组”。文章说:“大寨人从来不笼统地讲调动积极性,而是讲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还说什么“干部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不是嘴上说社会主义,实际干资本主义,不管什么积极性都去鼓励,都去提倡。”这篇文章发表时,我和新华社山东分社记者南振

中,安徽分社记者沈祖润正在滁县地区农村采访,这里的干部群众对《人民日报》登这样的文章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和疑惑。与此同时,新华社山西分社的一位记者告诉我:《山西日报》计划发12篇评论,对安徽不点名的批判,已经发了一篇。并告诫我:看来一场大论战就要开始了,来势很凶,你可要小心点儿!

我将上述情况向万里作了简要汇报。

万里说:“你们的报道是符合安徽的实际情况的,安徽就是这样做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你们放心地搞吧。”接着他又说:“我们干我们的,人家爱说什么说什么。我主张多干少说,或者只干不说,让事实去作结论,让群众去作结论,让历史去作结论。”他还说:“既然他们不点名地批评我们,我们也可以不点名地批评他们,各说各的,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于是,我们针对《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经验好》这篇文章,经过讨论,由南振中、沈祖润执笔,写了一篇《落实党的政策,必须清除极左思想障碍——安徽省滁县地区落实农村政策的一条重要经验》,从各个方面回答了一些人的疑虑,这篇长达4000字的报道,新华社7月4日发了通稿,《人民日报》7月5日全文刊载在二版上。

随着安徽农村改革序幕的拉开,一场围绕农村改革的激烈斗争也随之展开了。晋皖之间的笔枪舌剑,引起了全国上下,特别是广大农民和农村工作者的普遍关注。《人民日报》一方面集中力量,不惜篇幅地报道安徽农村改革;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继续宣传农业学大寨,不时地发一些同安徽相对立的观点和不少点名的批判文章。正在这时,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推向了全国,给安徽农村改革的尝试以巨大理论支持。山西原来准备批判安徽的计划也无法实现了。

安徽的农村改革在深入发展。1978年春天,在贯彻《六条》过程中,不少地方出现了分队、划小核算单位;少数地方出现了包产到组。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新的重要动向,但是在看法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一种看法是反对,认为由大划小,必然要滑向单干,产生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违背了农业学大寨和中央49号文件要求,必须坚决制止;另一种看法是支持,指出要从实际出发,要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其实,后者是正确的,因为这是省委《六条》下达之后,农民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鼓舞下,解放

思想,从有利于生产出发的自发选择,应当支持。但是当时,人们还受到陈旧思想的束缚,对“包产到组”之类,都很敏感。于是我和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到这三个单位进行调查,并就其中两个典型首先进行了内部报道,写了两篇调查报告,一篇题为《灾年创高产一年大变样——魏郢生产队包产到组的调查》;另一篇题为《产量责任制使棉花大增产——新街公社棉花生产联产计酬,责任到人的调查》。在这两篇调查报告的基础上,我又写了一篇评述性的报道,题为《农业计酬必须紧密联系产量》。

这三篇稿子共2万多字,我建议出一期《内参专刊》。稿件送穆青那里,穆青签发了。这份冒着“鼓吹单干”嫌疑的《内参专刊》于1978年10月10日出刊。

从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到包产到组、单项作物包产到劳的调查过程中,使我们认识到实行联产计酬、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重要性。但是,无论是“包产到组”,或者是“包产到劳”,都是当时中央文件规定所不允许的。因此,大家在赞成的同时,又普遍感到担心。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省委主要领导的万里同志急需了解下边的真实情况,听听他们的意见。10月的一个晚上,万里与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当时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王郁昭敞开心扉,把滁县地区农村的真实情况和自己的一些想法,一古脑儿端了出来,他分析了滁县地区长期落后的原因,坦率地指出,搞平均主义“大锅饭”,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



1978年万里(右一)在集市上访问药材个体户(右三为本文作者)

极性。他认为,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也不是倒退,而是经营管理中的一种联产计酬责任制形式,是治穷的“灵丹妙药”,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一项重要措施。万里听了他的汇报之后,不但没有批评他,而且表示同意他的一些看法。万里说,既然群众都同意,就应当允许他们去实践。万里要王郁昭回去以后,先把汇报中讲到的来安县魏郢生产队、天长县新街公社、来安县广大公社三个材料写好报上来。

这次长达3个小时的谈话,除了王郁昭汇报外,我们一起分析了形势。研究面对嘉山、凤阳、肥西等县一些农民自发搞起的包产到户怎么办?万里提出:不阻止,不批判,不提倡,不宣传。强调各级领导都不要站在群众对立面去阻挡,要认真搞好调查研究,帮助他们总结经验,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对万里的谈话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他的远见和胆识;担心的是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不允许包产到户”,且在历史上,许多同志因赞同或搞了包产到户,被打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就这个问题请教万里同志。万里讲了一段非常深刻的话,对我影响很大。他说:“如果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照搬照套‘红头文件’和上边领导的指示,还要你这级领导干什么,那就干脆把文件直接发给群众好了!”他强调:我们的一切农村经济政策首要出发点是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加速生产的发展。我们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就要看它能否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这是中央文件的基本精神。如果发现其中某些具体规定明显不适合那里的实际情况时,究竟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求是,还是生搬硬套?这对每个领导同志的政策水平、思想水平,的确是个很好的考验。我感到他的谈话非常重要,所以当即做了记录,但万里一再强调这是在探索、在研究,内部、公开暂时都不能报道,有些你可以个人的看法同新华社领导交换一下看法。后来,我把这份谈话记录加以整理,编入1985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阳关道上》一书中。题目为《当实际情况同中央文件发生矛盾的时候——记万里同志关于责任制问题的一次谈话》。

肥西、凤阳燃起星星之火

1978年5月开展的真理标准讨论和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原则上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两个文件等,给予安徽农村改革以巨大促进和支持。我们在总社国内部和农村组领导陈大斌和黄正根、赵华胄等同志的支持下,乘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东风,在年初宣传安徽贯彻省委《六条》、生产队自主权的基础上,继而对“包产到组”和“定产到组,责任到人”进行了连续报道,掀起第二个宣传高潮。

1月12日,《人民日报》二版头条发表了题为《抓点的学问——当涂县委抓点带面促进农业高速发展的调查》。1月20日《人民日报》一版发表了安徽县委书记学习三中全会公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长篇报道。1月21日,新华社公开播发了我和陆子修(滁县地委政研室主任)原来写的一篇内参稿,题目是《灾年创高产,一年大变样——安徽省来安县魏郢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的调查报告》,第一次公开报道了“包产到组”。1月22日,新华社播发了我和黄正根同志写的长篇通讯:《重灾之后访安徽》。

3月7日,《人民日报》把我年前写的《农业计酬必须紧密联系产量》的内参文章,作为“工作研究”在二版加“编者按”刊出。原来文章中多次提到“包产到户”四个字,而在当时“包产到户”还是在“不许”的“禁区”里,不能见报。还是杜导正想了个办法,把“包产到户”四字改为“包产到组,责任到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责任已经到了人,比到户还到户”;对不懂的人来说,最怕



万里(右三)与吴象(右二)在农村考察

的是“户”字,反正没有户就行了。所以这篇文章出来之后,“包产到户”实际上已经是半公开了,并给它起了个理论性很强的文绉绉的名字——联产责任制,后来又不断发展完善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肥西和凤阳是万里在安徽进行农村改革的两个点。1978年安徽大灾,在秋冬种时实行“借地”度荒的同时,肥西、凤阳等少数地方搞了包产到户。

2月1日,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带领工作组来到山南公社,向农民传达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上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两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大家对文件总的精神表示拥护,对两个文件中的“两个不许(即: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反应不满。有的说:“早也盼,晚也盼,盼来了两个不许干。”大家纷纷强烈要求中央修改文件时(因为是“草案”“原则上通过”,准备修改后经中央全会正式通过),把“两个不许”去掉,改为允许包产到户。

2月6日,万里召集了省委常委专门讨论了“包产到户”问题。万里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错误的,有的可能是正确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也毫无例外地需要接受实践检验。既然是山南群众如此强烈要求,我主张就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

2月6日,周曰礼赶回山南公社。第二天,及时向社队干部传达了万里和省委领导的意见,干部群众无不欢欣鼓舞。省委在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试点的消息不胫而走,山南区六个公社四五天的时间,全部偷偷地搞了包产到户。接着,山南的包产到户又像旋风似地席卷整个肥西县,不到一个月,全县40%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

凤阳是个以讨饭闻名海内外的穷困县。1978年这个县的马湖公社在贯彻执行安徽省委《六条》政策之后,悄悄地搞了“分组作业,以产计工(实际是包产到组),费用包干,节约归组”的责任制。结果,大灾之年,十个生产队八个平产,两个增产。1979年2月,凤阳县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在介绍马湖公社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推行以“包干”为特点的生产责任制,称之为“大包干”,在全县普遍推广。

在全县实行“大包干”到组的过程中,梨园公社最

穷的小岗生产队偷偷地搞了“包干到户”。

由于包干到户任务更明确,生产更灵活,方法更简单,利益更直接,到年底获得大丰收。全年粮食总产量是上年的4倍。这个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贡献一斤粮食的“三靠队”,包干到户一年就向国家贡献粮食6.5万斤,油料2万斤。社员收入大大增加。

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干了一年,谁也没有去总结它,更没有人去宣传它。在县里整理的一些材料中偶尔出现小岗的例子,也都被谨慎地删去了。但是这里的情况却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在那些穷困地方很快传播开了。这年12月中旬,县委曾派办公室的吴庭美去小岗了解情况。吴庭美经过深入调查,仔细分析,写了一篇在我国农村工作改革过程中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1980年1月初,在省委农村工作会议期间,凤阳县的这份调查报告送到了省委。万里看过之后,大加赞赏,他拿着这份调查报告对我说:“你看看这份调查报告写得真好!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很重要,有一定代表性,需要给以肯定和支持,过几天咱们去一趟。”1月24日,我们随同万里到小岗生产队挨家挨户去看,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万里对小岗干部和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当时的社员说:现在有人批我们小岗“开倒车”,万里当即表示:“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这对多年吃够“左”的苦头的小岗农民,是个莫大的支持和鼓舞。

为包产到户再起波澜

1980年1月,在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的农业会议上,万里就农村建立多种形式生产责任制发表意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为包产到户在安徽落了“户”。以“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像强劲的东风,吹遍了淮河两岸、大江南北,势若燎原烈火,燃向神州大地。

尽管包产到户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但是,有些领导干部仍然固守陈旧观念,一有机会就对它进行讨伐。

1980年1月11日到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

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和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根据万里在全省农业会上的讲话精神，代表安徽省以《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为题发了言。

一石激起千层浪。他们的发言在会上引起了十分激烈的争论。焦点是包产到户姓“社”还是姓“资”，不符合中央政策规定？持反对意见的人断定包产到户调动的是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既违反了中央文件规定，也违反了《宪法》的规定。这次会议，除了少数省的代表和一些新闻单位、经济研究部门的代表，表示支持安徽的意见外，大部分人持反对意见，一时形成对安徽及其同情者的围攻。

周曰礼等回到安徽后，及时向万里汇报了这次会议情况，并请示如何贯彻。万里考虑到省委农业会议刚结束，下边正在传达贯彻会议精神，为了稳定人心，发展大好形势，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决定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会议精神暂不传达。

但是，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刚刚结束，万里回到北京工作不久，复刊不久的《农村工作通讯》杂志1980年第二期，突然发表一篇题为《分田单干必须纠正》的文章，对安徽一些农村的包产到户，进行公开的批判。

这家杂志的第三期又加按语发表了题为《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文章。杂志还以“大家谈”为名，貌似公正，实际上只发表对包产到户否定和批评的意见，不发表赞成和拥护的意见。

3月上旬，我把两期杂志送给万里。那时万里调回北京住在京西宾馆。万里看后认为，我们也可以写文章摆事实讲道理，不点名地进行反驳。根据万里的指示，我和吴象写了一篇《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的长篇文章。文章打出清样送给万里审阅。万里建议用安徽省委农工部名义在《安徽日报》上发表。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省委农工部对稿件有不同看法。正在这时，人民日报社领导看到这篇文章清样，备加赞赏。他说：“如果你们同意的话，由你们两位署名，在我们报上发表，文责自负。”于是吴象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名义，我以《人民日报》记者名义（过去规定新华社记者可在《人民日报》发专稿时，可以用“本报记者”），在4月9日《人民日报》二版全文发表了这篇长达7000多字的文章。这篇文章从多方面回答了这家杂志所提出的问题，并特别强调要全面正确理解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文件的精神实质。指出确定农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首要出发点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我国八亿农民的积极性。这篇长文见报后，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就在这段时间，万里多次向邓小平汇报了关于安徽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情况和争论。4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领导谈话时说：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西北的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

邓小平强调：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产到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政策放宽以后，有的地方一年可以增加收入一倍多。我看到了许多这样可喜的材料。要解放思想！此事请万里同志研究个意见，提到书记处讨论。

安徽全省农业会议，特别是《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文章发表后，安徽农村情况怎么样？万里放心不下，要我和吴象到安徽农村去看。1980年4月中旬，我们来到了江淮地区的六安、肥西等县，发现全省农业会议以后，围绕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主要是对包产到户问题的争论很激烈。一方面，群众普遍要求搞包产到户；另一方面，省地县某些领导坚决反对。两方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

4月23—26日，省委在芜湖市铁山宾馆召开南山区（即安徽省长江以南的芜湖、徽州、贵池三个地区）地市委书记碰头会。根据省委领导的意见，吴象和我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除了传达十一届五中全会和中央领导人的谈话精神外，重点是谈关于农业生产和责任制问题。会议一开始，有的人就针对4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我和吴象写的《联产计酬责任制好处多》一文指责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又搞社会主义建设，走集体化道路，如今他老人家尸骨未寒，有些人就想否定他老人家领导的集体化道路，搞单干，搞资本主义。

在芜湖会议上与此相反的意见并没有在会上发表，在私下交谈却很多。他们以为，那些讲空话、套话，

不符合群众实际要求的人的意见群众是不会听的。群众说，他们是“上身穿皮袄，下身光屁股——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看来在这种能否维护群众利益的激烈斗争中，最能考验干部，识别干部。

关键时刻邓小平说话了

从安徽回京之后，我和吴象奋笔疾书，为包产到户大唱赞歌，写出了八篇共22000多字的系列内部报道——《安徽省江淮地区农村见闻》，从5月27日至30日每天早晨即有一组报道送邓小平等在京政治局委员。同时，万里还特批给原国家农委和农业部党组一份，要他们研究。这八篇报道是：生产形势很好，群众生活稳定；联系产量责任制威力大；包产到户对改变穷队面貌有明显作用；富队包产到户增产效果也比较显著；群众为什么喜欢包产到户；关键在于加强领导；有关包产到户的几个认识问题；包产到户是否权宜之计。

正当一些“只要方向”不顾群众实际需要的人，要大动干戈，讨伐刚刚兴起的包产到户的紧要关头，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邓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风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邓小平接着指出：“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

邓小平在谈话中，还特别强调：“总的来说，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邓小平这一讲话不仅对安徽的农村改革是个巨大支持和鼓舞，同时也为全国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

据万里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对包产到户也是很支持的，1980年初有一次陈云见到他，合掌抱拳，高兴地对他说：万里同志，我完全赞成在农村政策方面你们的那些做法。

邓小平讲话后不久，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开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后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0]75号文件。这份文件共有

12个问题。其中，第六条是专讲包产到户的。这一条一开始就说：“当前，在一部分省区，在干部和群众中，对可否实行包产到户（包括包干到户）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为了有利于工作，有利于生产，从政策上做出相应的规定是必要的。”

文件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就这种地区的具体情况来看，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就全国而论，在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商业和集体农业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这份文件的最大特点是，在中央文件上给包产到户落了“户口”，使包产到户合法化了。现在回头看，这份文件也明显存在着不足。比如，说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意思是说，本身还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老百姓把它通俗形象化说是“扒车的”）。说要“因势利导，运用各种过渡形式进一步组织起来”等等。这也不难理解，人的认识需要有一个深化过程。这也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我在安徽亲眼看到：实行包产到户不仅增产了，吃饱了，更重要的是“自由了！”正因如此，农民对包产到户才如此向往，才把土改当作是第一次解放，把包产到户当作“第二次解放”。

二十年来的历史实践表明，中国农村改革是成功的，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其中最大、最突出的是：使我们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国家，人民长期为之奋斗的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我国农业从传统农业开始向现代化转变，农村经济从自然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化，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原文3万余字，本刊作了删节，标题为本刊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 洛松）

辛亥革命断想：

政治自觉与学术自觉

● 张岂之

看历史上的变革是近一些还是远一些好？我觉得，后人从历史经验和教训积累的高度看，易于从历史中得到教益，远些好。我国近代完整意义上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至今已有 90 年，我们站在今天时代所达到的认识高度去看这次革命，肯定会产生许多感想，这些未必就是历史研究的正式成果，但是它们具有的朴素性和敏锐性也许会使人们觉得亲切。笔者在这篇短文中要写的，恰恰就是这类不拘一格的断想。

一、伟大的政治自觉

“自觉”是人的特点，是理性思维的成果，并非人人都能具有的。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自觉”表现为：有人对历史的进程、特别是时代课题达到较高的认识水平，并伴之实际的行动。这种自觉性不单是先驱者天才的表现，主要是历史实践展现出的客观真理，被具有强烈历史责任感的先驱者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认识，并加以梳理、宣传，唤醒民众，用实际行动去推进历史的变革。这种政治的自觉似乎可称之为历史的最强音。经过几十年、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后人仍然可以从不同时代先驱者的精神遗产中明显地感受到历史真理的巨大力量，从而进一步提高对历史认识的自觉性。

这里不妨举个例子。在中国近代历史，1898 年维新志士们的鲜血终于唤醒了国内首先觉悟的人们，他们大声疾呼中国已进入革命时代，对清朝政府不要抱任何幻想。先驱者邹

容在《革命军》中满怀激情地写道：“……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颡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

革命不能停留在激动人心的口号上，要有理论指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 20 世纪初提出三民主义革命纲领和理论，并以此指引革命，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才取得 1911 年辛亥革命的成果。当历史迈进 21 世纪，我们回顾这次革命，不能不惊叹先行者在政治自觉上达到的时代高度，远远不是此前历史变革所能比拟的。

孙中山“适应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1905 年 11 月在《民报发刊词》中正式提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民族主义的最初纲领口号将“颠覆满洲政府”、“还我主权”作为民族革命的基本任务。这种“反满”的口号，实际是要求民族独立。孙中山有这样的阐释：“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取予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这就超出了以往“反满”口号的狭隘种族主义倾向，将推翻清朝统治作为争取民族独立的第一步。孙中山首次提出革命成功以后，在国内实行民族平等政策。

孙中山民权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推翻

帝制,建立民国”,即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立宪政体。他始终强调,为达此目的,革命党人不可有帝王思想;帝王思想与民权思想不相容,“凡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1906年《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1905年《同盟会宣言》说,“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反对帝制复辟,直到他晚年在新三民主义中对民权主义的解说,仍然一再批判帝王思想。由于“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君主专制制度复辟者都遭到失败,这一点体现了辛亥革命成功的方面。由于中国近代历史的辩证法,孙中山规定的革命目标未能达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失败了。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鉴于中国经济极端落后的具体情况,提出以“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为主要内容的民生主义,要求在革命成功后发展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实现“国富民强”的理想。这个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暴露了它们自身的尖锐矛盾,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在西方风行一时。在此情况下,孙中山为使中国不致重蹈西方资本主义的覆辙,提出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主张。现实迫使中国民主革命家去思考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景,由此产生了对于社会主义某些方面的同情、向往。这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给后来者以重要的启迪。

启迪主要表现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相互作用问题,这也就是如何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

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新中国建立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等考虑到旧中国经济文化的具体情况,曾经设想中国要经过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估计少则十几年,多则三十年。

后来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取得很大成绩,也曾经有过很大失误,提供了丰富的正、反面经验,促使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就是邓小平开辟的改革开放时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生活、实践常青,理论必须随着实践而发展、创新。不仅新民主主义需要私营资本主义成分,在漫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树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1997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允许公有制以外一切符合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和其他所有制的存在并鼓励其发展。还提出,对外更加开放,加强引进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先进技术和资金,扩大对外贸易。从党的十五大至今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证明这一基本制度的正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军占领武昌

确性、权威性和生命力。

历史是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人们回顾历史,温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不可能将思维停止于1900年至1911年之间,必然会把这次革命放在20世纪我国历史长河中去加以审视。这样我们才能从历史上政治自觉的经验中得到教益,从而提高我们的政治自觉。

二、学术自觉的反思

辛亥革命准备的十年间——20世纪第一个十年,是中国学术从传统走向近代的重要时刻。当时学人们的政治观点、政治情结在学术问题上并不起决定作用,因为学术有其自身的规律。例如,具有清朝遗老情绪的王国维的学术思想、学术方法等方面在辛亥革命前后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山”;不仅在史学,在其他人文学术领域都取得创造性成果。

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的转型,离不开“西学”触媒。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人们仔细比较“中学”(中国传统学术)与“西学”(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优劣,逐渐进入学术自觉阶段。王国维在《论新术语之输入》一文中指出,西学“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上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这就是说,西学有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新的学术范式。这一范式要求揭示研究对象背后的法则,即“抽象”,不满足于就事论事的现象罗列。在王国维看来,以上两点恰恰是“中学”所缺少的。他的这个论断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他说:“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知识为满足。至于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又着重指出,“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尚未达到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

我国近代提出“学术自觉”者,王国维为第一人。细按这个口号的主要内容,首先指学人对于本国学术文化和外国学术文化,应在比

较中看到它们的优劣,不可能都优,也不可能都劣。学习外国学术文化的长处以济本国学术文化的不足,这在王国维看来,应当是“学术自觉”的出发点。其次,学人们应当确认学术的本质,用他的话说就是:“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不能用“政论”来判断学术是非,在这个意义上王国维提倡“学术独立”。(见《评近年之学术界》)最后,更加重要的一点是:学人应当将中学与西学的优长处加以融合,为学术作出创新。他强调说:“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大师都是在中西学术相融的基础上作出了贡献,开辟了新路。可见在20世纪初提出的“学术自觉”对中国近代学术起了很大推动作用。这样的“学术自觉”并不仅指学术研究方法上的实证主义;而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发扬和西方科学精神的浸润这二者的融合,缺一不可。

20世纪初,学术自觉不是体现在一两位学者身上,而在学人群体上有所反映,形成学术创新的潮流。在学者群中不能不提到“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用什么方法研究学术?当时,学人们似乎有一共识:用进化论观点来研究也许就是一种可靠的新方法。1903年严复翻译出版英国甄克斯(Edward Jenks)的《社会通论》(A History of Politics,即政治史),在《译者序》中认为中国社会历史是由宗法社会到军国社会的演进。此前康有为依据今文经学,将中国历史阶段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在章太炎看来,各种各样的进化史观未必可取。1906年他在《民报》上发表《俱分进化论》一文,认为“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知识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在他看来,进化是事实,但将它作为一种公式到处套用,只见其一而不见其二,并不妥当。章太炎这里

所论已不限于进化论,反映出对于构建新的学术规范,新的理论范式的要求,这就不是进化论所能解决的了。

20 世纪初的学术文化论坛没有出现“全盘西化”的字眼,相反,不同学术思想的学人几乎都将儒家的道德、伦理观作为立身处世的信条,加以提倡。他们(例如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等)都谈“国学”、“国粹”,这并不是为了复古,用章太炎的话说就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又说:“为什么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这是章太炎于 1906 年刊登在《民报》第六期上长篇《演说条》的主旨,剔除其若干狭隘种族主义的杂质外,其主体是通过对中国传统优秀学术文化的宣传来激发人们的爱国心。

由 20 世纪初开始的“学术自觉”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充实其内容,推进了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于是我们看到,20 世纪末人类学家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照费先生的解释,其主要内容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也许可以说,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光明日报》2000 年 11 月 7 日)可见“文化自觉”指:坚持世界范围内的多元文化,反对文化霸权,承认每个国家民族都有她们自身的文化,她们对人类的文化都有贡献。世界上不止一种声音,不止一种颜色。唯其多种多样,世界才是绚丽多彩的。另一方面,人们对本国文化应有自觉的认识,区分优劣,发扬优长,舍弃劣质,并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文化,这样才可以创造出先进文化。文化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经济是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础,而文化则是民族的灵魂。文化自觉不仅可以反作用于经济,推动经济发展,而且从文化的高度看,经济、生产力的发展,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可以看出,

“文化自觉”具有丰富的内涵。

“学术自觉”与“文化自觉”有联系也有区别。从联系看,学术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二者的区别在于历史时代的不同。在 20 世纪初,民族复兴是很遥远的事,中国尚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民族解放是当时的第一要义。在 20 世纪末,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已经提了出来,正在逐步实现;民族复兴必然包括文化复兴,因此,时代对“文化自觉”提出了更高、更深、更大的要求。笔者从辛亥革命的断想中,深感“学术自觉”到“文化自觉”,标志着我国在 20 世纪中的巨大进步和发展,不过,文化自觉的历史任务还很艰巨,需要国人们共同努力,在民族复兴中实现文化复兴。

(责任编辑 洛松)

研究党的历史 搞好党的建设

欢迎订阅 2002 年《百年潮》杂志

政坛高层亲历记 客观真实
专家学者独家文 秉笔直书

《百年潮》杂志是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大型文史月刊。宋任穷、萧克、程思远、任仲夷等任本刊顾问。《百年潮》以“信史、实学、新知、美文”为宗旨,以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以及亲历过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党和国家领导人、老一辈革命家为主要作者队伍,是反映 20 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领域中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最具权威性的杂志。

《百年潮》为月刊,每期定价 6 元,全年 72 元(免费邮寄)。2002 年本刊征订工作已经开始,读者可到当地邮局订阅,邮发代号 82—920。本刊发行部还随时办理邮购,读者可将订阅期数的总价款通过邮局汇给我社,并在汇款单附言栏说明订阅份数。

本刊发行部地址:北京海淀区海淀镇双桥东甲 1 号(中央党史研究室内)

通讯地址:北京 8799 信箱《百年潮》杂志发行部

邮编:100080

电话:(010)82627630 82627663

孙中山的民主思想

● 杨天石

戊戌变法前，西方民主思想逐渐传入中国，到了20世纪初年，出现了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它是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将“帝国”改为“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

国家的主人是谁？皇帝还是人民？历来的回答都是皇帝。古人认为天子“奄有四海”，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人民被称作“小民”、“细民”、“草民”、“贱民”、“蚁民”；还有所谓“牧民”之说。

戊戌变法前，西方天赋人权思想传入中国，传统的皇权观念受到冲击，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民权”思想，认为人民有权参加国家管理。但是，他们的政治理想是“君民共主”，只承认人民有权参加国家管理，并不承认人民是国家的惟一主人。

提出“民主”观念，真正承认、肯定人民是国家惟一主人的是孙中山。1894年，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提出“创立合众政府”，所称“合众”之“众”，指的就是人民，它是对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帝国”体制的明确否定，也是对改良派设想的“君民共主”体制的明确否定。1905年，孙中山在同盟会誓词中将奋斗目标定为“建立民国”，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将人民

视为国家主人，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破天荒的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帝国”体制虽然各不相同，但一般都具有下列特征：一、“皇权专制”，一人为刚，万夫为柔，君主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国家大事任由君主个人意志及喜好决定。二、等级制，天子以下，有公、侯、伯、子、男等层层叠叠的等级；等级不同，其享有的政治、经济权力也因之相异。三、虽有法律，但不能约束君主，也很难约束贵族。四、皇权世袭，父死子继。孙中山在其革命的开始阶段，就坚决批判中国的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认为“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他设想的“民国”与中国历史上的“帝国”完全相反。1906年的《革命方略》规定：一、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二、大总统由国民公举。三、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四、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以上四条，确定了一切国民的平等参政权，普选制度，议会制度以及法律至上的原则，条条都指向专制主义，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完全意义上的现代民主国家模式。

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通过《临时约法》，它以法律形式进一步肯定了国家全部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原则。《总纲》开宗明义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是中国历史第一次在法律上肯定了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在《人民》章中规定：“国民人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身体、家宅、财产、

营业、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有请愿、陈诉、选举被选举等权利。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南京临时政府对人民自由和权利的规定并不是一种文字花样，而是准备实实在在要兑现的。武昌起义后，新闻业迅速发展。3月6日，临时政府内务部颁布《暂行报律》三条。该项报律公布后，受到上海新闻界强烈反对。章太炎专门为《大共和日报》撰写社论批评。孙中山考虑各方意见，从维护言论自由，接受舆论监督的大局出发，于同月9日宣布《报律》无效。他说：“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善从恶改，古人常以为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摧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敝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民国初年，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舆论环境极为宽松，这是和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分不开的。

人民是主人，自总统以下的各级官吏都是“公仆”

孙中山认为：国家之所以成立，建筑于“国民的合成心力”，凡共和立宪国家，“左右统治权力者，常为多数之国民”。但是，政治之事无法人人都做，只能由少数优秀突出者“代表民意”，组成政府。于是，就有了总统，有了总长，有了林林总总的各级官吏。

总统、总长、官吏是什么？孙中山一言以蔽之曰：“公仆”。1906年12月，《民报》召开创立周年庆祝大会，孙中山发表演说，明确表示：“平等自由原是国民的权利，但官吏却是国民公仆。”

孙中山从担任临时大总统那一天开始，就把自己工作定在“公仆”地位。临时大总统誓词称：“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服务”，这是孙中山引进中国政治界、思想界的又一个新观念，它正确地说明了“公仆”们的各类政治行为所应该具有的根本属性。

旧时官场，通行大人、老爷一类称呼。民国建立后，因为一时没有新的代替说法，临时政府及地方机关仍然沿用此类称呼，孙中山得知后，认为这是共和政治的耻辱，于1912年3月致内务部令称：“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查前清官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惭，施之者失体，义无取焉！”他要求此后官厅人员用职务相称，民间则以“先生”、“君”相称。

据当时人回忆，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有一扬州老人到总统府求见，传达室不予通报，老人坚持不走，孙中山得知后，立即接见，握手相迎，但老人却三跪九叩，行起君臣之礼来。孙中山连忙将老人扶起，亲切地告诉他：“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老人问道：“总统若是离职后呢？”孙中山回答说：“总统离职以后，就和老百姓一样。”老人告辞时，孙中山又将他送出总统府。老人高兴地说：“今天我总算见到民主了！”

此后，孙中山经常宣传“公仆”思想。1919年，他在《孙文学说》中称：“夫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君政时代则大权独揽于一人，今则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是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也。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1924年，他在《民权主义》演讲中更将包括国家总统、总长在内全体官吏比作车夫、巡捕、厨子、医生、木匠、裁缝。他说：“讲到国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权；至于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于有能的专门家。把那些专门家不要看作是很尊贵的总统总长，只把他们当作是赶（开）汽车的车夫，或者是当作看门的巡捕，或者是弄饭的厨子，或者是诊病的医生，或者是做屋的木匠，或者是做衣的裁缝，无论把他们看作是哪一种工人，都是可以的。人民要有这样的态度，国家才有办法，才能够进步。”

“公仆”一词生动、贴切地阐明了人民和各级官吏之间的关系。人民是主人，而各级官吏只是仆役，是为主人服务的。这就将历来高

高在上,凛然不可侵犯的“大人”、“老爷”们拉到了地下,这是中国历史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颠倒。

将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

“民主”,决不是只在口头上、法律上承认人民的主人翁地位,而是要在事实上让人民当家作主。孙中山说:“今日我们主张民权,是要将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又说:“中国自革命以后,成立民权政体,凡事都是应该由人民作主的,所以现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民主政治’,换句话说,就是人民来做皇帝。”

人民怎样才能“做皇帝”呢?孙中山主张,人民应该拥有“四大民权”,即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所谓“选举权”、“罢免权”,指的是人民对于各级官吏,可以公举,也可以“公罢”;所谓“创制权”、“复决权”,据孙中山说:“大多数人民对于一种法律,以为很方便的,便可以创制,这便是创制权;以为很不方便的,便可以修改,修改便是复决权。”孙中山认为,只有人民掌握了这四大权力,“民主”才能到位。他说:“人民而有此四大权力也,乃能任用官吏、役使官吏、驾驭官吏、防范官吏,然后始得称为一国之主而无愧色也。”

近代西方国家规定了人民的选举权利,但是,又常常实行一种“有限制的选举权”,例如,有性别、教育、财产、居住时间的限制等;又如,规定人民只能选举议员和部分地方官吏,而总统和上议院议员则采取间接选举制度等。还在民国初年,孙中山就指出:美利坚、法兰西,固然是“共和之先进国”,但是,“两国之政治,操之大资本家之手”。又说:“英美立宪,富人享之,贫者无与焉。”1924年,孙中山接受中共和苏联顾问的帮助,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与此相应,会议通过的

《政纲》规定:“实行普通选举,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这里所说的“普通选举”与“普遍选举”同义。这些地方,说明孙中山准备废除对人民选举权利的任何限制,力图建立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平民政权。

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就反对代议制,主张废除议会、议员,代之以“法官”和由法学家充任的“学官”。孙中山对代议制也不十分满意,认为这只是一种“间接民权”,人民还不能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因此不能算是纯粹的“众民政治”。他说:“既曰民权国,则宜为四万万人民共治之国家。治之以法,即在予人民以完全之政治上权力。”孙中山设想的办法是:以县为单位自治,仿照瑞士模式,实行直接民权。在县以上,则实行代议制,由各县选举国民代表一名,参与中央政事,组成国民大会。国民大会对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权和复决权。孙中山认为,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只有使“直接民权”与“间接民权”相结合,才能比较好地解决中国的民主问题。

建立既有制衡机制又有强大效率的“万能政府”

绝对的不受约束的权力易于产生腐败。为了防止权力过于集中,西方国家一般采取行政、立法、司法“各不相统”的办法。孙中山研究了西方的经验之后,认为这种做法仍然有缺陷。他以20世纪初年的美国为例,说明当时的美国官吏一部分来自选举,一部分来自委任。来自选举,则口才好的人易于打动选民,而思想、学问高尚的人却可能拙于口才,因此,美国议院中常有愚蠢无知的人夹杂在内;来自委任,则委任官跟着大总统进退,总统换,自内阁以致邮政局长都换,因此,“美国政治腐败散漫,是各国所没有的。”为了防止类似情况,孙中山提出,继承中国古代的考选制,“大小官吏必须考试”,“必须合格之人,方得有效”。孙中山还提出,当时世界上的立



孙中山

宪国家,其立法机关兼有监督权限,易于生出弊病,例如美国的议会,就常常擅用纠察权,挟制行政机关。他主张,设立独立的专门机构,专管监督弹劾的事。这样,孙中山就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又增加了考试、监察两权。孙中山称之为“五权宪法”。他认为,“这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

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等五权,孙中山又称之为“政府权”。孙中山希望政府掌握了这五种权力之后,既能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又能够高效率地为人民谋利益,成为“万能政府”。

借鉴西方,超越西方

孙中山长期生活在西方,他深入研究过西方民主的发展历史,主张既借鉴西方,又超越西方。

中国古代,只有民主思想的某种萌芽,没有系统的现代民主思想。孙中山承认:“中国人的民权思想都是由欧美传进来的。所以我

们近来实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仿效欧美。”他说:“我们为什么要仿效欧美呢?因为看见了欧美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他认为,欧美既有很多学者致力于民权研究,又有一百多年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主张深入细致地研究“欧美的民权经验”,明确表示:“那些经验和学理,根本上都是应该拿来参考的。如果不参考欧美已往的经验、学理,便要费许多冤枉工夫,或者要再蹈欧美的覆辙。”

一种制度,不可能有利无弊。西方民主制度是在欧洲中世纪专制制度中发展起来的。它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但是,也存在种种缺陷,实行过程中,更会出现种种流弊。20世纪初年,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已有充分暴露,因此,孙中山在设计中国民主宪政的蓝图时,不能不考虑对它如何加以改进。1924年4月,他发表演说称:我们“所主张的民权,是和欧美的民权不同。我们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国家,要驾乎欧美之上。”既承认西方民主制度的先进性,又并不认为一切都好,企图加以改进和超越,这是孙中山的伟大之处,也是他思想的深刻性所在。

孙中山研究过人类权力的发展历史,认为其途径是从神权到君权,从君权到民权,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中国必须顺应这一趋势,而不能反抗它;反抗必然失败。他说:“我们顺着潮流做去,将来一定成功,并且可以永远的成功。”孙中山一生屡经困顿和挫折,但是,他看准了潮流所向,百折不回,奋斗不懈。他不仅是伟大的民主主义思想家,而且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伟大实践者。他的思想和实践中的许多部分都值得人们珍惜、总结、借鉴、继承。

(责任编辑 程 度)

为宪政流血的“第一人”

宋教仁

● 贺 渊

“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
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

这是孙中山在宋教仁追悼会上献的挽联。内中没有悲戚之情，只是直白地道出了宋教仁被暗杀的真实原因，袒露了革命党人为了民权，渴望献身的壮烈情怀。正是这寥寥几笔，平平二句，振撼着人们的心灵。革命党人以“无量头颅无量血”，换来了辛亥革命。但是，孙中山将为宪政流血“第一人”的殊荣给了宋教仁，绝非溢美之词。

宋教仁其人

宋教仁（1882—1913），字循初（又写钝初），号渔父，湖南省桃源县上香冲人。1903年他和黄兴等人在长沙创立了革命团体华兴会。随后他被派往湖北，在武昌组织华兴会支部，从此以后，他同湖北革命党保持了较多的联系，为以后的革命打下了基础。后来华兴会在长沙组织武装起义失败，宋教仁逃亡日本，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主攻政法。清政府对革命派的镇压，无异于为渊驱鱼，将革命的势力，集中到了海外，特别是日本。1905年，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革命团体联合，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同盟会，宋教仁是发起人之一，被推举为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

宋教仁将宣传作为自己革命的主要方式。他主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并曾担任过《民报》的编辑。1911年，他回到上海，应谭人凤的邀请，担任了《民立报》主编，署名“渔父”，发表了大量时论文章，披露清

政府假立宪法的真面目，揭露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野心，使《民立报》享誉天下，桃源“渔父”也因此而扬名。

爱国，是革命者的共性。宋教仁最具传奇色彩的事，是他撰写了一部6万字的《间岛问题》的专著。所谓“间岛”，并不是一个岛，而是中国靠近朝鲜的一大片土地。1907年日本突然就这块土地的归属提出疑问，以为当属于朝鲜。由于当时整个朝鲜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便以保护韩民为由，挑起纠纷，于1907年7月派宪兵前往，设立了统监府间岛派出所。宋教仁了解了日本的野心后，跑到间岛一带进行实地勘察，收集了日本与朝鲜关于中韩之间这块土地归属的大量资料，说明了如下历史事实：间岛位于满洲东南与韩国接壤之处，由于清廷的建立，当地的满族人一大半都随之入关，长白山附近原清朝的发祥之地被封禁。因此，西起边外，东至珲春逐渐荒芜，疆界慢慢不清，后来朝鲜人逐渐西移，清韩两国曾多次查勘，定疆界，间岛完全归清所有，清将一些土地租给韩人，现还有十块界碑可以作证。宋教仁这篇文章揭示了不可辩驳的事实，为清与日交涉提供了有利的证据，对保住清的发祥之地起了极大的作用。清因此对他的才干十分欣赏，曾想赐给他一个四品京官，让他从事对外交涉事宜，但宋教仁没有领情。由此，我们可以从共性中看到宋教仁的个性，即踏实、务实的风格和科学的态度。

辛亥革命前，宋教仁的声誉不能与孙中山、黄兴相比，但是，他的才干和革命热情，加上理智的态度，使他独具慧眼，在革命队伍中自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如果我们仅仅研究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就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孙中山、黄兴等人，长期在广东和西南

边陲从事于武装斗争，可是革命的爆发却是在武昌，并且迅速波及到大半个中国，其中起作用的难道是偶然因素？武昌起义与同盟会有什么关系？通过了解宋教仁，我们或许能够明白一些。

据宋教仁回忆，他和陈英士、谭人凤等曾经就革命策略进行过探讨，宋教仁提出三策：以中央革命为上策，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领北京，然后号令天下，取得革命的成功；中策以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大举，设立政府，然后组织力量北伐，夺取政权；下策是在边疆沿海一带，建立秘密机关，以此为根据地，逐步进取。先是避难就易，于是有 1911 年 3 月广州黄花岗起义，但是，起义失败了，广东革命力量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事实说明，这个方案行不通了，于是，他们决定采纳中策。为此，他们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选举陈其美、潘祖彝、宋教仁、谭人凤、杨谱生分别负责各项事宜；并决定在长江流域“遍立分会”，派员前往南京、湖南、湖北、安徽成立分会，同时在四川、陕西等地运动，以便策应。当四川保路风潮兴起，他们感到时机已到，决定以湖北为中心，并在汉口设立起义机关，决定 9 月 1 日起义，但由于走漏了风声，三个主要的领导人被捕就义。不过，即使这样，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还是爆发了，历史朝着宋教仁他们预定的目标前进了。辛亥革命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又在人们的意料之外到来。

我们应该承认，同盟会在组织上始终比较松散，成员之间仍然存在着亲疏之别，他们对于革命的策略，有着不同的意见，他们的活动重点也不同。中部同盟会的成立，或多或少地改变了这种缺乏计划、缺乏联络、缺乏统筹考虑的情况，为辛亥革命的来到，作了一定的组织准备。同时，孙中山等主要领导人长期在国外活动，如果没有像宋教仁、谭人凤、吴禄贞、陈其美等一大批志士的活动，尤其是没有他们在长江流域的艰苦工作，辛亥革命是不可能如此快地到来，革命党在这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也不可能如此明确。因此，宋教仁等人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不应该被遗忘。

为民国制定大法

著名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宣布中国走出了二千年的封建专制的轮回，义无反顾地向民主的新社会进发，她的主要的起草者就是宋教仁。

早在辛亥革命前，宋教仁预见到推翻清政权容易，但是，革命成功后的建设，却要困难得多。他以为我国政治上的变革，最终的结局虽然不清，但是，君主专制政体“必不再许其存在”，民主立宪政体“则固事所必至者”。为此，他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从事于对各国政体的研究，陆续翻译了《俄国制度要览》、《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澳大利（亚）匈牙利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美国制度概要》、《比利时澳国俄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以及《普鲁士官制》等，在《民报》上发表。同盟会中，他和廖仲恺是翻译最多的两个人，廖翻译的重点在介绍社会主义，宋则以西方制度研究为方向。事后证明，他们两人的良苦用心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后，黄兴和宋教仁赶到湖北，领导起义。宋教仁马不停蹄，立刻着手制定《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并于 11 月 19 日公布。该法虽然是一部地方法，但却是中国第一部充满民主精神的法律。由于湖北为首义之地，一时成为革命的中心。《鄂州约法》的公布，为各地政权的建立树立了榜样，同时也为将来的南京临时政府提供了基本法的蓝



宋教仁烈士

本。

1911年12月，众望所归的孙中山回国后担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宋教仁为法制院院长和法制局局长，这使宋有了用武之地。虽然参议院是立法机构，但是，凡重要法制，均由法制局编订后，呈临时大总统，临时大总统咨请参议院议决。这样，临时政府时期的法令，实际上大部分出自法制局局长宋教仁之手。其中，《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基本大法，最为重要。

两部《约法》，本着民主制的基本精神，规划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建制，宣布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体现了无分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人民拥有诉讼于司法、陈请于议会、陈述于行政官署、任考试、选举与被选举权利；宣布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通讯、信教、居住、迁徙的自由和保有财产、身体、家宅的自由。它以三权分列为政府蓝本，中央政府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组成。地方政权由都督和都督任命的政务委员、议会、司法部门组成。都督由人民公举，任期三年，连任一次为限，议员则从人民中选举产生。

上述两部《约法》的立法原则，和法国、美国政制一脉相承，并不为以后的法律所认可。但它却是辛亥革命的宝贵遗产，成为中华民国的象征。袁世凯上台后，用专制取代了民主，先拿《约法》开刀。1916年袁世凯死后，革命党要求恢复《约法》而不得，于是又有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因此，承认《约法》与否，成了衡量真共和还是假共和的尺度。

护共和力主责任内阁制

辛亥革命，抬出黎元洪在先，让位于袁世凯在后，新政权逐渐被政治上老练的政客吞噬，他们携带的封建毒素，必然会窒息新生的民主政权。在这危机四伏的时候，宋教仁是少数几个将政权视为头等大事的人，为了掌握政权，他要抗争。

宋教仁的办法，就是实行责任内阁制。西方的民主立宪制度主要有两种：一是美国式的总统制，一是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从本质上说，他们是一致的。但是，内阁制下的总统，权力相对较小，行政权由内阁掌握，而内阁由议会选举产生，并对议会负责。宋教仁无

论在湖北，还是在南京，一直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其中的关键是他不信任黎元洪和袁世凯，想借内阁牵制总统，夺回权力。

孙中山在他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主张实行总统制。因此，在这一点上，他与孙中山曾有过争论。就我们现在看来，当时全国形势还十分混乱，为求统一、安定，总统制可能更便捷些。但是，如果考虑到孙上台之际，就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将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那么，总统制显然就不如内阁制了。孙中山在辞去大总统职务后，也赞成宋教仁的意见，因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采用责任内阁制。

根据《约法》，凡总统的命令，由内阁起草，内阁成员副署。内阁成员的任命，必须由议会批准才能通过。正式国会将由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组织。内阁负实际责任。结果，总统权力被大大削弱了。相比之下，内阁总理的权力有所增加。内阁总理由众议院推出，其他国务员则由总理组织，不经过国会通过。

对此，袁世凯曾经这样说：“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置上。”宋教仁所为，恰恰正是袁世凯所怕。更有甚者，宋教仁并不讳言自己的目的。他在1913年3月《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中，毫不含糊地说：实行责任内阁是为了“使总统处于无责任的地位”。这句话，在民主国家算不了什么，可在想当皇帝的袁世凯听来，简直就像“彼可取而代之”一般地大逆不道，“乱臣贼子”自然应该“诛之”。

行政党政治功败垂成

由于实行议会制度，由于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组阁，组织强有力的政党，势在必行。

民国初年，政党林立。开始，同盟会在议会中占主导地位，但随即引起了立宪派、旧官僚和原来同盟会中分化出去的一些小党的不满。在袁世凯的支持下，1912年5月，这些党联合起来组成了共和党，在参议院中颇有实力。共和党站在袁世凯一边，对同盟会不利。而这时的同盟会，内部十分混乱，孙中山、黄兴不过问党务，宋教仁作为代理苦于组织松散，意见分歧，无力指挥。于是，他在征得黄兴的同意后，在原来的同盟会基础上，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实进会与国民公党等几个小党，于1912年8月组织了一个新政党——

国民党，以孙中山任理事长，宋教仁任代理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等人为理事。

国民党成立以后，改变了原来议会中的力量对比，以原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势力又占了上风。经过宋教仁的努力，1913年2月，大选揭晓，国民党大获全胜。在参、议两院共870个议席中，国民党获得了392个席位，而共和等其他三个党加起来也不过只有223个席位，国民党占了绝对的优势。

如果按照民主制的规则，形势将发生根本的变化，政权很可能再一次回到代表进步势力一派的手里。不但国民党的代总理宋教仁可以出任内阁总理，而且人们开始猜测，孙中山是否会复出，竞选正式大总统。这时，曾经对政党政治并不十分热心的孙中山正在日本，他也颇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他对政党政治津津乐道，视为“民国的基础”。

可是，组织过多次武装起义的孙中山、宋教仁等革命党人，显然还没有真正领悟毛泽东后来总结的一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他们更多地把国家机器当成一个管理机构，而不是权力机构、统治机构和镇压的机器。就在他们用合法的方式将要取胜的时候，袁世凯用不合法的手段轻易地占了上风。这就是暗杀宋教仁。

宋教仁——民主主义的化身

袁世凯要杀宋教仁，理由很简单，宋的政治活动，动摇了他的权威，威胁了他的统治。不仅如此，宋教仁简直就是一个民主制度的化身。宋教仁一方面认为共和政体并未真正建立，一方面他的所作所为所言，却俨然置身于美国、法国的大选之中。他告诉人们什么是民主观念？怎样参与政治，开展竞选？

1913年初，宋教仁由湖南老家出发，经湘、鄂、浙等省份，沿途他多次进行演说，对当时的政府提出批评，宣传国民党的政纲。他对于袁政权的基本评价是：“不合民意之政府”、“退步之政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国。具体说来，从内政上看，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财政。政府解决困难的办法缺乏远见而无效果，使财政困难依旧；外交上也同样存在失误；尤其令他无法容忍的是，在这种不好的局势下，政府却依然歌舞升平，“不知是何用意”？他指责当权者没有责任心。针对袁世凯要“维持现状”的观点，宋教仁进行批判，

他认为中国应该是改造，而不是不死不活地维持。他指出“且维持现状说兴，而前清之腐败官制，荒谬人物，皆一一出现，故维持现状不啻停止血脉之谓。”宋教仁强调大家应该力促政府改良进步才是。他不但建议实行责任内阁制，以国民党组阁替换现政权，而且主张省长民选，反对袁世凯承袭清朝旧制，采用道府制度，等等。这一切令袁世凯忍无可忍，他说：“宋教仁意欲组织政党内阁耶？抑何相逼之甚也。”

当时无论是旧官僚，还是原来的革命党，都有人攻击宋教仁想当总理，太具野心。对此，他嗤之以鼻，针锋相对。他以为国家既为民国，作为国民，当然应该承担责任。因此，有人想为国家作贡献、出力，是好事，指责别人有野心，恰恰说明这种人将民国的职务，等同于君主时代的官爵，错误大矣。而这种叫嚣误导了个人，使许多人有“推让之虚文”，自鸣清高而不顾国家，使国家蒙受损失。他的这些思想，惊世骇俗而坦坦荡荡，既批评了以汪精卫为代表的貌似清高，实为不负责任的态度，又充分体现了真正的主人翁精神，他的无私无畏，不能不让政敌感到恐惧。

1913年3月20日，准备北上担任内阁总理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到暗杀。两天后不治身亡。在此之前，宋教仁就听说有人想暗杀他，但他并不在意，以为“光天化日之政客竞争，岂容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弥留之际，宋教仁明知被刺绝非私仇，可是还发电报给暗杀阴谋的授意者袁世凯，希望他：“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这封电报，成为一个纯真的民主主义战士的点睛之笔，他的糊涂让人在心痛之余油然而生出无数的感慨。

（责任编辑 程 度）

来函摘登

2001年第9期贵刊所载吴江《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一文中有关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免去了华国锋同志的党中央主席职务”之句，此说法不准确，应改为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

读者：牛兆奇

辛亥革命前后的梁漱溟

● 汪东林

梁漱溟先生生于1893年,病逝于1988年,以其95岁的高龄经历了56年的旧中国和39年的新中国。对于他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早期43年的经历,1988年7月梁漱溟病故时由新华社发布、《人民日报》全文刊登的《梁漱溟生平》中有这样一段评价:“出生于中日甲午战争前一年的梁漱溟先生,与同时代的志士仁人一样,为民族独立、为国家富强积极追求探索。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先赞成‘君主立宪’,随后又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后来他转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新中国建立后,他‘醒悟’到自己走的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尽管如此,梁漱溟先生那种‘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爱国初衷和为之奋斗的不懈努力一直获得人们的称道。”

1986年辛亥革命75周年纪念前夕,笔者曾登门对梁漱溟先生作过一次专访。当时他已有94岁高龄,身体仍很硬朗。对早年的事情出奇地记忆清晰。当我在北京木樨地22号楼进入他的寓所并说明来意时,梁先生竟一反平素好静的习性,激动地谈起他投身辛亥革命的经历来。

加入京津同盟会

梁先生说,我于1906年考入北京顺天中学堂,1911年毕业。1910年暑假后,班里来了一位插班生,叫甄元熙,字亮甫,广东台山人。后来我才知道,甄君进校之前就是革命党人,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他从广州辗转到北京进顺天中学堂,就是来宣传革命,发展革命力量的。甄君比我长两岁,他因见我对时局也极为关心,很快同我成了好朋友,但实际上,我们的政见并不相同。他当然是革命派主张,我只是热心对中国进行政治改造,而不同情排满反清。在如何对中国进行政治改造上,我当时认为英国式政治最为理想,否认君主国体与

民主国体在政治改造上有什么差异,并认为法国式(内阁制)、美国式(总统制)皆不如英国式政体完善。这种观点,实质上是辛亥革命时康有为的“虚君共和论”。因为这,我同甄君的分歧自不待言,但他这人聪明过人,自有一套交朋友的办法。一天,他悄悄交给我一本书,说让我读完后再商讨。这本书是由日本东京出版输入我国的,书名叫《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书中收集了以梁启超为主的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君主立宪派的文章,同时收集了胡汉民、汪精卫等发表在《民报》上的革命派的文章。两派观点针锋相对,各不相让,我认真读完了全书。由于我本来就倾向于梁启超的主张,当然不能立时就接受革命派的思想。但甄君表现得十分有耐心,我们之间经常秘密进行笔战和辩论,而且争得面红耳赤,每次总以他乐呵呵地主动休战而结束,从来不伤感情。我为他的革命激情和友善态度所感动,所影响,观点渐渐有了转变。当然,更重要的是与此同时看到的许多事实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主张君主立宪——此路不通。

所谓“事实”,是多方面的。我举一桩较大的事例。康、梁的“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了,但过了若干年后,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却有增无减,形成了一股潮流,因为这种主张是以不推翻清王朝统治为前提的一种政治改良。在西太后不能主政和病死之后,清廷也允许各省成立咨议局,中央成立了资政院,还派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成立了宪政编查馆,最后还发表“上谕”,提出经过九年准备便召开国会,正式立宪,先把省咨议局改为省议会等等。但是性急的君主立宪派认为九年时间太长了,等不及,纷纷要求提前召开国会搞宪政。各省因此派出请愿团到北京向清政府请愿。这一举动使清廷很恼火,答复说:九年准备的时间不容改变,并强行把各地请愿代表逐出北京。清廷这一行动,使君主立宪派大失所望。因此清廷更加失去人心,许多立宪派纷纷转向革命派。我看到这些事实,深感时局如此,宪政肯定无望,因而革命便是改造

中国的唯一出路了。其时,京津同盟会(全称为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酝酿成立统一组织,汪精卫、李石曾、魏宸组、赵铁桥等是主要领导人。甄元熙也是活跃分子之一。他见我的思想、态度发生变化,便及时主动介绍我加入同盟会,我欣然同意,时为辛亥年(1911年)夏秋之间。记得我的第一个行动是剪了辫子。甄君在辛亥革命期间一直同我在一起,转民国以后,他在京津创办《民国报》,自任社长,我在该报任记者。1919年、1920年间,甄君曾在广东大元帅府任秘书,后去美国,在旧金山办报。

京津同盟会的革命刺杀活动

梁先生回忆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京、津、保地区革命党人的活动,开始时是以小组织、小团体的规模进行,甚至单枪匹马地干。后来酝酿成立同盟会,才逐渐成立统一的组织。约在1911年冬,甄元熙向我传达说,汪兆铭(精卫)邀胡鄂公、白逾桓、彭家珍等在天津开会,正式宣告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成立。由汪兆铭任支部长,下设参谋、军事、财政、交通四部。胡任交通部长,白任参谋部长,彭任军事部长,财政部长是汪自己兼任还是别的什么人担任,就记不清楚了。至此,京津同盟会才有了统一指挥,组织形式也较前严密了些。

梁先生说,我加入同盟会后,经常去的联络点在北京东单三条。这里有一家京津同盟会开设的沿街而门面很小的杂货店,负责人就是甄元熙。小店前头卖货,后头聚会,常有同盟会会员三三两两来这里碰头,其中不少是河南、四川、云南籍的保定军校入伍生,大多议论革命形势和商谈军事举动,胡鄂公和彭家珍都来过这里。我是甄君直接领导的同盟会会员,常到这里来听消息,议国事,传送革命书刊;有时也守店面卖货,记得还曾奉派到京郊购买过一批带玻璃罩的煤油灯,在那时,北京还没有电灯,这便是时髦的家用照明灯具了。

梁先生说,京津同盟会当时在北京地区也有军事举动,但不是搞武装起义,而是为了配合南方革命军的军事行动,谋划刺杀清廷掌握大权的显贵。最有名的举动如刺杀袁世凯、良弼、摄政王等,一时震惊京内外。我这里想特别谈一下彭家珍刺杀良弼的情况。

约摸在辛亥年的腊月(1912年1月)中旬,张先培等四人携炸弹刺杀袁世凯失败,几位先烈壮烈牺牲。消息传出,京津同盟会的会员们无不怒火满腔,在东单三条聚会中,常有人拍案而起,摩拳擦掌。几天后(即1912年1月26日),突然传来彭家珍刺杀良弼成功,但本人亦当场牺牲的消息。彭家珍是四川人,我加入同盟会不久即与他相识。彭做事精明,胆量过人。作为军事部长,他深知张先培等刺杀袁世凯失败的影响,便单枪匹马,以一死去夺取成功。

良弼是清廷贵族主战派(力主用武力平定南方革命党人)的代表人物,气焰嚣张,早就是革命党人要除掉的一个目标。刺杀良弼那天,彭家珍身着清朝军官的服装,怀揣炸弹,独自来到北京西四北红罗厂良弼的住所,掏出一张事先准备好的清廷驻奉天将领恭顺(良弼好友)的名刺(即名片),声称要面见良弼。正在这时,一辆马车由远而近,驶抵大门口,即传来一片“大人到”的声响。说时迟,那时快,良弼刚迈步下车,彭家珍已将炸弹投去。由于距离太近,彭当场牺牲,良弼被炸掉一条大腿,受重伤,于第二天死去。这一壮举,吓得清廷显贵闻风丧胆,同时也大大鼓舞了革命党人的志气。后来孙中山先生授予彭家珍以“大将军”的称号,民国以后,彭家珍和张先培等四位烈士合葬在今北京动物园熊猫馆的东北角,立有一座五面碑,每面各镌刻一位烈士的姓名,后因北京动物园不断扩建,这座墓和碑竟不知去向,甚为可惜。

《民国报》的创办和宣传活动

梁先生回忆说,清帝退位,南北议和,京津同盟会



本文作者(左)采访梁漱溟先生

成员便不再摆弄手枪、炸弹，而投身于各种政治活动，我因此到了《民国报》。《民国报》是宣传同盟会主张的，创办者和编辑部人员大多是同盟会同仁。社长是甄元熙，总编辑是孙炳文。孙炳文字浚明，四川原叙府人，后来曾与朱德同志一同留学德国。我原名焕鼎，字寿铭，当记者后常用笔名寿民或瘦民。有一次孙总编辑为我写了一把扇面，上款题“漱溟”二字，正中我意，从此我便用“漱溟”为名，沿用至今，本名反而鲜为人知。

《民国报》创刊于天津，后迁到北京。该报除政治要闻版报道国内外大事和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新闻外，还开辟了若干专栏，比较新鲜的有三位同盟会女会员（苏北人何素卿、南京人杜宜君、河南人任维坤）共同编辑的《妇女专刊》，每天占报纸一角，宣传关于解放妇女的主张，提倡女权、女学等等。

《民国报》每天对开三大张，报社职工近二百人，所耗经费巨大。这大笔经费从何而来呢？这又要引出民国政坛的一段旧事。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之后不久，南方推荐王芝祥（北京通州人，原广西按察使）担任直隶都督。按《临时约法》的规定，由内阁总理唐绍仪办理一张任命书，袁大总统盖印，再由内阁总理发表，实际权限应在内阁。唐把拟好的任命书送袁盖大印，袁却拖着不办。待唐第三次登门催办时，袁才明确答复，他不同意这项任命，唐绍仪因此愤而离职。接着又有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等阁员兼总长辞职。袁不管这些，竟委任他的表弟张镇芳为直隶都督。袁的作为，引起革命派的愤慨，矛盾进一步激化。张镇芳考虑到刚上任，不能与京津同盟会搞得太僵，正好此时，《民国报》有几位张的同乡，向张诉说办报缺乏经费的事，张都督便大笔一挥，批给《民国报》十万块大洋。

《民国报》从天津迁到北京，社址在现宣武门内路西。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之后，国民党总部派议员汤漪到《民国报》负责，明确改为国民党的机关报。汤某到任后，从总编辑而下，换了一批新人，我工作了一段时间，也就退出了《民国报》。

临时总统袁世凯与民国国会

先说与袁世凯的一面之缘。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宣誓就职大典时，我作为《民国报》的记者，目睹了这场典礼。时间在民国元年3月10日，地点是参议院，院址在今国会街。主要出席者为参议院全体

员和内阁全体阁员。时间一到，军乐声起，袁世凯由议长林森陪同登上讲坛。林森首先致词，接着袁世凯宣誓就职。典礼结束后，他们由礼堂走向庭院，经过走廊的时候，袁世凯与我们记者近在咫尺，交臂而过。他矮墩墩的个头，光着秃脑袋（帽子拿在手里），留着短须，已有几根花白，胡须周围及两颊都没有修刮干净，一套军服也是皱皱巴巴的，与大总统就职的庄重典礼很不相称，尤其是那副漫不经心的模样，分明是很不郑重。

就在袁世凯宣誓就职前十天，即1912年2月29日晚，曹锟第三镇陆军两营在袁的导演下，在北京发动了“兵变”。当晚，我正陪同母亲在前门外大栅栏广德楼戏院听戏，忽然锣鼓骤停，台上的演员不知所措，见一人走到台前，大声对观众说：“戏不能再演了，外边发生‘兵变’，情势危急，请尽快各自回家吧！”我同母亲急匆匆地走出戏院，见许多“变”兵正在大栅栏一带抢劫，就像土匪进了城，空气很是紧张。第二天夜晚，“变”兵又劫掠西城。紧接着，京郊通州、高碑店、长辛店、黄村、三家店等地都发生“兵变”，进而蔓延到天津、保定各地，闹得不亦乐乎。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南京临时政府为促使袁去南京就任大总统，派蔡元培、宋教仁、汪兆铭等六人为专使和欢迎员，来京迎接袁世凯南下。专使们到达北京后的第三天，“兵变”突发。“变”兵们竟杀气腾腾地闯进了迎袁专使的住宅。“兵变”的第二天，蔡元培等不得不以北方兵变、袁世凯不能南下等情，急电南京临时政府。紧接着“兵变”越演越烈，连日、德、英、美、法诸国也借口保护北京使领馆之安全，纷纷从天津、山海关、青岛等地调兵进京，忧心忡忡的迎袁专使们再次急电南京，请求临时参议院批准临时政府可暂设北京，袁世凯可以不必南行受职云云。几天后，南京临时参议院便作出决议，接受迎袁专使的请求。于是“兵变”平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要弄了书生气十足的革命党人。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开张，参众两院议员加起来近800人，当时人称“八百罗汉”。这期间我常采访参众两院，特别是参加众议院议长竞选的张耀曾。张耀曾，字熔西，云南人，是家母的堂弟，我称他为“熔舅”。我常常从他那里打听国会的一些内幕情况。先说议员们的丑态和国民党议员的内部争斗。外地议员一到北京，便有三方面的人出面接待，实际是争夺、拉拢。一是袁世凯政府内务部的；一是左翼政党国民党；另一是操于梁启超、汤化龙之手的右翼

政党进步党。不少国民党议员经不起金钱、美女的拉拢,到北京不几天就投入到袁世凯和进步党的怀抱。当时北京有一家袁世凯资助、由议员康世铎主持的《民视报》,每天在一版报眼的显著地位刊登国民党议员脱党的报道,方法颇为特别:今天报道三人脱党的姓名,明天又有三个,累加成六人后,再登一次,罗列起来,逐渐增多,袁世凯以此打击国民党的声势。“八百罗汉”还由议院规定,每位月薪五百大洋,这使一部分议员成天在八大胡同(当时北京妓院的集中地)花天酒地,名声极坏。国民党议员内部的矛盾,还表现在众议院议长的选举上。国会正式成立后,参议院很快选出了张继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但众议院的议长由于国民党内部争夺激烈,却迟迟不能选出。后来由于袁世凯从中收买、操纵,终于在争议一个多月以后选出汤化龙为议长,陈国祥为副议长,他们都是进步党人,从此,众议院即落入右翼政党之手。国会正式成立后的另一项任务是制定一部宪法,以替代《临时约法》。参、众两院推定五名议员在天坛起草,因此当时人称“天坛宪草”。这部“宪草”是以国民党和进步党拟定的宪草作基础制定出来的。国民党方面的执笔人是张耀曾,进步党方面的执笔人是梁启超。《天坛宪草》的基本精神与《临时约法》一致。袁世凯曾派施愚等人干预“宪草”的制定,但被议会拒绝了,袁世凯十分恼怒。正当《天坛宪草》准备交付参、众两院讨论的时候,袁世凯于1913年6月先后下令免除了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的职务,“二次革命”立即爆发。袁世凯却借口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与“乱党”(指举行“二次革命”的革命党人)有联系,下令收缴了国民党议员的议员证书,随后又指令内阁总理熊希龄解散了国会。

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成立

梁先生说,民国建立以后,天真烂漫的同盟会会员们以为大功告成,接着就是召开国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实行宪政了。于是便有“中国革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之议,意即革命成功,不必再有“革命同盟会”这样的名称,而应成立宪政下的普通政党——国民党了。

据梁先生说,当时他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成立的大会。在这之前,先有孙中山和黄兴联名电告同盟会各支部,就改组为国民党事征询意

见,而后孙中山和黄兴两位领导人莅临北京。

这时南京临时政府已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以为只要袁世凯离开他多年盘踞的巢穴北京,到南京就职,有着《临时约法》的规定约束,实行内阁制,他便不敢胡作非为了。可是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就是不离开北京,反而邀请孙中山来北京商谈。于是南京临时政府又作了让步,孙中山、黄兴从南方来到北京,同时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成立大会。

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成立的大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举行,时为1912年8月间。大会的议程,包括审议改组计划,通过党纲、党章,选举党的领导人等。这时的国民党,实际由五个团体组成,即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以同盟会人数最多。孙中山在大会上宣布国民党的五条施政纲领,大家热烈鼓掌,顺利通过。不料在讨论、通过党章时,孙中山先生因事暂时离开了会场,会场上出现了风波。原因是党章以英国政党章程为模式制定,由于当时英国尚未解决妇女参政问题,因此英国政党的党章中没有提到可以吸收女党员,故国民党党章亦然。而同盟会则历来重视女权,一直是有女会员的。因为这一条,引起到会的同盟会女会员唐群英、沈佩贞、伍崇敏等当场提出质问,使主持会议的宋教仁一时无法答对。这几位本来就很泼辣的女将,盛怒之下一轰而起,登上主席台,揪住宋教仁不放,会也开不下去了。正闹得不可开交,孙中山回到会场,女将们才松了手。

会议最费时间的是选举党的负责人。在工作人员向到会人员分发选票时,黄兴、孙中山便先后发表演说。黄兴讲得很短,孙中山讲演的题目是《解决民生问题》。孙中山威望高,口才好,主持会议的人为维持会场秩序,避免再起风波,就希望孙中山讲得越长越好,最好一直讲到收回上千张选票、作出了准确的统计时为止。于是主席台上便出现了有趣的场面。只见大会工作人员之一的张继,站在孙中山身旁,每当孙中山露出要结束的话头,张继就揪揪孙中山的衣服,示意孙中山继续讲下去,如此反复多次。由于天热,穿的又是西式大礼服,孙中山在台上不断地喝水,擦汗。这次大会开了整整一天,会议一致选举孙中山为国民党中央理事长。这一改组,包括我在内,大家都由同盟会会员(或别的组织的成员)变成了国民党党员。

(责任编辑 程度)

开创大西北生态林业的先行者

● 黄 俭

邓叔群是中国第一批 81 位院士之一，是 1955 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之一。他是我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真菌学和森林学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1991 年，世界著名真菌分类学家、美国康奈尔大学真菌学名誉教授 R.P.Korf 在总结康奈尔大学 120 年对真菌学有突出贡献的 41 位真菌学家时，向世人宣布：唯一的一位东方人就是 S.C.Teng——邓叔群。

被国人誉之为“我国真菌学先驱”的邓叔群，亲自实践了他所提出的全面发展真菌学的战略思想，奠定了中国真菌事业的基础，使真菌在我国工、农、林、医以及国民经济建设上给人们开辟了一条广阔的路。

特别是近几年我国开发大西北战略启动以来，知道他的人们就不免想到他对于“生态林业”的科学论述，以及他在西部所作的开创性的实践。

靠“一手掌舵一手划船”的精神苦读成才

1902 年 12 月，邓叔群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少年时代，曾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但他求学上进的心不死，劳作之余，常常在学堂窗外听课，或者翻看父亲桌上的书和给学生批改的作业。深受感动的父亲后来终于给他找到了一个在福州市一中免费旁听的机会。邓叔群从此更是发愤学习，立



下自强不息的恢宏志向。在他 13 岁那年，清华学堂在全国招收留美预备生。邓叔群凭着在艰苦生活中培养的“一手掌舵，一手划船”的自立精神，没与家人商量，只身进了考场。天道酬勤，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而且深得国语教师的喜爱。因为他在《入清华有感》作文中的第一句话，写的就是“清华的建立是我国的国耻”。

带着如此强烈的爱国目的来学习的邓叔群，在清华求学 8

年中，承受着沉重的经济压力，完成了所规定的学业，克服了语言上的障碍（非但练就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清华校方的无息贷款，被派往美国留学。出国前，在同学们讨论五年留美选何专业的时候，“立志不能改天也要换地”的邓叔群，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农业科学。

邓叔群在以生物科学著称的康奈尔大学就读。两年读完了康奈尔大学要求的全部必修课程和学时数量。他所攻读的森林学和植物病理学成绩，始终处于“宝塔”顶尖的 A 级，并分别获得该学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由于邓叔群有出色的学习成绩和极强的科研能力，由该校真菌学教授 H.M.Fitzpatrick 和植物病理学教授 H.H.Whetzel 推荐，经委员会选举评定，邓叔群成了全美最高科学荣誉学会 Phi-Kappa-Phi 和 Sigma—Xi 成员，并荣获两枚金钥匙勋章。

他在康奈尔大学的最后一学期，已经获取

博士学位所必须的德语和法语考试（在美国英语被称为母语，当时不算外语），在博士学位研究已近尾声的时候，国内岭南大学决定秋季开设植物病理学课程，急需这方面的教授。H.H.Whetzel 教授推荐了邓叔群，但建议岭南大学推迟开课，用以给邓叔群完成其博士论文的撰写时间。谁知邓叔群得知此事，毅然表示立即回国。他说：“写论文只是为了获得个人学位，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一张文凭。我到美国来学习的目的，是要获得先进的科学知识，不失时机地为祖国服务。”Whetzel 教授见他如此坚决果断，感动地说：“你真是个优秀的年轻人，相信你会为中国作出一番事业的……”同时欣然将一本绝版的色谱工具书签名相赠。

视官位为粪土，甘做一头吃苦的“老黄牛”

1928 年的秋天，邓叔群满怀着报效祖国的宏愿，告别康奈尔回到了祖国。北京农业大学前副校长、研究院院长沈其益教授是这样回忆他的：“邓叔群教授是我 1929 年—1933 年在南京中央大学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的老师。当时，他是年仅 26 岁的青年教授，教书育人声誉极高。他所编著的英文教材，精简扼要，使青年学生受益良多。他还亲自带领我赴郊区采集鉴定标本……增强我的实践能力，提高我对学科学习和研究工作的兴趣。教学之外，时与我谈论学科发展以及他在美国学习、生活、研究的情况，以生动的事例表述了他钻研科学，努力进取和一片赤诚爱国之心。他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奠定了我国植物病理学、真菌学基础，为创建现代化造林营林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1，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激怒了满腔热情投身于“科学救国”的邓

叔群。他怀着沉痛的心情，更为加紧地工作。他跋涉于荒山野林、耕耘于室内室外。南至海南，北到甘肃，东从江浙，西抵川滇，栉风沐雨，忍饥挨饿，寻觅采集我国大自然界的真菌资源。他依据实际标本亲自鉴定数以万计，亲自定名的菌种就有 3400 多种，占全国真菌定名的一半以上。他发现了 5 个新属、121 个新种。1938 年，他在精神极其沉痛和战火不断蔓延的险恶环境里，夜以继日地将他回国后 10 年以来的真菌研究工作进行了总结，完成了 600 多页的英文版巨著《中国高等真菌》，填补了我国在真菌史上的空白。在这本书的扉页上他写着：“……在极其艰难的工作环境中，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谨以此书纪念难忘的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入侵东北三省。”

“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被置于水深火热之中。日寇的猖狂，国民党的无能，人民的疾苦，日夜熬煎着他那颗救国救民之心，他产生了转换研究重点为国计民生作些见效快的实事的念头。于是，在《中国高等真菌》付梓以后，他就立即率领年轻的林业工作者，首先深入到西南原始森林区调查考察。对那里的 7 个树种的蓄积量、生长量和病虫害情况进行考察，根据调查研究成果，提出经营方针，以及林木的更新方法和保护技术措施等，以利林区资源的利用和保护。



1948 年邓叔群全家在上海合影。右一：邓叔群，正中：陆桂玲，左一：长子邓煌；后排右一：长女邓泳，左一：次女邓庄；前排：幼女邓颐

1939年，正当邓叔群准备深化森林科学研究的时候，国民党中央政府拟任他为农林部副部长，被他断然拒绝了。他说：“我不愿做官，宁可做一头老黄牛。牛吃的是草，还能为人耕田、拉车；牛奶还能给人营养。牛患了胆结石，痛苦的是牛，而牛黄（牛的胆结石）却是能为人治病的贵重药材。牛的全身都是宝，对人都有利。”他对亲人、友人则坦诚地讲：“现在不少贪官发国难财，我绝对不能与他们同流合污。”邓叔群埋头工作在艰苦的林野生活中，他身先士卒，无所畏惧，而且豪情满怀，鼓励同伴去拼搏，去战斗。这有他1940年4月在云南丽江写的一首英文歌曲《中国森林工作者进行曲》为证，歌词大意是：我们跨越高原前进，进到云杉林，进到云南的松林。不管天雨和天晴，我们总是兴高采烈，挺立着，工作着，抢救我们的正在消灭的原始森林……

他于20世纪40年代初就在中国西部撒下了新学说种子

“生态林业”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林业发展和环境保护运动兴起的结果。在我国到80年代才受到重视，成为当前林业发展方面最时髦最科学的方向。但是，早在20世纪40年代邓叔群教授就提出了包括生态林业的核心思想计划。在他从西南考察原始森林以后，他认为要治理黄河泛滥，水土流失，必须实施林、农、牧、水利并重，同时还要系统地整治西北林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他的这种想法，得到了清华校友、当时任甘肃省建设厅长的张心一先生的支持。张先生聘他为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森林部经理。邓叔群为实践自己的计划，进行西北干旱地区造林营林的研究，便在该省地图上还找不到的卓尼设立工作站。行前，好多朋友提醒他，进入原始森林的卓尼，必须随身携带刀枪弓箭，以防野兽和坏人的袭击，且不可携带家眷。但秉性刚强的邓叔群，义无反顾地将全家由四川的北碚搬到了卓尼。从此，邓叔群一家所需的油粮及生活用品，全要用牛车从百里之外的岷山县拉来。没有学校，他就教孩

子们种菜、劈柴、养鸡、放羊……他认为这是磨炼人的极好机会。正像他说的：“人生万物须自为，跋涉江山即寥廓。”

黄河、洮河上游，有个调节水源的大面积原始森林。当时的藏族林主为了扩大放牧草场，把树木卖给木商，定期砍光树木，烧山开荒。这样，年复一年，大批的原始森林就不复存在了。加之，汉族农民开垦草场种粮食，水土流失则日益严重，更加重了黄河下游的灾难。邓叔群决心改变这种不符合生态科学的状况。他责令公司在卓尼买下藏族林主的大片原始森林，建起了洮河中心林场，制定了一整套保证森林的更新量和营造量大于采伐量的科学经营管理制度，他又在洮河的大峪沟、卡车沟和绿珠沟建起了三个分场和一个畜牧场。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就摸清了大峪沟森林的组成、森林资源的面积、蓄积、分布、病虫害、草山以及林副特产等情况，并绘制了《地形林型图》，为林型在我国的划分、绘制和应用开创了先河。在卓尼期间，邓叔群教授依据实际调查写下了不少林业论文。其中的《中国森林地理纲要》一文，成为中国森林分区前期工作中极为重要的文献。他为黄土高原创建的“水平沟造林”结合耐寒抗旱先锋树种的方案和措施，如今在甘肃干旱荒山造林绿化中，被普遍推广应用……

在洮河流域调查研究之后，邓叔群更深信他早年思考的关于生态林业的核心思想计划的正确性。从1943年开始，他又选了甘肃岷县木寨岭北麓的小林沟区建立林、牧、农结合的生态林业基地——木寨岭牧场，进行科学实验，以期做出样板，推广全面。虽然这一实验后因战乱而中途夭折，但“生态林业”这一崭新学说的种子，总算在中国的大地上撒下了。

他的同事们为他唱的赞歌

邓叔群为发展“生态林业”所做的艰苦努力，为人们铭记不忘。

曾在甘肃与邓叔群一起工作过的原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所长周重光教授，讲过这样

几件事：

在祁连山调查时，有次晚上渡黑河主流的一个大峡谷，河谷宽约 20 米，深近 30 米，水流湍急，响声如雷。马从水流稍缓处凫过水去，人要从横跨两岸的粗草绳上，手足倒悬爬行而过。向导和一位同事先爬过对岸，再将行李等杂物从草绳上拖过河。大家都平安过去了，待邓先生最后一个爬上草绳时，草绳由于多次负重磨损，已明显下垂了，同事们担心万一草绳断裂后果不堪设想，而邓先生却十分镇静和沉着，他尽力控制草绳，使其减少摆动，慢慢地慢慢地渡过了黑河。这时，我们大家才为他松了一口气。

在卓尼，一次山洪暴发，去河边提水的九岁小女儿不幸被洪水冲走，连尸体也未找到，邓先生忍着内心的极大悲痛，反劝前来安慰他的同事，坚守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继续工作，绝不动摇。

1946 年 9 月邓叔群写过一首英文诗：

我愿是一只鸟，独自冲向云霄，
不怕雷电风暴，展翅翱翔长啸，
脱离那尘污浊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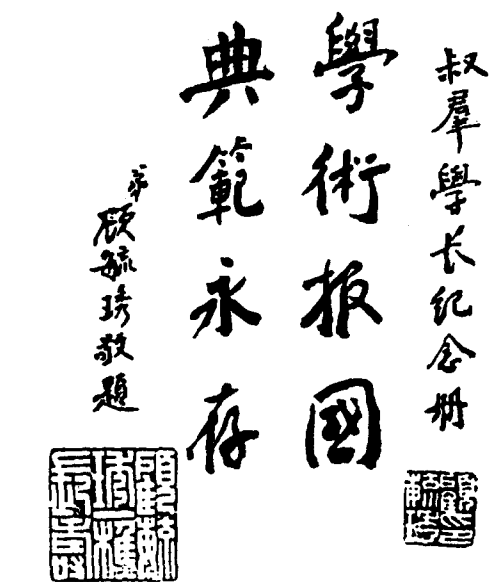
我听到自由的呼声，在向我召唤。

诗中反映了邓叔群对自由的渴望，也反映了他对国民党统治的强烈不满。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中伦在谈起邓叔群时说，解放前夕，邓先生坚决抵制“中央研究院”国民党行政当局动员该院研究人员携带家属撤往台湾的决定，而且还谢绝了去美国和加拿大考察的邀请。

1948 年冬，邓叔群的学生沈其益受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委托绕道香港秘密到上海，邀请邓叔群教授到解放区工作，他激动不已，欣然应允，并将他 1946 年所写的英文诗中的“我听到自由的呼声，在向我召唤”，改为“遵循你的指示，我惟命是从”。以表达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一颗挚爱之心。

当时邓叔群患严重气管炎，咳嗽不止，多次吐血。他安排助手周重光先走一步，自己在抓紧治病的同时，争分夺秒，赶写出几十万字的大学林学教材，以备赴解放区办林业大学之



用。

新中国建立以后，他三次主动提出减薪；抗美援朝时，他将抗战前多年积蓄在南京建造的花园住宅捐献给国家；1955 年他从郭沫若院长手中接过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聘书；1956 年，他成为第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一个；1960 年，他受国家林业部委托，花了三年半的时间，培养了 50 名高质量的森林病理学研究生，他们大都成为我国林业战线的骨干。

就是这样一位有松柏气节，有云水情怀，业务上精通，政治上过硬，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我国著名的植物病理学家、真菌学家和森林学家，正雄心勃勃地为祖国大干一番的时候，厄运突然降到了他的头上。

1966 年，邓叔群的胞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由于“三家村”冤案，在“文革”中成了首批受害者之后，又株连到邓叔群一家。邓叔群变成了“三家村的科学顾问”、“三家村黑帮”。在他饱受非人的虐待和摧残后，于 1970 年 5 月 10 日含冤而死。粉碎“四人帮”后，邓叔群冤案得到彻底平反，1978 年 7 月 29 日，中科院为邓叔群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邓叔群终于可以瞑目了。

（责任编辑 洛松）

朱德周恩来胜利指挥第四次反『围剿』

● 虞平



红军时期的朱德



红军时期的周恩来

萧克同志说：“过去讲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的历史时，讲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是毛泽东指挥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是从共产国际来的李德指挥的，遭受了严重失败；而第四次反‘围剿’不讲谁指挥的，只讲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思想影响下取得了胜利。”萧克明确地讲：“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朱德指挥的，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历史事实，要如实讲。”（见《纵横》2000年第11期，蒋杰：《萧克指导我们正确评价历史》）本文告诉你的就是这一段历史的真实：

不顾周恩来、朱德意见，毛泽东 被调离红军指挥岗位

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亲自指挥下，成功打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后，主力部队向东转移，在以瑞金为中心的石城、长汀、于都、会昌四县，大力开展根据地建设工作，并逐渐地向南面的武平、寻乌等县发展，使赣南和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不久，一个囊括赣南、闽西 21 座县城、250 万人口和 5 万平方公里面积的中央苏区，即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了。1931 年 11 月 7 日至 20 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这次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瞿秋白、任弼时、方志敏等 63 人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瑞金改名为瑞京，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

喜讯接踵而来。12 月 14 日黄昏，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 1.7 万

余人在宁都正式发动起义。起义部队开进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使红军队伍中又增加了一支劲旅。

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经过半年多的精心准备,又开始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大规模的“围剿”。他于1932年6月18日在江西庐山召开鄂豫皖湘赣五省“清剿”会议,制定第四次“围剿”红军的计划,决定先集中主要兵力解决鄂豫皖、洪湖、湘鄂赣三块根据地,再移兵中央根据地,“围剿”红一方面军。蒋介石视这一次“围剿”为“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声称“不能成功,誓当成仁”。为了保证这次“围剿”的胜利,蒋介石向外国贷款购买许多武器装备,又聘请一大批外国军事顾问。另外,他还接受了政学系杨永泰设计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剿抚兼施”、“行政督察”、“保甲”等政治措施,尤其是推行“保甲制度”,厉行“连坐法”,强制居民各户互相监视和互相告发,企图以此把人民群众与红军隔离开来。

与此同时,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也已经开始了。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多次致电中央苏区中央局并转达中共临时中央局,在认真分析敌情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反对敌人第四次“围剿”的战略方针,认为中央苏区红军目前的行动,“最好能立即出击敌人,开展闽北,发展局势,振兴士气,并给鄂豫皖、湘鄂西以直接援助。但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严重错误。”朱德还和毛泽东于1932年9月26日联名发布了《敌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就反对敌人第四次“围剿”作出了战略部署,提出中央苏区红军“为要造成胜利的进攻,以粉碎反革命的大举进攻的优越条件,决定战备的在这一向北地区做一时期(十天为一期)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及本身的教育训练工作。”训令还对战场布置、军事要求以及作战区域的划分等方面,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然而,自1931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

义不仅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而且发展到严重危害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程度。自中革军委成立后,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下的党中央,就开始着手从红军中排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至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尽管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一再提出,应留毛泽东在前方指挥红军打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亦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军职,但是,毛泽东还是被以苏维埃工作需要的名义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的工作责任。毛泽东离开红军总部回到后方后,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

朱、周制定建黎泰战役计划,主动出击;下密令,给敌以各个击破

毛泽东离开红一方面军领导岗位后,朱德和周恩来根据既定的战略方针和部署,并依敌情变化灵活指挥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

朱德据各方面得到的情报分析,判断蒋介石对全国苏区已经发动的第四次“围剿”,是利用各个革命根据地处于分散状态,不易配合作战的弱点,“逐次转移重兵来实施其各个击破的计划”。他认为虽然敌军还没有将重兵转移到中央苏区来,但红一方面军必须乘敌军上述部署尚未完成之时,出其不意地迅速占领建宁、泰宁、黎川,并消灭其守敌,以积极防御之势,来策应各苏区红军互相呼应作战和击破敌人。他与周恩来等研究和制定了《建黎泰战役计划》,并指挥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作战。在短短的两个半月时间里,红一方面军在朱德和周恩来的指挥下,相继攻占了泰宁、黎川、建宁、资溪、金溪等7座县城,开辟了黎、建、泰新根据地,打通了闽北根据地,联系了赣东北,为第四次反“围剿”创造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除乘敌尚未转移到中央苏区之际,主动出击,扩大根据地外,朱德和周恩来还认真分析敌军此次“围剿”的特点,制定破敌战略。朱德认为,敌军在这次“围剿”中增加了更多的兵力,目前正在布置对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加速修筑包围与侵入中央苏区的公路;建筑沿苏区周

围的坚固工事,加紧组织苏区边境的民团,实行对苏区最高度的经济封锁等,这表现出其与前三次“围剿”所采取的步骤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战略战术上,都有相当的变更和进步”。那么,要运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才能打破敌人的这一次“围剿”呢?朱德觉得无论如何不能抛弃在前三次反“围剿”战役中使用过的战略战术原则。他与中革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商量后,于10月26日联名发布《给各作战地域指挥部的密令》,规定在中央苏区内划分东北、赣江流域、东南三个作战地域和若干条后方联络线,明确强调红军一定要根据“去年一、二、三次战役的宝贵经验”,改正过去许多战役中的错误和缺点,来准备和进行全战线上的运动的战斗。“必须以集中的力量给敌人弱点以最重大的打击,来各个击破敌人。”同时还要求“红军兵团特别是基干兵团(如方面军)应依照国内革命战争的要领,集结而灵活地逐次给敌人弱点以致命的打击,各个消灭敌人。还要求各作战地域均应独立作战,部署积极运动的防御进攻战斗,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到敌人的翼侧后方动作起来,钳制和调动敌人许多部队”,进而为红军主力部队在转移突击方向中消灭敌人。

与陈诚斗智,上清宫红军首战告捷

1932年冬,蒋介石在结束其对鄂豫皖和湘鄂西的“围剿”战事后,按计划以50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举行大规模“围剿”。他任命何应钦、陈济棠分别为赣粤闽“围剿”军总司令、副总司令,陈诚为赣军总指挥兼前敌总指挥,余汉谋为粤军总指挥,刘建绪为湘军总指挥。为加强实力,蒋介石还把在上海抗日前线的第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参加这次“围剿”。一切布置妥当后,他于1933年1月赴南昌组织行营,亲自指挥这次“围剿”。一开始,敌军兵分三路进攻红军。陈诚指挥的蒋介石嫡系部队12个师为中路军,蔡廷锴指挥6个师又1个旅为左路军,余汉谋指挥6个师为右路军。中路为进攻的主力军,左右两路负责“堵剿”。但是,左路军因受闽赣

边红军的有力牵制和打击,迟滞不前,右路军因最近在南雄水口与红军作战遭到严重打击,不敢再战,借口军队补给困难和赣南粮荒严重,也迟迟不肯前进,三路敌军实际上只有陈诚中路军一路前进。中路敌军的肖乾第十一师,是蒋介石手中最精锐的部队,也是陈诚起家的基本部队,号称“王牌师”。该师气焰十分嚣张。

陈诚侦知红军主力集中在黎川、建宁、泰新等地活动后,便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的战略,将其指挥的12个师约70个团16万人编成三个纵队:罗卓英第一纵队长率4个师在宁都、广昌等地,堵击红军主力退路和深入红军后方袭击;吴奇伟第二纵队长率4个师在黎川、建宁、泰和等地侧击和截击;赵观涛第三纵队长率4个师在金溪正面进攻黎川,阻击红军主力。陈诚的如意算盘,是在黎川、建宁歼灭红军主力后,再进攻广昌,摧毁中央根据地。1月上旬至2月中旬,三路敌军相继向预定地域移动集结,正式开始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敌军向中央苏区的“围剿”开始后,红一方面军在朱德和周恩来指挥下,隐蔽地向北运动,寻机歼敌。由于成功地破译了敌军电台的密码,朱德对敌军的指挥和部队的调动了如指掌。1月上旬,红军挥师北上至南丰、南城、金溪、贵溪一带地域,集中兵力在上清宫一举全歼敌军周浑元第五师,首战就取得了俘敌旅长周士达以下2000余人的胜利。

变被动为主动,朱、周设下铁口袋

然而,不顾敌情实际的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这时却命令红一方面军进攻敌军重兵设防的南丰城。尽管朱德和周恩来根据敌情对此命令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但还是被迫强制执行。

南丰,是敌军自江西东面进攻中央根据地的战略支撑点,修筑有坚固工事,易守难攻。

2月1日,彭德怀奉命率红三军团主攻南丰,守敌毛炳文师的五个团拼命抵抗。红三军团先后两次对该城发起猛烈强攻,但均未奏效,自己伤亡不小,第三师师长彭邀在亲临前线侦察敌军城防情况时,不幸中弹牺牲。朱德、周恩来、

刘伯承等方面军首长都来到这里观察敌情，商议下一步战斗计划，当即决定改强攻为围攻，以减少更大的牺牲。遭红军围攻的毛炳文害怕被歼，频频向陈诚告急。陈诚以为这是消灭红军的极好机会，企图一举将红军主力围歼于南丰城下，抚河西岸。他令毛炳文师固守南丰，令第二十四师派兵驰援，将红军主力吸引在南丰城下。同时，令中路军三个纵队火速集中后开往南丰、黎川，内外夹击红军主力。朱德和周恩来、彭德怀等根据守敌死守待援和援敌三路进逼的敌情，毅然决定红军主力撤离南丰，伺机歼敌。红十一军奉命由新丰街渡河到黎川，钳制敌军第三纵队和迷惑敌军第二纵队，并继续将敌军向康都方向吸引；红三军团主力与红一军团奉命西撤，转移到宜黄、乐安之线以南，侧击沿永丰、宜黄苏区边缘东进增援南丰之敌。

陈诚对红军主力撤离南丰、伺机歼敌的战略计划全然不知，他误以为东进的红十一军就是红军主力，当即下令按原计划全力向东追击。2月下旬，敌罗卓英第一纵队李明第五十二师、陈时骥第五十九师分两路由南丰、乐安出动，计划先在黄陂会合，再向广昌、宁都推进。该敌为蒋介石嫡系，兵员、给养充足，装备极为精良，各步兵班配备有法国制造的“哈齐克斯”新轻机关枪和德国制造的新式自动步枪。该敌依恃武器装备优良，不分昼夜大胆地向广昌、宁都推进，逐渐与其第二、第三纵队拉开距离，翼侧裸露，孤军深入。两师相隔摩罗嶂大山分路前进，联络相当困难。他们一直以为红军主力是在黎川、建宁一带，都想到那里去拿头功。然而，在前面等待他们的却是朱德和周恩来在东陂、黄陂以西，东坑岭、固岗、登仙桥以东地区设置的铁口袋。

2月27日下午，黄陂地区继续下着连日以来的细雨浓雾，十米之外视线不清，敌五十二师正在登仙桥和黄陂间爬山，此时，该敌前锋第一一

七旅旅长方靖正“信心十足”地打着如意算盘：当遇到红军后，怎样将其“一举全歼”。突然，他听到枪声大作。当摸清情况时，方知遭到红军的伏击。预伏在此的红军左翼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二十一军，在猛烈袭击中，将敌拦腰切成数段。激战中，红九师师长李聚奎率部直插大龙坪，包抄猛袭敌第五十二师师部。由于机枪连直接参与冲锋，火力很猛，仅仅40分钟就拿下敌师部。敌师长李明被击成重伤，当了俘虏。与此同时，敌第五十九师由西源向黄陂行军至霍园一带峡谷中，遭到右翼红军红五军团和红二十二军的猛烈袭击，顷刻间，就有四个团被歼灭，敌师长陈时骥率士兵数十人逃避于山林之中。此时，他不知道仅一山之隔的李明已先他一步当了俘虏，还把自己逃生的希望寄托在李明这个师的身上。于是，他向李明写信求援，信中称：“弟无能，于本日午后一时失利，现部队已溃散，弟仅率士兵数十人在距蛟湖七八里许之山庄中，请迅速援助为盼！”送信人在大龙坪被抓，信亦被缴获，陈时骥在左等右等不见回音的情况下，只得率残部乘夜向蛟湖方向逃窜。他逃至登仙桥附近，还是被红军左翼部队活捉。这就是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红军一举歼敌近两个师的著名的黄陂战斗。正率领江西地方武装出没于千岩万壑和羊肠小道之间，配合红军作战的江西军区总指挥陈毅，得悉黄陂大捷，高兴不已，诗兴大发，不禁赋《乐安宜黄



宜黄县黄陂蛟湖歼敌地点

道中闻捷》诗一首：“千崖万壑供野宿，羊肠鸟道笑津迷。半夜松涛动山岳，中天月色照须眉。工农儿子惯征战，四破铁围奇中奇。”

蒋介石唉叹“惨凄异常”；毛泽东称赞是给敌以“最致命的打击”

陈诚在黄陂丢掉了两个师后，判定红军主力已转至广昌地区，决定取道黄陂、东陂、新丰、甘竹直逼广昌，企图在这里会合其他左右两路部队，围歼红军主力。他把自己中路部队的三个纵队，缩编为罗卓英第一纵队和吴奇伟第二纵队，由原来的分进合击改为两纵队重叠作中间突破。敌军一心想中间突破红军阵线，占领广昌，并欲使止步不前的粤、闽左右两路军前进，以收合围之效，竟然不顾前后两个纵队重叠，以六个师纵深配备行军，长径达三日行程以上。这是犯了兵家之大忌。

敌变我亦变。朱德和周恩来根据敌情的变化，确定红军的战略是“以各个击破为原则，以红十一军钳制和吸引其先头纵队东进，待其通过四个师后，即截断敌之后纵队两个师（十一师和九师）。”接着，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红军分为左右两翼分别隐蔽于广昌北面之东陂、草台冈西侧和南侧，张网以待。

3月21日，敌向广昌方向加速前进的前纵队并配属第五师抵达甘竹，与后纵队相距长达90里，已不能及时回援，朱德和周恩来抓住战机，指挥红军左右两翼部队在草台冈、东陂之间的霹雳山对敌后纵队两个师发动猛烈攻击，一举将该敌分割包围。红军端着刺刀向敌军阵地冲锋陷阵，与敌人短兵相接，“反复冲锋，白刃肉搏十余次”。激战至下午，敌第十一师被歼灭大部，所剩不过一团人，敌十一师师长肖乾、师参谋长和第三十一旅旅长均被击伤，独立旅旅长陈君峰被击毙，团营长死伤数名，连排长伤亡更大。敌第九师派出增援其第十一师的一个团，亦在东陂附近被红军歼灭。敌第五十九师残部被消灭殆尽。红军在黄陂、草台冈战斗中共歼敌三个精锐师，俘虏敌军1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还缴获新式机关枪300挺，大炮40门和其

他许多新式的自动武器及望远镜等军用物资。这次战斗叫草台冈战斗，又称黄陂战役，是第四次反“围剿”中的又一次著名战斗。中路军总指挥陈诚从电话中得到这两次战斗失败的报告后，“如丧考妣。据说，他在接到电话报告时，手里握着听筒，足有四五分钟之久，一句话也说不出”。敌前后纵队惨败，所剩无几，残部犹如惊弓之鸟，经南丰向临川方向撤退。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的第四次“围剿”至此失败。蒋介石又恼又羞，他在给陈诚手谕中发出了“惟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的哀叹。陈诚亦视此次失败“独生为羞”。

毛泽东对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这一胜利是“空前光荣伟大胜利”，它给予蒋介石“以最致命的打击”，这对国民党来说，“也许是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

反“围剿”战役结束后，朱德撰写了《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一文，及时总结第四次反“围剿”战役胜利经验，进一步丰富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他认为这次反“围剿”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胜利，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实行了战略转变，具体地说，就是与前几次反“围剿”战役相比，这一次不是诱敌深入到苏区内部，“待敌人集齐，使其疲惫，择其弱点，集中主力以袭之”。“此次战略的不同点，是在择其主力，不待其合击，亦不许其深入苏区，而亦得到伟大胜利。”不久，朱德又发表《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一文，联系实际战斗的经验，“从军事理论研究的角度”，提出了六个战术基本原则。

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乘胜收复敌人在第三次“围剿”中占领的土地，使中央根据地得以巩固与扩大，地跨湘赣闽粤四省，并与闽浙赣根据地连成一片。红一方面军的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全军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总兵力已达10万人。中央根据地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

（本文选自最新出版的《朱德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一书第十一节，文字有删节，小题目由本刊编者所加）（责任编辑 洛松）

也谈陈独秀晚年的生活来源

● 吴孟明

2001年《炎黄春秋》第4期舒芜在《佳人空谷意，烈士暮年心——读陈独秀致台静农书札》一文中，对抗战时期陈独秀每月300元生活费来源问题引述了蒋梦麟在《新潮》中的一段话：“（陈独秀）抗战期间住在重庆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他，政府也要我们维持他。有一次我忽然接到他的一封信，说我们寄给他的津贴没有收到，是不是已经停止了？”对此舒文提出了一系列疑问：“这每月三百元，是学校要致送，而取得国民党政府同意，还是政府所授意？是以什么名义支付的？是作为聘一名教授的薪俸，还是没有正式名义的特别的‘津贴’？”舒芜分析认为，北京大学的钱不论以何种名义致送，陈独秀是把它作为工资一类性质来接受的（舒推测，陈可能以“讲座”的职称受聘于北大，北大则以每月300元致送）。陈不愿无功受禄，曾抱病整理出两部著作，拟交北大出版，来抵此工资。

此后，刘敬坤也对此事进行了考证（见《炎黄春秋》2001年第7期《抗战时期陈独秀300元生活费的来源》）。经过一番分析类比之后，得出如下结论：“陈独秀当过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以北京大学名义每月供给陈生活费300元，这和浙江大学每月供给贺昌群生活费300元同一意义。看来这是教育部安置流亡到后方大、中、小学教师的政策。每月300元的薪俸，是抗战前上中级教授的待遇。”

以上二文中对陈独秀晚年三百元生

活费来源的种种推测，不仅于事实不符，也是有悖于情理的。

我作为陈独秀的亲属和后裔，不能不根据我在家中所知道的情况，予以澄清，以免以讹传讹。1938年我和祖母（陈独秀的胞姊）一家人到武汉与陈独秀会合后，一同乘船入川，一直定居在江津，我在国立九中上学，直至1942年陈独秀在江津去世。陈独秀这段时期的生活情况和经济来源我是知道的。我当时就知道这三百元是北大同学会给陈独秀每月的生活费。当时北大同学会在知识界知道的人很多，如罗家伦、傅斯年等都是北大同学会的，其中大都是陈独秀的学生。当时北大同学会还派罗汉来照顾陈独秀，后来在重庆大轰炸中罗汉被炸死了，就由何之瑜来接替。

很多年以后，因南京《周末》报登载《陈独年及其小儿子在江津》一文中有很多讹误，松年叔写信给《周末》报编辑部更正，现按此信原稿最后一段抄录如下：“先父生前的生活来源，系北大同学会以某刊物名义付给生活费用，并派员到江津照顾他们的老师以便于和同学会联系，先有罗汉君，后有何之瑜君。并没有商务印书馆的稿酬。去世后的一切费用均由同学会转来各方面的奠仪。本人岂能忘却同学会诸公对先父生养死葬之恩耶。陈松年亲笔。1985年10月12日于安庆。”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这三百元生活费与国民党官方的授意或什么特别津贴是毫无关系的。

（责任编辑 仲文）

黄克诚被诬的“黄金案”始末

● 易知难

1959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错误地作出了关于所谓“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决议。随之，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留下深刻的教训。

庐山会议结束后，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批斗彭德怀、黄克诚。在一次批斗黄克诚时，揭发出了耸人听闻的所谓“黄金”问题。提出此事的是吴法宪。它像一颗突然爆炸的重磅炸弹，使与会者哗然：一向被认为清廉、克己的黄克诚，似乎一下子成了大贪污犯，甚至有人说是黄克诚“为军变准备经费”。

所谓“黄金案”是指1945年9月新四军三师奉命从苏北调往东北时所带的一部分经费。黄克诚是该师的师长兼政委，翁徐文是该师的供给部部长。当时数万大军千里出动，当然不能不带钱。三师在苏北根据地经营了好多年，由于认真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积累了一点经费。大军出动时，这些经费除换了些法币外，把只限于苏北根据地流通的货币，设法换成了黄金，以备紧急情况下使用。由于用得节省，一直到东北根据地建立、部队改编时，师部所带的金子还有一些剩余。经取得上级同意，将这一部分经费带到西满军区。黄克诚任该军区司令员，翁徐文任该军区供给部部长。1947年底，为便于保管运送，西满军区供给部将金子炼成金条，经黄克诚和东北局负责人李富春批准，派专人将金条送交东北银行。

1949年夏，黄克诚出任湖南省委书记。因湖南烈士多，是老革命根据地，又是新解放区，怕有特殊需要，黄克诚让翁徐文请示李富春批准并向东北局打了领条，把在东北未用完的黄金带到湖南。当时造了库存黄金清单（有关人

员每人一份，共五份），用两个箱子（内保险箱、外木箱）、两把不同钥匙（一个人一把），每天24小时由陈烨、王之庆、吴子昌等轮流值班，有持枪警卫看守，做到人不离箱，箱不离人。到湖南后，开始用了少许救济军、烈属（领款打了领条）。由于省里经济情况较快好转，这笔钱就用不着了。1949年9月，将这笔钱如数交给了湖南省财政部门。

为查此案，1959年11月，中央派工作组到湖南。对翁徐文等进行了审查，一再要他们交待“伙同黄克诚的贪污问题”及黄金的来龙去脉。

翁徐文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过秋收起义、历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始终保持了老红军、老八路艰苦朴素、廉洁自律的光荣传统。战争年代，翁徐文经管过很多钱、财，他认为这都是党的财产，自己是在为党管钱。在无严格监督的情况下，他尽管“长袖善舞”，却依然“两袖清风”。他在战争中管理公家的财产很仔细认真，金钱来往均由会计、出纳管理，而且都有经手人和证明人，特别是事关钱财，怕有非议，十分小心，事过十多年以后，战争年代的重要收据和来往账目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其中有一张签名盖章的重要收据，是翁派人将74根金条（每根10两，共740两）送交上级主管部门时经收人写的。还有因财产移交问题，李富春给翁徐文的回电稿，以及1949年9月，湖南省财委收点黄金等给经手人写的收据，写具“陈烨同志交来黄金867两、银元2133元。经手人王之庆，引证人翁徐文”。这在当时来说，手续已经算是很完备和清楚了。

翁徐文保留的重要收据和账目，为澄清

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提出的所谓“黄金案”提供了最直接、最可靠的物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克诚自述》一书中称赞：“翁徐文为人十分老实，从不谋私，又十分谨慎。他为革命队伍经管钱、财，兢兢业业，手续、账目都很清楚完整。钱上交以后，他仍保存着账目、收据。……我由此得以解脱被诬陷的罪名，这真得感谢翁徐文的谨慎作风。”

与此同时，原押送黄金的西满军区供给部警卫班长（时任湖南省嘉禾县税务局长）张正鸿，提供了1947年冬为东北银行押送黄金的详细经过，并得到同去的付景毅（翁徐文的秘书）、周利（会计）等证实无误，也为澄清此案提供了重要人证。

此案先后经过四年的一再审查，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来。1963年9月，中央工作组再次来湖南，调查核实黄克诚“黄金案”的问题，开了三次调查会，找翁徐文、付景毅、张正鸿、周利等进行调查，中央工作组在会上宣布，经过多方面的调查和核对账目，问题基本搞清。

1963年12月26日中央工作组关于黄克诚经济摊子问题调查第6号简报指出：“翁徐文同志较为诚实，愿意来京核对证问题，他始终坚持原来的说法，离开账本就不轻易讲话。”

但在当年“左”的思想指导下，案件审查常常服从于某种政治的需要，已经清楚的问题仍无端怀疑；应该得出结论的问题拖着不做结论。致使一些无辜的同志蒙受莫名的罪名，受到压制、打击，甚至摧残。

翁徐文因涉及此案，1960年省党代会换届改选时，省委委员的预选名单上没有了他的名字，长沙市的代表提出意见，省委一位主要负责人解释说，翁因涉及黄克诚“黄金案”经济上不清楚，政治上也不清楚。从此，有些应该他参

加的会议也不通知他参加了，可以看的文件也不给看了。工作也不作具体安排，基本上被闲置在家里。“文革”中早已查清的所谓“黄金案”被公开到社会上，翁徐文被说成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死党，黄克诚的“黑干将”，遭受抄家、挂牌子、批斗、罚跪等人身侮辱，后来又被关进了“牛棚”。原新四军三师供给部警卫班长张正鸿，因押送过黄金，也受到牵连，把他的县委委员、局长撤了，下放到嘉禾县畜牧良种场劳动改造。“文革”中把他当作“彭、黄、张、周”的死党，遭到了抄家、揪斗、挨打、挂牌游街等许多非人待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左倾错误，才使此案彻底澄清，翁徐文恢复了名誉，出任中共湖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

1979年7月2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翁徐文等同志受“黄金案”牵连问题的结论：“一九五九年中央审查黄克诚同志的问题时，对所谓‘黄克诚同志把持经济摊子’，即所谓黄克诚同志贪污黄金问题立案进行审查。一九六三年黄克诚同志专案组曾对西满军区供给部炼、交黄金问题及其他经济问题找翁徐

文、付景毅、张正鸿、周利等同志进行调查，当时翁徐文同志对经济摊子问题和炼、交黄金问题向组织上讲清楚了，黄克诚同志专案组经过多方面的调查和核对账目，证明翁徐文同志讲的情况是实事求是的，证明黄克诚同志没有贪污问题，翁徐文同志所负责的经济账目是清楚的，没有贪污问题。特此结论证明。凡因所谓‘黄金案’受牵连的同志都应予以纠正，恢复名誉。”

至此，长达20年之久的所谓“黄金案”终于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责任编辑：赵友慈）



顶着风浪为武训辩护的郝瑞琛

● 李公天

50年前,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并在《党的生活》专栏里发表专文《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

从这一天起,一场以理论讨论形式出现的全国规模的轰轰烈烈的政治大批判运动,便掀起来了。

当年在中共堂邑县委宣传部工作的25岁年轻共产党员郝瑞琛,并不知道《人民日报》这篇社论是谁的大手笔,也没有掂量掂量这篇《党的生活》栏专文有多大分量,更不知道北京派来武训老家堂邑县搞调查的武训历史调查团里的李进,就是江青。他只看到5月20日以后全国的报刊几乎是“舆论一律”地把武训骂得狗血淋头,特别是《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把武训定性为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农民起义的对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并说电影《武训传》是一株反动的大毒草。这样的结论,这几顶大帽子,跟郝瑞琛自幼从父老乡亲那里了解到的行乞兴学的武训完全对不上号。他还想,武训如果是个大坏蛋,为什么1943年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冀鲁豫边区政府曾明令将武训故乡堂邑县的一部分和冠县的几个区合起来,命名为武训县,以资纪念?一直到1949年武训县才并入堂邑县。不仅如此,当时武训老家柳林镇也改名武训镇,还以“武训”命名柳林的师范和小学。怎么一夜之间历史来了一个大颠倒,大好人变成了大坏蛋!郝瑞琛因为在宣传部工作,他还知道武



郝瑞琛

训历史调查团到堂邑县后,在堂邑、馆陶、临清找干部和老乡谈话,开始大家都异口同声讲武训的好话,后来经过县里工作人员打招呼,才改口说点武训不好,有的人甚至干脆拒绝回答调查组提出的问题。所以《武训历史调查记》中,很多不实之词是经过作者蓄意编造的。郝瑞琛认为,用这样的“调查材料”无限上纲,做出的结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他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实事求是地讲真话,应该把我了解的武训和

认识写出来供大家讨论,还历史本来面目。于是他写了《我对武训与别人相反的认识》一文,旗帜鲜明地公开为武训辩护。

他写好以后,曾经给县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看过,他们都出于对年轻人的关心、爱护,劝他不要发表。郝瑞琛没有接受他们的好意。他认为,对《武训传》的讨论,不过是学术讨论嘛,学术讨论是允许有不同意见的。有不同意见才能引起学术争鸣,越争越明,才能出现真理,达到共识,就是错了也不至于给予处分。如果都随声附和,哪里还有争鸣呢?所以他就直言不讳,大胆地把文稿寄出去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正好撞到了枪口上!

尽管5月20日《人民日报》《党的生活》栏发了专文,并特别给省里打了招呼,但当时省里、县里正忙于镇压反革命,又忙于抗旱救灾,所以领导上并没有紧紧跟上这一场批判武训的政治斗争。从《平原日报》5月下旬到8月上旬的版面看,第三版除了转载中央报刊上的批判文章和《武训历史调查记》外,由省内提供的文

章,属于检讨的多,有分量的批判文章很少。这种情况据说还受到了中央的批评。

正在此时,《平原日报》编辑部收到了郝瑞琛这篇“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顶着大批判风暴为武训辩护的文章,简直如获至宝。经省委书记、宣传部长等人讨论决定,把郝瑞琛作为反面教员,把他的这篇文章作为大批判靶子,在全省形成一个热热闹闹地批判武训的高潮,同时也可以向中央“交差”。于是9月15日由《平原日报》配以“编者按”发表了署名郝瑞琛的文章《我对武训与别人相反的认识》。与此同时,在同一版上还发表了《揭开郝瑞琛反动思想的本质》一篇署名长文,从此开始了对郝瑞琛的大批判。

以后,《平原日报》第三版上隔不几天就有一篇批判郝瑞琛的文章出现,更多的时候即使没有文章,也有一篇或几篇“读者来信”充批判之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51年11月12日《平原日报》发表了省委宣传部的《关于讨论批判“武训问题”的总结报告》,才画了一个句号。

1951年10月28日《平原日报》有篇署名文章说:郝瑞琛思想批判在省直(属机关)进行了将近两周的时间。其中除小组酝酿讨论外,总计大会讨论五次,最后请省委宣传部长作了总结报告。这一批判是在武训问题批判的基础上、以郝瑞琛思想作具体典型展开的。省直属机关干部、全省干部大都参与了这一思想批判运动,规模之大,在我省是空前的。

1951年11月12日省委宣传部的“总结报告”把批判郝瑞琛作为一条成功的经验,它说:对“《武训传》的批判抓住了典型郝瑞琛反动思想进行批判,又使武训问题的思想批判运动更加深入推进了一步”。接着又不无遗憾地指出:“关于郝瑞琛反动思想批判,把郝极端荒谬的文章在报上公开发表,表现了客观主义倾向。”这就是说省委宣传部当时是把全文发表郝瑞琛的文章作为一条教训。为什么呢?因为“不少干部曾受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影响,受到批判后,觉得自己认识错误,但看到某些有错误观点的文章后,又觉得‘很有道理’”。其实,如

前所述,《平原日报》1951年9月15日发表郝瑞琛这篇文章时,既加了“编者按”,又在同一版面上配合发表了署名的批判长文,都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指明郝瑞琛“坚持着反人民、反历史、反科学的立场”,而且批判长文还对郝瑞琛文章中的“反动思想的本质”一一加以揭批。谈不上有“客观主义倾向。”

郝瑞琛为武训辩护的文章究竟说了些什么呢?他的文章分三个部分:

一、再谈武训的兴学动机与目的。小标题所说的“再谈”,并不是以前他发表过文章,而是指当时报刊上别人已经连篇累牍地对武训的兴学动机与目的谈了不少,他这篇文章再来谈一谈这个问题。他认为武训“处心积虑立志终身兴办义学叫穷孩子念书,其动机肯定地说是为了穷家子弟念不起书而兴办的,为贫、雇农百分之八十的广大群众在文化上翻身为目的的,而不是为压迫他的统治阶级服务为目的的吧”!人们批判武训说过的一句话,“文昌帝君知道了,管叫你坐八抬大轿”。郝瑞琛为此辩解说,“那时唯有加些这一类的口号来诱导学生的家长叫小孩念书,才能完全提起家长的积极情绪。非是武训有了往上爬想显示个人的思想反映吧!”

郝瑞琛文章的第二部分,是武训的人格与行乞兴学的意义。他一开始就指出:“至于对武训之苦操廉明,认为是效忠于地主阶级的奴颜婢膝摇尾乞怜的忠实奴才和玩蛇弄蝎喝尿非人格的表现,这都是一种浮浅的感性认识,没从武训的生活现象达到根本的理解,和存有吹毛求疵的左的偏向。”郝瑞琛在阐述了什么样的思想、行动、言论才是奴才,而武训不是奴才之后说:“武训忍受了各种屈辱和践踏,以及做牛马不如的工作,来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志愿,这种精神非但可以表扬,并且可以大为表扬,特为表扬的,可效可仿的使农民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郝瑞琛认为:“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彻底消灭旧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才能保全革命的完全胜利,但是文化翻身也更是不可缺少的。”郝瑞琛进一步阐述:“那时武训办的义学虽是封建的教育,而是为时代所限制。当时中国

根本没有工人阶级,更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而是闭关、自守,刚和外洋资本主义接触不久的一个封建帝国。”他列举了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因为受了封建教育,更能深刻地知道封建阶级对人民统治压迫的阴谋毒素,反抗的意志更为坚决,更为彻底”。他还以毛主席(《平原日报》发表时编者改为×××)为例,为什么接受过封建、资本主义教育,而能成为革命领袖呢?“因为他有各个阶级社会的充分文化和知识,深刻的了解了封建、资产阶级及其对工人农民如何残酷的统治与剥削,如何的进行欺骗和愚弄,工人农民如何备受了痛苦,如何的束缚了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必然的将来。”最后,郝瑞琛谈到讨论武训问题应该遵循的方法论,“既然有人提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处理武训,就不能完全拿马列主义衡量武训的轻重,那就不能否认武训、抹煞他的功绩,应以武训所处的历史范围,本身条件,以及对人民的贡献来肯定他。”

郝瑞琛文章的第三部分讲武训的立场。他提出了一个论点:“兴办义学叫农民群众读书,消灭文盲,解决没文化的痛苦,这是对社会、群众的基本大义问题。”至于“有人说武训通过地主的手,以封建的租佃关系、高利贷关系剥削农民来办义学,而念书的人又多是地主家的子弟。我认为这都是只知其一莫知其二的狭隘观点。武训这种行为正是去小仁而就大义。”“所谓封建租佃关系是封建地主向农民索以重租税的无情压榨和无情侮辱,难道武训也这样作吗?”郝瑞琛还反驳了武训义学中念书的多是地主家小孩,从而证明了武训是地主阶级奴才的观点,他说:“地主的小孩并不都肯定的是不革命。”

综观郝瑞琛的文章,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把老百姓对武训的一贯看法写出来,没有讲很多高深理论和大道理,不存成见的人读了会觉得它“很有道理”。这可不可以说是“事实胜于雄辩”呢?

当时批判郝瑞琛文章的人和对武训批判的人一样,他们手里最有力的武器是《武训历史调查记》。“文革”后提出了对武训问题再评价的问题。1980年至1981年上半年,《齐鲁学

刊》连续四期发表了为武训平反和有关研究的文章。聊城师范学院院长张明支持李绪基、孙永都两同志走访了当年参加《武训历史调查记》的部分同志及电影《武训传》编导孙瑜同志。1987年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把研究武训问题列为重点项目。收集资料的工作主要由聊城师范学院马明琴、邢培华同志担任。经过他们许多人近十年的认真研究,《武训历史调查记》弄虚作假的事实被揭露出来了,这个号称调查研究的典范作品彻底破产了。据参加武训历史调查团的人说,武训一生确实买了几百亩地,但都归义学所有,他本人不因为买了一些地,就过剥削生活。他乞讨来的钱也放过债,但本息都是作为兴办义学的基金。说他是“大流氓”,是流言蜚语,未经核实,所以强加给武训头上的“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三顶大帽子也不能再戴了。不言而喻,当年郝瑞琛为武训辩护而写的文章也不该再视为大毒草了,郝瑞琛应该抬起头来做人了。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并不那么一帆风顺。

郝瑞琛为武训辩护的文章是1951年8月初寄送平原日报社的。8月下旬,堂邑县委组织部长和其他县委领导从省委开会回堂邑,就决定开除郝瑞琛的党籍和公职,遣送还乡劳动。当时为了把郝瑞琛说成是阶级异己分子,才会产生坚决为武训辩护的“反动思想”,就清查他的祖宗三代。他有一个同父异母所生、比他大18岁的哥哥,在郝瑞琛出生前一年就考入冯玉祥的军官学校,其后从未回家,与家庭失掉联系。批判时就说郝瑞琛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从小伪装积极,混入党内。其实郝瑞琛的父亲虽是清朝末年的秀才,到1948年土改时已73岁,双目失明。而他50岁前因各种原因,早就卖掉土地,负债累累,成了一个贫苦的穷秀才。所以土改时划为贫农成分,分得土地四亩三分。郝瑞琛因家贫上不起学,小学还没毕业,1937年11岁就辍学务农了。13岁在棉厂当学徒工。17岁时加入共产党,工作表现好,所以才调到中共堂邑县委宣传部工作。由于他独立思考,写了这篇为武训辩护的文章,竟被视为敌人,这是他始料不及的。1951年他被双开除(党籍、公职)的时候,

虽写他为贫农成分，但同时还牵强地附上一笔“破落地主出身”。1951年郝瑞琛被遣返回乡后，1952年3月他找到老领导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长，要求工作。他被安排在聊城保险公司工作。不久，在闲谈中说话不慎，又说了“武训兴学精神蜚声海外”，被人抓住这句话再批斗一番，并定为顽固不化分子，再次被遣返回乡，监督劳动。从此就同地、富、反、坏、右一起打入另册。特别是在“文革”时期那种“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江青一伙在《人民日报》上抛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并重新发表1951年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社论，这一来，郝瑞琛当然在被“扫”之列。他被作为当地的大号牛鬼蛇神和在武训问题上公然唱反调的大号坏人，他受到的残酷迫害，比1951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多次遭到抄家、斗争，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折磨。他的子女在升学、入团、参军、招工等方面都受到种种限制，甚至他的子女在婚姻问题上也受到影响。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在革命老前辈的支持下，力排众议，坚持主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要是冤假错案，不管是谁定的，是哪一级定的，是什么时候定的，都要纠正。1979年7月2日郝瑞琛给当时已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写了申诉信，要求对他1951年受到的错误处理进行复查。7月13日中宣部即复信告诉郝瑞琛，已将他的申诉信转给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处理。11月7日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给郝瑞琛的信说，“根据你信中意见，特将你的来信转聊城地委宣传部处理，如有何意见，可同他们联系。”经过三番五次的周折，直到1980年10月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对郝瑞琛的信作了亲笔批示，聊城地委纪委才给郝瑞琛立案，组织内查外调，最后予以平反。郝瑞琛30年冤案总算有了一个结局。

近十多年，武训的老家冠县（原堂邑县已并入冠县）先后召开过两次武训问题研讨会和一次武训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都未邀请郝瑞琛出席参加。我出席第二次武训问题研讨会时曾经问过一位同志，为什么没有邀请郝瑞

琛。他说，第一次研讨会曾拟邀请郝参加，有人反对，说出席这个会的人都是省内外的专家、学者或党政领导同志，好像郝不够格，所以第二次研讨会也没有邀请。我说，这种看法值得重新考虑，我认为，郝瑞琛同志是最有资格参加这种研讨会的人。1951年批武训时，郝瑞琛同志能独立思考，勇敢地提出异议，公然写文章为武训辩护，而且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尽管也有些地方不恰当。如他文章第二部分为武训与农民的租佃关系、高利贷关系辩护时，把它们与国家贷款给互助组相提并论，这样类比显然是不对的。但是他当时最可贵的是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观点，顶住风浪，为武训辩护，并且在文章里明确指出，对武训的批判“存有吹毛求疵的左的偏向”，可以说是一针见血。郝瑞琛文章经过历史检验，证实了他的辩护是正确的。郝瑞琛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中国共产党多一些能独立思考，不盲从的好同志，我们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一定会兴旺发达的。过了两年，当我再次应邀参加在冠县召开的武训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时，还是没有看见郝瑞琛出席。我又问有关同志，他回答我：“听说郝已经病逝了。”我十分惋惜。事后打听，我才知道郝瑞琛还健在，而且胸襟开阔，保持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本色。他认为，当年写文章为武训辩护，只是做了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其后招来一连串的灾难，是自己万万没有想到的。比起全国许许多多因武训受株连的同志来，自己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决不怨天尤人。对当时某些批斗自己的同事们和不公平对待自己的同乡们，努力消除隔阂，完全谅解。他对未被邀请参加武训研讨会，并不介意，只是希望我们党应认真总结从批判武训开始，直到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一系列大批判有什么经验教训，今后不要再重演过去那样的历史，搞一言堂，一锤定音，把学术问题说成政治问题，无限上纲，混淆两类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处理。

在批判武训和电影《武训传》50周年的时候，郝瑞琛的想法很能启发我们深思。

（责任编辑 舒元璋）

从历史的深层看日本

——试析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与历史根源

● 武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日本在战争认识问题上仍犯禁不断,内阁大臣频频“失言”;首相以各种名目参拜靖国神社;美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通行无阻,而批判皇国史观的人士却受到冷遇,甚至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胁。尽管亚洲各国抗议的呼声不断,但日本我行我素,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侵略罪行的否认和美化。这一切说明,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存在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深刻的历史根源。

日本曾是一个受列强欺侮的穷国弱国

日本的资本主义化进程始于明治维新,自那时以来直到今天,日本的历史是一个割不断的整体。一百多年来,日本资本主义正是沿着明治维新时期所设计的目标和发展道路,一步步走过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因此追根溯源,必须从明治维新时期所确立的国家目标说起。

明治维新前夕,日本的处境是很惨的,从18世纪下半叶起,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就纷纷向日本扩张,进入19世纪以后,扩张的势头有增无减。在列强的军事压力下,日本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包括:1854年的《日美亲善条约》、《日英亲善条约》,1855年与俄国签订的《日俄亲善条约》,1858年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以及根据最惠国待遇的规定,于同年同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签订的同类条约。此外,从1860年到1866年,日本又被迫同葡萄牙、普鲁士、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国陆续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欧美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在日

本设立“居留地”,在“居留地”建立自己的行政机关,实行自治,不受日本当局管辖,实际上成了国中国。一些国家还享有在日本的驻兵权,它们在重要的通商港口建立军事基地,列强军舰可以自由出入。

西方列强使日本的独立和主权受到了严重损害,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平等成为日本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成为日本资本主义走上国际舞台的历史起点。

另一方面,当时,日本的经济的发展尚处于十分落后的水平。封建生产关系仍然占统治地位。与西方强国发达的工业化程度相比,日本还属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极端幼稚,交通尚无铁路,贸易只能靠出卖原料,财政上几乎一金无储。资本主义列强的叩关,激化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危机,造成了社会的剧烈动荡和旧有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因此,解决生产关系危机,成为不亚于民族危机的第二个重大历史课题。

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与民族独立这两大历史课题,日本维新政府提出了以“富国强兵”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发展目标。

日本选择了“以战争促发展”的发展模式

“富国强兵”这个本应具有积极意义的口号,由于选择了“武力扩张,以战争促发展”的模式,而走向其反面。

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国家目标,在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政府就派出大型使节团去西方“取经”。每到一处都要为西方的繁华强盛所倾倒,为同欧美国家发展差距之大而痛心疾首。在

德国,德国首相俾斯麦的一番说教,令使节团振聋发聩。这个被称为“铁血宰相”的俾斯麦说:“方今世界各国,皆以亲睦礼仪交往,然而皆属表面现象,实际乃强弱相凌,大小相侮”,“彼之所谓公法,谓之保全列国权利之准则,然大国争夺利益之时,若与己有利,则依据公法,毫不更动;若与己不利,则幡然诉诸武力,固无常守之事”。使节团联想到自己国家,为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枷锁,历尽艰辛,包括一相情愿地进行改约前的大量准备工作,按照国际惯例向有关国家提前发出通告,列强不但不予以理睬,反而提出了比现行条约更为苛刻的修约方案。再放眼环球,维新前后的世界,正处于西方列强殖民掠夺的鼎盛时代。到19世纪末,荷兰几乎已夺取了整个东印度群岛。英国在19世纪中叶,已经把印度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到20世纪初,其殖民地总面积已比本土大110倍,成为殖民地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法国自19世纪中叶起,开始大肆入侵东南亚,到19世纪末,已将印支三国置于自己的殖民统治之下。1884年,西方列强在柏林召开了瓜分非洲的国际会议,有英、法、美、俄、德、意、比、葡、西班牙等14国参加。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需要,在非洲地图上按照经纬度任意划分边界,掠夺殖民地。

日本在西方列强的“言传身教”中领悟到,强权就是公理,自己改约交涉的惨痛经历足以证明,如果再继续崇信所谓万国公法,所谓民族平等与国际和平等等,归根结底只能是幻想,是小国、弱国在强敌如林的国际社会中,对自身安全与利益的无力企求。日本统治集团决心以欧美列强为样板,使日本成为它们中的一员,跟它们一样去横征暴掠,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振张国势”,“宣扬国威”。用日本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日本陆军的创始人山县有朋的话说就是:“要想维护国家独立,只守卫主权线是不够的,还必须防护利益线。”他所谓的利益线,就是指自国主权线以外的别国疆土。于是,用武力去侵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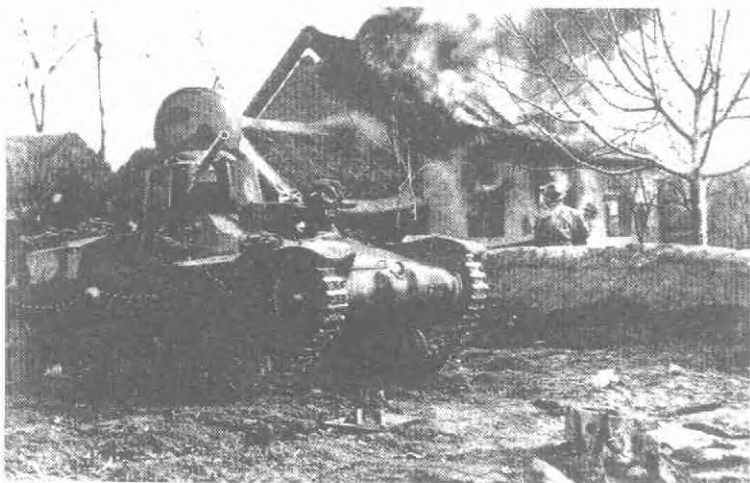
国疆土,成了日本维护自家独立的“国策”;成了日本争取与西方列强讲“民族平等”的手段;成了日本弥补其资本主义经济先天不足,实现跳跃式发展的“捷径”。

正因为如此,武力侵略伴随着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从维新政权一成立就提出“征韩论”;1874年开始出兵台湾;1875年炮击朝鲜江华岛炮台。其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武力扩张的大行动有三次:

第一次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战争结果日本不仅获得了第一个海外殖民地台湾,而且国内经济也出现了巨大发展,战后出现了后期产业革命高潮,工业、交通运输业发展迅猛。由于从中国索取了巨额赔款,黄金储备骤增,1897年10月开始建立金本位制,1899年日本货币纳入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在对华投资方面,甲午战争以前几乎是零,战后以棉纺织业为代表开始急剧发展。

第二次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战争的目的是与俄国争夺在中国的殖民利益。战争结果使日本获得了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据点——“南满铁路公司”(简称“满铁”),从此中国东北被日本视为特殊权益和势力范围。

第三次是参加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果,日本不但取代了德国在中国的地位,而且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再次出现惊人变化: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债务国转变为债



横行在东北的日军

权国。在军事方面,日本上升为世界五大海军强国之一,除在台湾、琉球设有海军基地,在库页岛、千岛群岛设有军事据点外,又在一战后新攫取的原德国殖民地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建立了军事要塞,从此它可以指挥自如地调度自己的舰队,在整个太平洋海域与美国对抗。

一次次武力扩张给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刺激和推动作用,使日本更加信奉以战争促发展的发展模式。侵略战争与国家目标、国家命运乃至民族前途紧紧地融合在一起。对战争的顶礼膜拜成了祈祷国运发达的同义语。早在日俄战争后仅仅几年,山县有朋就毫不隐讳地总结说:“维新大业成就以来已有40余年,细想起来国运的发达主要依靠武备的力量”,“战争毕竟是区分宇宙间一大原则即优胜劣汰的惟一审判方法”。20多年后,日本陆军的小册子更是直截了当地宣称:“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把日本资本主义以战争求发展的理念发挥到了顶点。

1937年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和1941年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是前述三次大规模武力扩张的历史延续,是日本明治以来所走道路的逻辑发展。战争的直接动因是企图摆脱1929—1933年空前深刻的经济危机。日本军部的代表人物宣称:“纵观欧洲战争后的趋势,与各大国经济发展相比,我国产业立国基础薄弱无疑是一个基本原因,因此为打开这一困境必须向海外发展”,“要而言之,满蒙问题的根本解决是打开现状,稳定国民经济生活的惟一途径”。然而,与以往历次武力扩张所不同的是,这次战争不但没有为日本带来经济的繁荣,反而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从历史的回顾中可以看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特殊性,它从一个经济上处于封建社会末期,政治上属于被压迫民族的落后小国,一跃而进入了属于资本主义发展高级阶段的帝国主义行列,其间短短40几年,竟浓缩了从资本原始积累直到垄断的各个发展阶段。这种超浓缩,给日本带来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历史特征:它的国家目标的耀眼与它的发展

模式的阴暗,使得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强国与争霸,发展与侵略是如此紧密地交织与融合在一起,以致于它的后继者们随时都能够根据需要,轻而易举地从这份历史遗产中翻找出各种各样可以利用的东西。

应对日本社会主体价值取向有个清醒的认识

如果说,日本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已使问题变得错综复杂,那么,日本社会主体的价值取向则更进一步加深了它的复杂程度。这种价值取向同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密不可分。

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社会几乎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从古代时起,便开始形成很强的共同体意识。小到一个家族,大到整个邦国,都被看作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共同体成员内部有着很强的一体感和归属意识。而维系这种一体感的重要纽带,就是其独特的神祇信仰。其所信奉的神灵,不是超越于共同体之外、高高在上、与群体异质的创世主,而是产生于共同体内部、与共同体成员同质的、休戚相关的精神偶像。在一个家族共同体中,主宰家族命运的主神就是其祖先的灵魂,每一个家族成员都与它血脉相承,都被看作是它的分灵,这个成员死后,他的灵魂又会与祖灵合而为一。但是要达到这一境界,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式,那就是葬礼和忌辰祭祀。因此,对祖先的祭祀和对死者的厚葬镇魂就成为家族最重要的例行礼仪。

与无数个家族共同体并存的最大的命运共同体是邦国。主宰邦国命运的主神是其皇祖皇宗的神灵,也就是天皇家的主神。这是在古代日本列岛的统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古代日本社会众多小国并立、众多氏族争雄的情况下,一个最强有力的氏族及其所领导的部落国家,经过长年的兼并战争,完成了日本列岛的统一,这个氏族的首领即天皇,也因此被尊奉为整个邦国的守护神,天皇家族的祖灵成为整个邦国代祭祀的共同主神。即使在12世纪以后,武家政权延续了几百年,天皇早已远离了权力的中心,但他的神威性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每一代继

位掌权的将军都要到天皇那里讨得一个“征夷大将军”的封号,否则便感到自己的政权没有根基,不足以慑服天下。直到今天,日本虽然经历了种种历史变革,它仍然在宪法中写着“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事实上,邦国共同体的天皇崇拜与家族共同体的祖灵崇拜从原理上讲是一样的。每一个家族通过祭祖所追求的自家万世一系,正是称颂天皇万世一系的深厚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它所包含的理念,是每一个成员对共同体的长存与繁荣的企望,以及自身命运对共同体的依赖。

近代以来,日本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幕藩体制,建立近代统一民族国家的斗争中,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传统的神祇信仰和共同体意识。他们先是打出了“尊皇攘夷”的旗号,唤起民族意识,增强民族内聚力;接着又提出“尊皇倒幕”的口号,从理论上剥夺幕府权力的合法性,瓦解幕府的斗志和抵抗力。维新政权建立以后,统治集团又把以天皇信仰为纽带的民族一体感看作是通过武力扩张实现国家目标的强有力工具。明治政府通过国定修身教科书宣称:“我国以家族制度为基础,举国构成一大家族,皇室是我等之宗家,我等国民以对父母敬爱之情崇敬万世一系之皇位,是以忠孝为一不可分。”传统的对共同体的忠诚、归属和依赖,通过各种正规渠道,全面地、系统地、持久地灌输给全体国民,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对家国尽忠、对国家目标认同和为实现国家目标无条件献身的“忠臣赤子”。每一个为家国而战死的成员,都成为有资格享受世代祭祀的靖国之神。为了祭祀他们,明治政权修建了靖国神社。神社自创立以来就受到皇室的特别崇敬,天皇不仅经常亲往祭祀,而且每年都要派敕使参加例行祭祀。1898年11月,靖国神社举行临时大祭,为甲午战争和在台湾、朝鲜的战死者中尚未合祀者,以及在战争中因疾病和灾害等死亡的陆海军人共计10300余人举行合祀,天皇和皇后亲自出席了这次临时大祭。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对家族国家的宣传达到了顶点。“忠君爱国”被奉为最高道德标准。日本政府宣称:“固然外国也有爱国精神,然而这种爱国与我国的不同,我国的爱国是与

忠君同一根源的,是与敬神崇祖完全一致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凡是像神风特攻队那样的“为国捐躯”者,都被奉为“忠君爱国”的典范,他们也像在甲午战争以来的“爱国英雄”一样,被送进靖国神社,享受国家级的祭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日本资本主义的天下是靠武力侵略打出来的,没有侵略扩张,就没有日本资本主义的今天。因此对日本资本主义来说,否定侵略,就等于否定了它的全部历史。正因为如此,它必定要千方百计去美化那个血腥的历史内核,同时着力去培植和利用裹在那个内核外面的、被近代国家目标的设立所激发的民族内聚力,特别是作为这种内聚力底蕴的传统的共同体意识,和以尊皇为支柱的民族一体感。在日本历史上,每当出现某种危机和困境时,统治集团总是要动用这一民族传统的法宝,以达到其现实的政治目的。今天,当然也不会例外。在日本政治舞台上,为历史的亡灵扬幡招魂,大肆鼓吹皇国史观,其用心仍在于借此调动民族情绪,为其现实的政治目的服务。因此,外部压力的增大只会使日本统治集团对过于露骨的行为做出某些暂时的策略性调整,而对于他们骨子里的那个根深蒂固的历史情结却是不想解、也解不开的。对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今天,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正在成为时代的主题,军国主义越来越不得人心。在反法西斯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中获得独立的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早已不是昔日任人宰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以其迅猛发展的步伐和迅速增强的综合国力,成为维护地区安全与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在今天的日本,企图与战后和平宪法的原则背道而驰的右倾势力,想重新捡起军国主义的老式武器绝非易事,梦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头换面,借助猖獗一时的新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等新式武器,去谋取政治利益的如意算盘,肯定也是打不响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

(责任编辑 洛松)

戴罪功臣林则徐

● 梁 衡

既然中国近代史是从 1840 年鸦片战争算起,禁烟英雄林则徐就是揭开近代史的第一人。可惜这个第一英雄刚在南海点燃硝烟烈火,就被发往新疆接受朝廷给他的处罚。功与罪在瞬间便交织在一个人身上,将其扭曲再造,像原子裂变一样,产生出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封建皇帝作为最大的私有者,总是以天下为私。道光在禁烟问题上本来就犹豫,大臣中也分两派。我推想,是林则徐那篇著名的奏折,指出若再任鸦片泛滥,几十年后中原将“无可以御敌之兵”,“无可以充饷之银”,狠狠地击中了他的私心。他感到家天下难保,所以就鞭打快牛,顺手给了林一个禁烟钦差。林眼见国危民弱,就出以公心,勇赴重任,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他太天真,不知道自己“回不回”,鸦片“绝不绝”,不是他说了算,还得听皇上的。果然他上任只有一年半,1840 年 9 月,就被革职贬到镇海。第二年 7 月又被再“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就在林赴疆就罪的途中,黄河泛滥,在军机大臣王鼎的保荐下,林则徐被派赴黄河戴罪治水。他是一个见害就除,见民有难就救的人,不管是烟害、夷害还是水害都挺着身子去堵。半年后治水完毕,所有的人都论功行赏,惟独他得到的却是“仍往伊犁”的谕旨。众情难平,须发皆白的王鼎伤心得泪如雨下。林则徐就是在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打击下西出玉门关的。他以诗言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这诗前两句刻画出他的铮铮铁骨,刚直不阿,后两句道出了他的牢骚与无奈:给我一个谪贬休息的机会,这是皇上的大恩啊,去当一名戍卒正好养拙。你

看这话是不是有点像柳永的“奉旨填词”和辛弃疾的“君恩重,且教种芙蓉”。但不同的是,柳被弃于都城闹市,辛被闲置在江南水乡,林却被发往大漠戈壁。辛柳只是被弃而不用,而林则徐却被钦定为一个政治犯。

但是,自从林则徐开始西行就罪,随着离朝廷渐行渐远,朝中那股阴冷之气也就渐趋淡薄,而民间和中下层官吏对他的热情却渐渐高涨,如离开冰窖走进火炉。这种强烈的反差不仅是当年的林则徐没有想到,就是 150 年后的我们也为之惊喜。

林则徐在广东和镇海被革职时,当地群众就表达出了强烈的愤懑。他们不管皇帝老子怎样说,怎样做,纷纷到林则徐的住处慰问,人数之众,阻塞了街巷。他们为林则徐送靴、送伞,送香炉、明镜,还送来了 52 面颂牌,痛痛快快地表达了自己对民族英雄的敬仰和对朝廷的抗议。林则徐治河之后又一次遭贬,中原立即发起援救高潮,开封知府邹鸣鹤公开宣示:“有人能救林则徐者酬万金。”林则徐自中原出发后,一路西行,接受着为英雄壮行的洗礼。不论是各级官吏还是普通百姓都争相迎送,好一睹他的风采,都想尽力为他做一点事,以减轻他心理和身体上的痛苦。山高皇帝远,民心任表达。1842 年 8 月 21 日,林离开西安,“自将军、院、司、道、府以及州、县、营员送于郊外者 30 余人”。抵兰州时,督抚亲率文职官员出城相迎,武官更是迎出十里之外。过甘肃古浪县时,县知事到 31 里外的驿站恭迎,对林则徐西行的沿途茶食住行都安排得无微不至。进入新疆哈密,办事大臣率文武官员到行馆拜见林,又送坐骑一匹。到乌鲁木齐,地方官员不但热情接待,还专门为他雇了大

车五辆、太平车一辆、轿车两辆。1842年12月11日,经过四个月零三天的长途跋涉,林则徐终于到达新疆伊犁。伊犁将军布彦泰立即亲到寓所拜访,送菜、送茶,并委派他掌管粮饷。这哪里是监管朝廷流放的罪臣啊,简直是欢迎凯旋的英雄。林则徐是被皇帝远远甩出去的一块破砖头,但这块砖头还未落地就被中下层官吏和民众轻轻接住,并以身相护,安放在他们中间。

现在等待林则徐的是两个考验。

一是恶劣环境的折磨。从现存的资料看,我们知道林则徐虽有民众呵护,还是吃了不少苦头。由于年老体弱,路途颠簸,林一过西安就脾痛,鼻流血不止。当他从乌鲁木齐出发取道果子沟进伊犁时,大雪漫天而降,脚下是厚厚的坚冰,无法骑马坐车,只好徒步趟雪而行。陪他进疆的两个儿子,于两旁搀扶老爹,心痛得泪流满面,遂跪于地上对天祷告:若父能早日得赦召还,孩儿愿赤脚趟过此沟。林则徐到伊犁后,“体气衰颓,常患感冒”,“作字不能过二百,看书不能及三十行”。历史上许多朝臣就是这样死在被发配之地,这本来也是皇帝的目的之一。林则徐感到一个无形的黑影向他压来,他在日记中写道:“深觉时光可惜,暮景可伤!”“频搔白发渐衰病,犹剩丹心耐折磨”,他是以心力来抵抗身病的啊。

二是脱离战场的寂寞。林是一步一回头离开中原的。当他走到酒泉时,听到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的消息,痛心疾首,深感国事艰难。他在致友人书中说:“自念一身体咎死生,皆可置之度外,惟中原顿遭蹂躏,如火燎原……侧身回望,寝馈皆不能安。”他赋诗感叹:“小丑跳梁谁殄灭,中原揽辔望澄清,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他为中原局势危机,无人可用而急。果然是中原乏人吗?人才被一批一批地撤职流放。这时和他一起在虎门销烟的邓廷桢,已早他半年被贬新疆。写下名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龚自珍,为朝廷提出许多御敌方略,但就是不为采用。龚对西域边防多有研究,提出要陪林赴疆,林考虑自身难保,为了给国家保存人才,坚辞不准。本来封建社会一切有为的知识分子,都希望能被朝廷重用,能

为国家民族做一点事,这是有为臣子的最大愿望,是他们人生价值观的核心。现在剥夺了这个愿望就是剥夺了他们的生命,就是用刀子慢慢地割他的肉,虎落平川,马放南山,让他在痛苦和寂寞中毁灭。

“羌笛何须怨杨柳”,“西出阳关无故人”。玉门关外风物凄凉,人情不再,实在是天设地造的折磨罪臣身心的好场所。当我们现在行进在大漠戈壁时,我真感叹于当年封建专制者这种“流放边地”的发明。你走一天是黄沙,再走一天还是黄沙;你走一天是冰雪,再走一天还是冰雪。不见人,不见村,不见市。这种空虚与寂寞,与把你关在牢中目徒四壁,没有根本区别。马克思说:“人是各种关系的总和”。把你推到大漠戈壁里,一下子割断你的所有关系,你还是人吗?呜呼,人将不人!特别对一个博学而有思想的人,一个曾经有作为的人,一个有大志于未来的人。

“腊雪频添鬓影皤,春醪暂借病颜酡。三年飘泊居无定,百岁光阴已去多。”

“新昭明日逐人来,迁客何时结伴回?空有灯光照虚耗,竟无神诀卖痴呆。”(《除夕书怀》)

他一人这样过除夕。



林则徐

“雪月天山皎夜光，边声惯听唱伊凉。孤村白酒愁无赖，隔院红裙乐未央。”（《中秋感怀》）

他一个人这样过中秋。

“谪居权作探花使。忍轻抛、韶光九十，番风二十四。寒玉未消冰岭雪，毳幕偏闻花气。算修了，边城春楔。怨绿愁红成底事，任花开花谢皆天意。休问讯，春归来。”（《金缕曲·春暮看花》）

他在季节变换中咀嚼着春的寂寞。

当权者实在聪明，他就是让你在这个环境里无事可做，消磨掉理想意志，不管你怎样地怒吼、狂笑、悲歌，那空旷的戈壁瞬间就将这一切吸收得干干净净，这比有回音的囚室还可怕。任你是怎样的人杰，在这里也要成为常人、庸人、废人、失魂落魄。林则徐是一个有经天纬地之才的良臣，是可以作为历史标点的人物。禁烟的烈火仍在胸中燃烧，南海的涛声还在耳边回响，万里之外朝野上下还在与英国人作无奈的抗争，而他只能面对这大漠的寂寞。兔未死而狗先烹，鸟未尽而弓先藏。“何日穹庐能解脱，宝刀盼上短辕车”。他是一个被捆绑悬于壁上的壮士，心急如焚，而无可用力。

怎么摆脱这种状况？最常规的办法是得过且过，忍气苟安，争取朝廷早点召回。特别不能再惹是非，自加其罪。一般还要想方设法讨好皇帝，贿赂官员。像韩愈当年发配海南，第一件事就是向皇帝上一篇谢恩表，不管心中服不服，嘴上先要讨个好。这时，林的家人和朋友正在内地筹措银两，准备按清朝法律为他赎罪，但林则徐却断然拒绝，他写信说：“获咎之由，实与寻常迥异”，“此事定须终止，不可渎呈”。他明确表示，我没有任何错，这样假罪真赎，是自认其咎，何以面对历史？如今这些信稿还存在伊犁的纪念馆里，瀚墨淋漓，正气凛然。当我以十二分的虔诚拜读文物柜中的这些手稿时，顿生一种仰望泰山，遥对长城的肃然之敬，不觉想起林公那句座右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他没有一点私欲，不必向任何人低头，为了自己抱定的主义，他能容得下一切不公平。他选择了上对苍天，下对百姓，我行我志，不

改初衷，为国尽力。

一个爱国臣子和封建君王的本质区别是，前者爱国爱民，以天下为己任；后者爱自己的权位，以天下为己有。当这两者暂时统一，就表现为臣忠君贤，上下一心，并且在臣子一方常将爱国统一于忠君。当这两者不能一致时，就表现为忠臣见逐，弃而不用。在臣子一方或谨遵君命，孤愤而死，如贾谊、岳飞；或暂置君于一旁，为国为民办点实事，如韩愈、辛弃疾、林则徐。他们能摆脱权力高压和私利荣辱，直接对历史负责，所以也被历史所接受，所记录。

林则徐看到这里荒地遍野，便向伊犁将军建议屯田固边。先协助将军开垦城边的20万亩荒地。垦荒必先兴水利，但这里向无治水习惯与经验，林带头示范，捐出自己的私银，承修了一段河渠。历时四个月，用工210万。这被后人称为“林公渠”的工程，一直使用了123年，直到1967年新渠建成才得以退役。就像当年韩愈发配南海之滨带去中原先进耕作技术一样，林则徐也将内地的水利种植技术推广到清王朝最西北的边陲。他还发现并研究了当地人创造的特殊水利工程“坎儿井”，并大力推广。皇帝本是要用边地的恶劣环境折磨他，他却用自己的意志和才能改造了环境；皇帝要用寂寞和孤闷郁杀他，他却在这亘古荒原上爆出一声惊雷。自古罪臣被流放边地的结局有两种，大部分屈从命运，于孤闷中凄惨地死于流放地，只有少数人能挽命运狂澜于既倒，重新放出生命和事业的光芒。从周文王被拘羑里而演《周易》，到越王被吴所俘后卧薪尝胆，直至邓小平“文革”被贬江西而思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生命交响曲中最强的一支，林则徐就属此支此脉。

林则徐在北疆伊犁修渠垦荒卓有成效，但就像当年治好黄河一样，皇帝仍不饶他，又派他到南疆去勘察荒地。北疆虽僻远，但雨量较多，农业尚可。南疆沙海无垠，天气燥热，人烟稀少，语言不通。且北疆南疆天山阻隔，雪峰摩天，这无疑又是对林则徐的一场更大更苦的折磨。现在南北疆已有公路可行，汽车可乘，去年八月盛夏我过天山时，仍要爬雪山，穿冰洞。可想当年林则徐是怎样以羸弱之躯担当此苦任的。就皇

帝而言,这是对林的进一步惩罚,而在林自己,则是在暮年为国为民再尽一点力气。1845年1月17日,林则徐在三儿聪彝的陪伴下,由伊犁出发,在以后一年内,他南到喀什,东到哈密,勘遍东、南疆域。他经历了踏冰而行的寒冬和烈日如火的酷暑,走过“车箱簸似箕中粟”的戈壁,住过茅屋、毡房、地穴,风起时“彻夕怒号”,“毡庐欲拔”,“殊难成眠”,甚至可以吹走人马车辆。林则徐每到一地,三儿与随从搭棚造饭,他则立即伏案办公,“理公牍至四鼓”,只能靠第二天在车上假寐一会儿,其工作紧张、艰辛如同行军作战,对垦荒修渠工程他必得亲验土方,察看质量,要求属下必须“上可对朝廷,下可对百姓,中可对僚友”。别人十分不理解,他是一戍边的罪臣啊,何必这样认真,又哪来的这种精神。说来可怜,这次受旨勘地,也算是“钦差”吧,但这与当年南下禁烟已完全不同。这是皇帝给的苦役,活得干,名分全无。他的一切功劳只能记在当地官员的名下,甚至连向皇帝写奏折,汇报工作,反映问题的权力也没有,只能拟好文稿,以别人的名义上奏,这和治黄有功而不上褒奖名单同出一辙。林则徐在诗中写道:“羁臣奉使原非分”,“头衔笑被旁人问”,这是何等的难堪,又是何等的心灵折磨啊。但是他忍了,他不计较,只要能工作,能为国出力就行。整整一年,他为清政府新增69万亩耕地,极大地丰盈了府库,巩固了边防。林则徐真是干了一场“非分”之举。他以罪臣之分,而行忠臣之事。而历史与现实中也常有人干着另一种“非分”的事,即凭着合法的职位,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去贪赃营私。如王莽、杨国忠、秦桧直至林彪、胡长清、成克杰。原来社会上无论是大奸、巨贪还是伪小人,都是以合法的名分而行分外之奸、分外之贪、分外之私的。当然,他们最后也被历史所记录。陈毅有诗:“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他们被历史捉来,钉在了耻辱柱上。可知,世上之事,相差之远者莫如人格之分了。有人以罪身而忍辱负重,建功立业,有人以功位而鼠窃狗盗,自取其耻,自取其罪。确实,“分”这个界限就是“人”这个原子的外壳,一旦外壳破而裂变,无论好坏,其力量都特别的大。

林则徐还有一件更加“分外”的事,就是大胆进行了一次“土地改革”。当勘地工作将结束,返回哈密时,路遇百余官绅商民跪地不起,拦轿告状。原来这里山高皇帝远,哈密王将辖区所有土地及煤矿、山林、瓜园、菜圃等皆霸为己有。汉、维群众无寸土可耕,就是驻军修营房拉一车土要交几十文钱,百姓埋一个死人也要交银数两。土王大肆截留国家税收,数十年间如此横行竟无人敢管。林则徐接状后勃然大怒:“此咽喉要地,实边防最重之区,无田无粮,几成化外”,立判将土王所占一万多亩耕地分给当地汉、维吾尔农民耕种。并张贴布告:“新疆与内地均在皇舆一统之内,无寸土可以自私。民人与维吾尔人均在圣恩并育之中,无一处可以异视,必须互相和睦,畛域无分。”为防有变,他还将此布告刻制成碑,“立于城关大道之旁,俾众目共瞻,永昭遵守”。布告一出,各族人民奔走相告,不但有了生计,且民族和睦,边防巩固。要知道他这是以罪臣之身又多管了一件“闲事”啊!恰这时清廷赦令亦下,林则徐在万众感激和依依不舍的祝愿声中向关内走去。

150年后,我又来细细寻觅林公的踪迹。当年的惠远城早已毁于沙俄的入侵,在惠远城里我提出一定要谒拜一下当年先生住的城南东二巷故居。陪同人说,原城已无存,现在这个城是公元1882年由清朝重建的,比原城后撤了7公里。我说,这没有关系,我追寻的是那颗闪耀在中国近代史上空的民族魂,至于其载体为何无关本质。共产党夺天下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我们现在瞻仰的西柏坡村,不也是从山下上撤几十里重建的吗?我小心地迈进惠远城的那条小巷,小院短墙,瓜棚豆蔓。旧时林公堂前燕,依然展翅迎远客。我不甘心,又驱车南行去寻找那个旧城。穿过一个村镇,沿着参天的白杨,再过一条河渠,一片茂密的玉米地旁留有一堵土墙,这就是古惠远城。夕阳下沉重的黄土划开浩浩绿海,如一条大堤直伸到天际。我感到了林公的魂灵充盈天地,贯穿古今。

林则徐是皇家钦定的、中国古代史上最后的一位罪臣,又是人民托举出来的、近代史开篇的第一位功臣。(责任编辑 程 度)

“未名社”成员赵赤坪烈士

● 天国 锡九 韦顺

读鲁迅先生日记,在1925年5月至10月这段期间,每月都有这样类似的记载:“得赵善甫信并稿”;“下午素园、丛芜、赤坪(赵善甫)、霁野、静农来”;“夜李霁野、韦素园、丛芜、台静农、赵赤坪来”……这里讲到的五个人是生长在同一个小镇上的同乡同学和亲友。这个镇就是“鸡鸣听三县,犬吠惊两省”的叶集镇。它地处皖、豫两省和霍邱、金寨、固始三县的交汇点,属霍邱县管辖。叶集镇是大别山地带著名的老革命区。鲁迅日记中的素园、丛芜、静农、霁野是鲁迅领导的成立于上个世纪20年代的进步文学团体“未名社”的成员,赤坪则是以“未名社”作掩护的党的地下工作者。

赵赤坪,原名桐仁,又名善甫、善夫、池萍,生于1902年2月14日,一岁丧父,母子相依为命,过着家徒四壁饥寒交迫的日子。1922年他由亲友介绍离家到了安庆,入职工学校,半天学做皮鞋,半天学习。1924年,他说服母亲卖了两间旧房,凑了点钱去了新文化的发祥地——北京。这时候,由苏联学习回来的韦素园正在北京,由于他的邀请,弟弟丛芜、乡友霁野、静农也到了北京。受素园的影响,到北京追求“这世道非改变不可”理想的赵赤坪进了俄文专科学校学习。这期间他受到陈独秀、瞿秋白、蒋光慈等人的影响,接受了马列主义,开始了革命活动,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

赤坪入党以后,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性格也开朗了。霁野在回忆他的时候说过:“赤

坪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固然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但他的乐观主义精神更是鼓舞了我们。不知为什么,那时住在沙滩小楼的素园和我们都有些消沉,可赤坪就大不同。那时我们每餐只煮一点大白菜下饭,赤坪在烧饭时往往还低声唱着歌,他的笑声常常破除了我们索居的寂寞。有一次我们眼看就要断炊,又是临近春节的时候,真不免有些发愁。可赤坪总笑着说没有过不去的事,慨然担当了应付危机的任务。我们猜想,他大概要去赊欠或者当衣服。哪知除夕前夜,《妇女杂志》寄来30元稿费,这真是雪里送炭的一笔财富。这时赤坪笑着对我们说:“看,发愁悲观有什么用。”原来这是他给《妇女杂志》写的一篇文章的稿费。后来他又写了一篇论述乐观主义的短文。青春的魅力给了这几位血气方刚的青年以巨大的鼓舞,友谊也使他们充满了活力和希望,以勇毅的精神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去。



赵赤坪

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赤坪在天津一带进行建党工作,由于受到北洋军阀的注意和追捕,1925年他又回到北京。这时候素园他们因热爱文学和翻译,已经结识鲁迅先生有一段时日了。由他们引荐,赤坪也结识了鲁迅。此后,赤坪常常与素园等一起拜访鲁迅,或探讨人生问题,聆听教诲;或送稿件请先生审阅指点。我们在“未名社”编辑出版的《莽原》杂志上读到过他的几首诗歌。不管是隐喻深义,还是直坦心志,读来都令人叹服。

1925年“未名社”成立后,

赤坪就以该社职员身份利用搞发行作掩护,在京津一带发动群众,宣传共产主义,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向政府请愿。这个爱国行动遭到执政政府的残暴镇压,造成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作为先锋战士的赤坪参加了这次爱国示威游行,在弹雨中身负枪伤,但他仍奋不顾身地抢救重伤学生,引起军阀暗探的注意。此后他的行动常被盯梢,接着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组织上考虑到赤坪处境的危险,同时根据工作需要,便派他离京去广州参加毛泽东同志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这次学习,使赤坪对世界的形势,中国的国情和周遭的环境,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动力在农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革命理论的理解进了一步。他在讲习所结业后便随军参加北伐战争,受组织派遣在粤汉铁路工会、汉口总工会工作。这段时间,他虽然生活条件好了一点,但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总是穿着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形势急转直下,大批共产党员惨遭杀害。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派赤坪转到湖北应山县农村开展工作。在那里由于说话口音不同,他处处小心应付,但不久他还是被叛徒出卖被捕。当时白色恐怖虽然很严重,但赤坪已有心理准备,所以并不慌张。他凭借自己的机智和口才,说服了一个狱卒为他找到一位汪姓朋友。赤坪将自己在狱中供说的情况告诉这位朋友,托他把情况转告家里人。然后赤坪要求官方写信给家里来人保释。家里来人谈的情况与赤坪的交代一一符合,反动派只好把他放了。

出狱后,赤坪在应山呆不下去了,就转到河南农村开辟工作,哪知没几天又被敌人抓去投入监狱。敌人问他是什么地方的?干什么的?他很镇静地回答,在北京搞报刊发行工作。敌人马上就盘问他一些北京情况,赤坪对答如流。但是反动法官并不放松,又问他在北京的熟人和地址。他马上很有把握地回答“未名社”乡友的姓名和地址。这一次审问后,赤坪忖度敌人会向北京方面调查,他必须做好准备。

他把平时省吃俭用买来存着的一枚小戒指送给了狱卒,买通他代寄了一封信给“未名社”的乡友,详细说明了他在监狱向敌人回答的情况。没几天,敌人的调查信果然到了“未名社”,未名社的回复完全符合赤坪的交代,这一次他又堂皇地走出了敌人的监狱。

为了党的工作,赤坪没有离开河南,他又换了一个地方继续从事党的工作。可是那时候河南地主武装队异常活跃凶残,和贫苦农民的斗争非常激烈。敌人看见一个外地人在村里穿来跑去,很快又把他抓了起来。武装队里有人主张把他拉出去砍了算了,巧的是这个武装队的头目是读过几句诗书的地主,看到被绑了的赤坪,心血来潮要问几句话。他问道:“你读过书吗?在哪里?”赵答:“读过,在北京大学。”

地主有点惊讶,迟疑了一会儿,挠挠头说:“我来考问你一下,若真有真才实学,我保你。”赤坪点点头。地主说:“我出副对于你对,对上了,保你平安,对不上,嘿嘿……”赤坪镇静地看着对方。

只见地主摇头晃脑地出了上联:“赤匪横行,闹得家破人亡;”赤坪对道:“圣贤当道,才能国泰民安。”赤坪心里的圣贤当然不言而喻,是指共产党。但这个地主头子又哪里知道呢。相反,他听了很是高兴,拍拍胸脯说:“看面相就不会错,这个学生我保了。”于是他开了张路条,拿着这张路条,赤坪平平安安地走出了他们的地区。这件事,他后来对乡友们谈起时还不免哈哈大笑。

赤坪在河南还第三次被捕过。这一次是因为当地群众举行政治暴动,打开监狱,他乘机跑了出来。

这时候,中原一带白色恐怖严重。赤坪想想不如回老区家乡找组织。回到叶集,他开了一个小商店,意在联系当地的小学教职员工,向他们做宣传工作。哪知当时当地的政治形势也不乐观,不到半年,他又被迫出走,也不敢和家里通消息,辗转流离到了北京。这时候已经成立了两三年的“未名社”,在鲁迅领导下事业有了发展,和赤坪同乡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王青士、王冶秋、李何林、宋日昌、李云鹤等,因

在家乡组织暴动失败，也都到了北京。他们一面找组织接关系，一面以“未名社”作掩护，继续做地下工作。赤坪因为知道自己的处境不好，他没有住到“未名社”去，只是常常以“谈天”的名义去“未名社”探望乡友。这时候的赤坪，生活上虽一如既往地艰苦朴素，可作风上却改变了不少。他比以前沉默了许多，也不大声谈笑了，却骨子里还是乐观的。在聊天中，他常常讲些与敌人斗争周旋和监狱里的生活，给乡友们的印象是，他的作风更深入，斗争也更老练了。

一天晚上他又去了“未名社”，说最近生活可能有点变化。霁野他们以为他要到别的地方去，便问他是否需要钱。他微笑着说：“不，大概吃饭钱也可以省了。”这下大家都明白了，就劝他躲一躲。可是他说：走为上策不一定都行得通，他已做好准备。大约是这次聊天后的第三天，他正在“未名社”门市部闲坐，忽然进来一个陌生人，在屋里走了一圈就对着赤坪手掌向上一扬，赤坪就站起来，跟着他出去了。这就是当时常见的一种比较“文明”的抓人形式。赤坪被抓后，乡友们到处打听在哪里，千方百计营救。大约半年时间，他被保释，带着一身伤痕出狱了。

对于赤坪来说，在白色恐怖下，二三十年代做地下工作期间，被捕、入狱、逼供、拷打、释放，出出进进多少次，有时甚至是圈套。“未名社”的同仁记得，有一次，赤坪从监狱出来，到“未名社”看朋友。大家很高兴，很亲热地想问问他狱中情况。可赤坪非常冷淡，不仅不谈，而且还带着仇视的眼光。一时间大家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只好默默地安排他休息。可他就住了一夜，第二天国民党特务又将他带走了。原来，敌人放他是假，想利用他钓鱼是真。看他与“未名社”的人谈了些什么，也好一起抓走。但这个花招，赤坪早已看穿，敌人未能得逞。就这样，赤坪从一个监狱走到另一个监狱，敌人也越来越严酷，花招越来越多。到1933年，赤坪又在北平被捕，而且落在国民党宪兵手里。由于赤坪的坚贞不屈，敌人把他作为要犯解到南京监狱。这时监狱里已关着两位地下党员。他们凭

着地下工作经验，侧面观察了解了赤坪的一些情况后，谨慎地向赤坪发出试探性的暗语。通过秘密对话，赤坪告诉他们自己未暴露身份，一直说自己是“未名社”的书刊发行业员。他们也告诉赤坪，他们已被叛徒出卖，身份暴露，要设法帮助赤坪出狱。于是他们就在狱中演起了双簧，经常对骂。他们斥责赤坪：一个有知识的青年学生，不思报国，不干革命，实属儒家败类。赤坪则笑答：人各有志，人各有欲，你们能把我怎么样？暗探们听到这些，向上面一次次汇报，敌人似信不信，几经用刑拷问，狱方始终抓不到赤坪的把柄，只好拖着不放。这真是“已堪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做楚囚。”

赤坪一次次的牢狱之灾，“未名社”的同仁本来是想瞒着赤坪的好友、重症病卧京郊的韦素园。但是赤坪那些惊险、机智、忠贞和坚忍不拔的传奇故事，却常常传到他的耳中，当有人又谈起赤坪狱中斗争的故事时，素园不顾刚才略过血的虚弱身体，“垂死病中惊坐起”，倚枕写下一首《怀念我的一位亲友——呈坪》的诗，诗的结尾是：

总之，你是一个热烈渴慕自由的人
不想现在你又久久关在牢里
不过，敌人“黑铁”的高压
终敌不过我们“赤血”的奋起
朋友，等着吧
未来的光明的时代终究是我们的
不要悲伤
不要愁虑
今日的牢狱生活
正是未来的甜蜜回忆

多次牢狱，各种酷刑，终未能使赤坪屈服。敌人只好释放了他。他拖着伤残的身体回到了家乡叶集。为了生计，他摆过小摊，挑过货郎担，也送过报纸。环境恶劣，失去组织，回忆以往，他也常常感到难耐的寂寞。有时候他也买两口酒喝喝，喝着喝着，回想起当年轰轰烈烈的火热斗争，他放声大笑。有时又追思为革命而牺牲的战友，他又放声大哭。他的这些表现，乡邻们不能理解，所以有人传说：“赵善夫疯了。”对此，他也无所谓。一方面，他要忙着谋

生；一方面，觉得别人不注意他也好，可以休息，可以观察，可以等待。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共宣布合作。这一来，国民党就不能明目张胆地公开抓人了。有一次叶集各界人士召开抗日动员大会。在一个知名人士讲话后，赤坪突然跳上台大声发言：“现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了，有人还在搞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抱着先安内后攘外的怪论不放，老百姓能答应吗？”台上台下顿时鸦雀无声，稍停，台下有人议论：“赵疯子不疯嘛！”赤坪一听，怕暴露惹祸，马上一转话头故意大声喊道：“乡亲们不要怕，我是玉皇大帝派来的镇魔元帅，专降日本鬼子和那些害人虫的！……”这时台上台下又哄笑起来，说“是疯子”、“是疯子”，大会主持人国民党特派员芮毓英赶忙叫人把他拉下台去。

其实，作为国民党的特派员，芮毓英心里明白，一个老共产党怎么会是疯子呢，不过现在讲合作抗日，不能公开抓人。芮现在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校长，不如聘他到学校来教书，以便监视。就这样，赤坪成了小学教员。当时的学生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赵老师在课堂上那带着浓厚感情色彩的语重心长的讲话：“孩子们，国难当头，希望你们好好念书，长大成人，拿起枪来，不仅要把外国侵略者赶出国门，也要把那些吃人肉喝人血的吸血鬼全部干掉。未来是你们的，你们是国家的主人。”

从此以后，孩子们没有再叫他“疯子”的了，见面都是亲切地喊他“赵老师”。

抗日期间，日寇几度占领和道经叶集，烧杀抢掠，残害百姓，无所不为。赵赤坪联合当地人士李耕野、王杰三等人，成立了一支抗日游击队。一次，日寇一批军队由合肥、六安向武汉进犯，行至河南固始县的富金山境内，遭到国民党爱国部队阻击，伤亡惨重，逃窜时丢下后勤和伤员数百人驻留叶集。赤坪等抓住机会，派人潜回镇里了解情况，然后兵分三路夜袭，打死打伤日军100多人，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武装了游击队。

在赤坪的心里，只要是爱国利民的事，他总是尽力而为。有一次，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

的一架飞机，在帮助中国袭击占领南京的日寇时负了伤，勉强飞抵叶集降落。几位苏联飞行员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同围观的群众无法沟通。当地政府官员没有见过外国人，也不知上级意图，一时无所措。这时候赵赤坪和正在家乡休学的韦德培去了。赤坪会俄语，德培会英语，他们协助当地驻军热情地接待了友军，妥善安排他们的生活，然后设法修飞机，两三天飞机修好后送他们归队。临飞前，飞行员站在机仓门口，跷着大拇指用俄语高呼：“伟大的民族不可侮！中国人民万岁！抗日必胜！”当赤坪用汉语翻译出来时，群众欢呼雀跃，掌声雷动！

八年抗战，终于胜利，赤坪身虽伤残，但正当年富力强。他想今后可以出去干点事了，哪知时局的发展非他所料，国家并不安宁。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还都南京后就积极发动内战，一时间他无处可去。1947年夏季，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到了叶集，赤坪喜出望外，马上以抗日游击队队长身份，求见驻叶集的解放军首长。见面后，他拿出珍藏了20多年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结业证书。驻军首长热情接待，异常高兴，马上研究决定，任命赵赤坪为鄂豫皖边区爱国民主政府的负责人兼叶集镇镇长。这年冬天，解放军准备南下，赤坪带领群众积极筹粮筹款，支援大军。他们当时保证了路过叶集的解放军两个纵队每人带五天的粮食。不久，驻军离开叶集，很快，当地地主武装勾结顽匪乘虚而入。赤坪带领少数武装队员和政府工作人员转移到距叶集20多里的山区，一边发动群众，一边与反动武装周旋。1948年2月，鄂豫军分区一支部队奉命开到叶集剿匪，叶集民主政府的武装部队积极配合。一次，一股数百人的顽匪盘踞叶集，解放军以赤坪的队伍为向导，分三路痛歼顽匪200多人，为叶集地区民主政权的巩固，创造了有利环境。

但是，斗争是激烈的。4月，剿匪部队奉命调往金寨、霍山等地剿匪，叶集又空虚了。赤坪为了保存地方实力，暂时将部队转移到固始县境内，谋划剿匪事宜。一次，赵赤坪带领一两百人的队伍，与近千人的国民党残部、当地土匪和地主武装三合一的部队发生激战，因寡不敌

众,赤坪带队转移进山,敌人跟踪追击,又经过一天的激战,身先士卒的赤坪负伤被俘。土匪大队长台育祥是赤坪的小学同学,他佯示关心的样子对赤坪说:“善夫,你自己看看,你搞了几十年,到现在衣衫褴褛,骨瘦如柴,体伤肢残,还搞什么呢?你只要说今后不当共产党了,我看在同乡同学的面子上,放了你。”赵赤坪把眼一瞪,说:“呸,你敢放我,我还和你干,我等了多少年的日子到了,你们的末日也到了,我代表边区人民政府接受你投降,可以按解放军优待俘虏政策优待你。”台育祥不敢再听,心慌意乱地连连说:“他不疯,他不疯!”又转向赤坪声嘶力竭地吼叫:“好,我成全你!”一挥手:“带出去!”赵赤坪轻蔑地一笑,转身往外就走,他手里拿着解放军送他的写有“将革命进

行到底”几个大字的斗笠,从容不迫地走过大街,到了沙滩中心,昂首高呼共产党万岁,坦然就义。这一天是4月22日!

赤坪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可歌可泣的一生。叶集镇的政府和人民为悼念烈士,特营造陵园立碑。在外地的李霁野闻讯,不胜悲痛,想到赤坪一生受苦,而正当胜利盛年可以大展才智之时却牺牲了。他满怀激情为赤坪写下了碑文和挽联:

碑文:忠诚无畏一生战斗 坚贞不屈慷慨就义

挽联:报国有门天将晓 琴正响时弦断音

赤坪的家乡后辈,他的学生们也写下了许多悼念他的文章、诗词,深切表示对赤坪烈士的哀思。

(责任编辑 方 徨)

老年人的知心朋友和精神伴侣

欢迎订阅 2002 年《老人天地》月刊

本刊为全国综合性老年月刊,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于 1983 年由离退休老同志为主体创办。本着“社会关心老年人;老年人关心社会”的主旨,重视宣传党和国家老龄工作的方针政策,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内容丰富多样,文图并茂。

2002 年起改为大 16 开本,内文纸张改用 55 克优质书写纸,封面改用 150 克铜版纸,版面将有进一步改进。

每期 3.50 元 半年 21 元 全年 42 元

邮发代号:2—290

请到当地邮局订阅或向本刊邮购

账号:北京工商银行王府井分理处 046005—10

地址:北京东四六条 45 号方圆写字楼

邮编:100007 电话:(010)64032528

50 年风雨相伴,读书人的贴心朋友——

《全国新书目》(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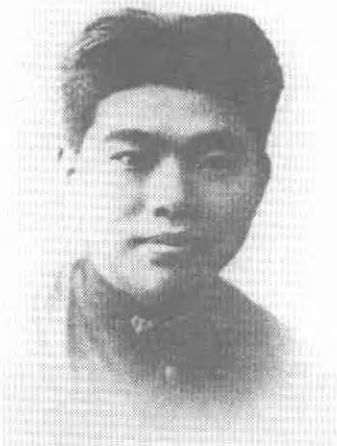
《全国新书目》是国内惟一公开发行的书目信息刊物,由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主办。

《全国新书目》依据独家丰富的书目信息资源,全面介绍国内所有 556 家出版社最新出版新书,每期以书目形式介绍各类新书约 4000 种,并择优评介、推荐好书约 200 种,使读者一册《全国新书目》在手,便知天下新书。《全国新书目》也因此成为越来越多的出书、售书、藏书、读书人的好帮手和贴心朋友。

《全国新书目》为月刊,大 16 开 128 页,定价:8.50 元,由邮局发行(邮发代号 82—25)。读者可在当地邮局订阅,也可径向全国新书目杂志社(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邮编:100005)订阅(平寄免收邮费)。

何功伟烈士留给我的记忆

● 吕 鸿



本刊今年第7期《何功伟其人其事》(于光远文)发表后,读者反应强烈。有的说,何功伟面对屠刀大义凛然,可谓当代文天祥;有的教师说,何功伟狱中遗书,内容感人又颇具文采,是中学生的教材。吴江同志阅后说,何功伟烈士的事,希望编辑部再做一做。

今年11月,是何功伟烈士慷慨就义60周年,恰好收到何功伟当年同学吕鸿的一篇回忆文章,特此发表以资纪念。

——编者

《炎黄春秋》今年第7期刊登的《何功伟其人其事》一文,又一次激起我对这位可敬可爱的学友和同志的怀念。

何功伟是我在湖北省立第二中学初中的同班同学(1930—1932)。他是全班品学兼优的高材生,文才特好,深得老师喜爱;他为人谦诚朴实,又颇受同学爱戴。但他体质瘦弱,很少参加体育锻炼。

湖北经受过1925—1927年大革命的洗礼。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北伐军“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深刻印象;也埋下对“四一二”蒋介石镇压工农群众、屠杀共产党人的愤懑。我和功伟都曾目睹了在汉口江汉关,一位年轻女共产党员高呼着“共产党万岁”口号,从容就义的悲壮场面。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东北大好河山转眼沦陷敌手。消息传来,我和功伟等同学痛哭失声。后经

何功伟倡议,和几个思想进步的同学组织了“读书会”,利用学校的钟楼空房,学习借来的进步书刊以及有关马列主义的书籍。

“读书会”很快由几人发展到十人,经民主推选,功伟成为“读书会”的会长,为了避免学校当局的注目,我们又组成振华篮球队,作“外围”掩护。篮球队长是杨海山,功伟任名誉队长。

记得何功伟搞到一本《朝鲜亡国惨痛》的小册子,大家传阅后深受感动。功伟建议在学校师生员工中进行募捐,由我用筹集到的钱在汉口一家印刷厂印了上万份。我们“读书会”的同学便利用假日在武汉市搞抗日救亡宣传,到处散发《朝鲜亡国惨痛》的小册子。《田中奏折》在武汉开始流传时,何功伟阅后十分愤慨,他把父亲给他的伙食费拿出来,在武昌找了一个印刷厂摘要翻印,并亲自带到司门口去散发。

二

我出身于资本家家庭,父亲吕超伯(号逵先)虽曾追随孙中山参加了武昌起义,并和他的同仁迫使黎元洪出主起义军务,但大革命失败后,他的思想逐渐趋向反共。我和功伟在学校中的抗日救亡言行,引起他的极大忧虑。他发现功伟写信鼓励我跟家庭的包办婚姻作斗争,并劝我同救亡活动中的女友结合后,大为

震怒,狠狠地对我说:“从此不许他再踏进我家门一步!”同时“调虎离山”,决定让我到苏州东吴去读书。

东吴是美国人使用“庚子赔款”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也是全国久负盛名的贵族学校之一。国民党达官贵人子弟在这里上学的颇多,蒋介石之子蒋纬国、中国银行行长唐寿民之子唐祖诒,都曾是我同班同学。由于我的软弱,被父亲置于一个与武汉完全不同的政治氛围中,我也一度埋头读书,政治上开始消沉。正是这时候,功伟和原来在武汉一道搞学生救亡活动的学友们,纷纷与我通信,鼓励我继续奋进,进而希望我在东吴发动学生救亡活动。这使我埋在心底的一点火烬又重新复燃。通过一位叫李志和的进步同学,又认识了他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堂兄李志中。李志中是老共青团员,上海党团被破坏后,他们自发地活动,组织了“新人社”(后又改名“中国青年社”),不定期地出版《新人》(后改名《中国青年》)。我曾自费为之寄发过大量的这些刊物,收件人和地址都是“社”里提供的,我并不认识。

在功伟的鼓舞和李志中的具体指导下,我们逐渐发动了东吴高中、大学的学生救亡活动,成立了东吴学生救亡同学会。杨望宝同学为会长,我为宣传委员之一。成立不几天,我们就组织了一次在苏州市区的反日宣传游行示威活动。这在号称“世外桃源”的苏州尚属首次。游行中散发的《东吴学生告同胞书》,原由一文采极好的同学起草,作为文章确属上乘,向市民作宣传又嫌不通俗了,同学会要我重新起草。我们学校的教务长沈祖懋是国民党的特派员。他虽无法阻止学生的爱国救亡活动,却深怕我们宣传内容上出问题,他坚持要我到他办公室去写《告同胞书》。他找不出内容上的岔子,又禁止使用学校唯一的手摇快速油印机来阻挠。还是同学们说服掌握房门钥匙的校工,晚上突击油印出来,才赶上次日游行活动的用场。

三

1936年4月,湖北省国民党当局,认定湖

北省学联是“受共产党操纵”,勒令强迫解散。功伟等进步同学又组织了秘密的武汉学生救国联合会,继续坚持抗争。6月,日寇增兵华北,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与广东的陈济棠联合反蒋。功伟因在反对内战救国会上提出“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口号,被列入通缉的黑名单,他不得不紧急化装,藏在渡轮货舱中,只身逃亡到了上海。

这年夏,我意外地收到功伟从上海寄来的信,我当即约他速来苏州。我俩相见,只见他又黑又瘦,穿一身破旧衣裤显得十分憔悴。我俩紧紧握着双手,半晌说不出话来。他说,他这次离开湖北太紧迫,除了随身衣裤什么也来不及带,为在上海找“关系”,随时有被捕危险,不得不天天钻电车。不过他又说:“我是早有思想准备的。即使比这更恶劣的遭遇我毫不后悔,也决不后退!”我让他在我住的地方洗了澡,换上一套我的白绸衣裤。他照了照镜子,很有风趣地说:“你把我扮成阔少爷了,这倒对于掩护身份有好处!”为了他的安全,也为了他能在我处养息一下身子,我劝他暂在我处住些时日,然后再回上海。可是他却执意不肯,一心要赶回上海去找“关系”。我深知他的性格,便给一些银元,送他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不久,从来信得知,他写文章落得一些稿费,生活上暂时有了一点着落……然而我仍不断给他汇去一些钱款。直至1936年8月,他来信说已经找到了“妈妈”,我才真的为他放心了。因为我完全理解他说的“妈妈”是他企盼已久的中共党组织。

同年冬,我到上海去与复旦的李志中同志接头之前,先去上海正风中学看望了功伟,当时他是以学生身份作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的。那天恰好是周日,许多学生已离校回家,我俩在学生宿舍里畅谈一夜。在我离沪之前,他交给我一件特殊任务:要我以“表亲”名义去探望一位被关押在苏州“军人第一模范监狱”的同志。我先后共去“探监”三次,每次都带一大碗雪里红炒肉丝。可恶的是监狱看守,每次让我登记姓名、住址、职业,与犯人的关系,却不允许我和这位不相识的“表亲”见面。

四

1937年6月,日寇飞机首次轰炸苏州,东吴学生大都离校回家。我与上海“中国青年社”失去了联系,与功伟联系也一时中断。为了我的安全,父亲电催我速速回到了武汉。

回武汉后,我很快与原来一起搞学运的学友(其中有不少是从北平“中国大学”回到武汉的)取得了联系。我参加洗星海在武汉组织的抗日宣传歌咏队,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不少前线伤兵转运到武汉。武汉学生救国会组织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慰问伤兵和抗日救亡游行示威活动。

至今我还记得到医院慰问时唱《慰问伤兵歌》。歌词是:“你们正为着我们老百姓,为着那千万妇女儿童,受到了荣誉的伤,躺在这病院的床上!帝国主义为了要逃脱深刻的恐慌,他们是这样地疯狂,自从侵占了我们的北方,又进攻到我们的长江,以及我们所有的边疆!他们要把中国当作一所屠场,任他们杀,任他们抢……”

遗憾的是,此时功伟仍奉命留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我们中断了的联系仍没有恢复。

五

那时我常想:假如不是和功伟中断了联系,和“中国青年社”中断了联系,或者说,假如功伟也能回到武汉,也许我也可以更早一点找到“妈妈”了。

回到武汉,寻求党的愿望更强烈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各地学子蜂拥奔赴延安。8月,通过武汉学生救国会里地下工作同志的关系,给我弄到了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介绍信。

一个深夜,我偷偷离家上了直达西安的火车。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康克清同志接待了我们分别来此的十多人。9月初,我参加了八路军设在临汾以北的“学兵队”,不久被杨勇(六八六团团长兼政委)亲自挑选参加该团,开始了我

的抗战生涯。一年后我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也终于幸运地找到了“妈妈”,可惜我无法将喜讯告诉功伟,让他分享我的这份喜悦。

1938年底,我随一一五师东进,先后曾在鲁西独立旅、湖西分区工作,1942年的一天,从延安辗转送到湖西前线的《解放日报》上,看到一则6月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举行隆重追悼大会的消息,追悼的竟是我日夜思念着的同窗学友何功伟。原来,他是在担任湘鄂西区党委书记时,由于叛徒出卖于1941年1月被捕。敌人对他施以各种酷刑,妄图迫使他屈服。他始终坚贞不屈。国民党第六战区长官看中他人才出众,以高官厚禄相许,规劝他“回心转意”,也遭到他严词拒绝。大失所望的敌人,于当年11月将他杀害。功伟如此慷慨就义壮烈牺牲,使我不禁暗暗泣哭不止。

何功伟同志已经英勇就义60年了,我写下这篇回忆录,既表我的一片奠祭之情,也是为了想了解功伟同志的人们,提供一点资料。

(责任编辑 洛松)

中国发行量最大的通俗文学名刊

今古傳奇

创刊号出版一周年纪念册

今古傳奇 单月号

豪迈的中国气派 独特的民族风格
强烈的大众意识 鲜明的时代精神

订阅代号38-83 逢单月1月出版,每册定价9元,全年6期共54元。

六期大纪念,60个风云人物的悲欢离合大結局

今古傳奇 双月号

家喻户晓的真实人物 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与众不同的策划包装 独树一帜的传奇品质

订阅代号38-373 逢双月1月出版,每册定价9元,全年6期共54元。

全心打江山,情,也 英雄李自成,我,也

今古傳奇 故事版

以奇抓人 “刊”称一流
以情动人 “泪”容丰富
以趣娱人 “笑”果显著

订阅代号38-349 每月1月出版,每册定价2.5元,全年12期共30元。

大福自创,全球唯一的武侠周刊

今古傳奇 武侠版

试问天下英雄 谁能称霸武林
且看苍茫大地 惟我笑傲江湖

订阅代号38-370 每月1月出版,每册定价3.8元,全年12期共45.6元。

我们承诺:期期都有拍案惊奇 篇篇都是精彩文章



大传奇 小传奇 今传奇 古传奇 应有尽有
传统版 纪实版 故事版 武侠版 任君选择

茅盾在作协往事

● 涂光群

新中国成立后,我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30年,虽为一普通干部,有幸也常能见到作协主席茅盾,聆听他的讲话;看到他为新中国文学事业所做的工作及他的处境;因工作而跟随我的领导去看望他,或有事被指派去他那儿跑跑腿。现记下我了解的茅公的点滴往事。

建国后,茅盾身为文化部长,本来活动、应酬等事务就多。但他总是不嫌麻烦地、没完没了地亲自回复那些想当作家的年轻人慕名寄给他的信件和稿件,有的人连句子都写不通,别字连篇,还想写小说,要茅盾先生给以“指点”。历届《人民文学》负责人,像邵荃麟、张天翼、严文井等,他们都在期待茅盾先生写出自己的新作(如《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续篇);不忍看见这位大作家宝贵的时间、精力,耗损在回复来稿来信这类普通编辑能做的劳作上,因此常对他说:您将这类来信来稿交给我们的编辑部处理吧。但茅盾律己甚严,除了明显写着“人民文学主编茅盾收”这类信、稿,有的他亲批“请人民文学编辑部处理”外,仍有大量直接寄给他的无名作者的信、稿,是他亲自处理的,而不由秘书代劳。老人的态度非常严肃认真,他细心地、一丝不苟地答复那些想当作家的人们的提问。此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的《茅盾书信集》中,看茅盾先生花费了那么多时间、精力,给那么多的人们回信,我更多的是痛惜。为什么茅盾先生无法发挥他的创作专长,反而将时间耗费在不必由他去做的事情上呢?但从茅盾先生给别人的回信上,却可以见出先生的为政风格和一尘不染的高尚品德。例如1957年一位从事茅盾作品研究工作的年轻学者给

他写信,讲到自己新写成一篇研究论文,可否由茅盾先生帮忙介绍出版?这位年轻学者有这样的设想可以理解。然而茅盾先生是这样答复他的:“您的论文,是花了功夫写的,富有实事求是,客观分析的精神。恕我不能提供什么具体意见。作为一个被研究的作家,我向来是只愿意倾听批评,而不愿意自己说话的。同样的理由,我也不便把您的这篇论文介绍去出版;如果我这样做了,特别是因为我还是文化行政的高级负责人,便有利用职权、自我宣传的嫌疑。”

茅盾先生对于文学青年、文学人才,总是不倦地关心、扶持,还包括他从浩如烟海的各种文学出版物中直接发现优秀人才及作品。他对有才华的年轻作者及其新出炉作品,总是持宽大、支持和欢迎的态度。

1957年4月间,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鼓励鸣和放。但是到底“放”到何种尺度?有何标准?大家都没有经验。谁都跃跃欲试,谁也没有把握,谁都不敢吃第一口螃蟹。当年《人民文学》杂志小说散文组从作家和投稿者中挑选出六、七篇把握不定的小说稿,先在编辑部内传阅。结果有的稿子发生争议,对有一定艺术质量的稿件是否可发,连编辑部的头儿也拿不准。于是作协领导人、原《人民文学》主编邵荃麟建议我们送给茅盾先生(1953年下半年《人民文学》编委会改组,茅盾不再担任主编)一阅。我们送去东四头条老文化部西边小楼茅公家。没过几天,茅公就全部看完,将稿件交给我们。我印象深的是茅公在我们争议最大的两篇稿上,明确批了字,认为“两稿都可以发表”。这两篇小说,一是常给我们写稿的北京市青年

作家林斤澜的短篇《一瓢水》，这篇小说我记得是写战时西南一小旅店发生的故事，意境、气氛都造得不错，只是文字略嫌晦涩。编辑部有人不主张发表，认为如发表，岂不是提倡晦涩？另一篇是卫生出版社一位徐铁钢编辑的来稿，约3000字。小说题目叫《爱的成长》，用的是“蓝珊”笔名。故事是讲一个小男孩起先不认他后妈。后来由于这个后妈对小孩细心呵护，投入自己的真诚爱心，结果小孩深受感动，最后唤了一声“妈”。作者采用白描手法，文笔细腻、生动，入景入情，是一篇可读之作。然而对这篇小說的争议很大，有人认为小说是鼓吹人性论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作品，不应发表。编辑部的人还是尊重茅盾先生的权威，尽管有个别人不欣赏也不赞成这两篇，还是同意将两篇都安排在《人民文学》发出。这件事的余波是反右开始后，徐铁钢在单位被划为右派，发配青海劳改。一篇提倡爱心的小说，竟让作者蒙冤遭祸。

1958年《人民文学》副主编陈白尘有个倡议，每年让茅盾先生为刊物写一篇分析、评论全国短篇小说的文章，这有助于提高小说创作水平，同时也可以推出、奖掖文学新人。白尘说，他同茅公讲了，茅公答应写，正在读作品，做准备。我那时已调评论组工作。我们问白尘，要不要评论组提供作者和作品线索（对有些为刊物写评论的作者，我们通常是这样做的）？白尘说，不用了，文学杂志茅公那里都有，他读作品比我们多，并且读得仔细，有的他读过的作品我们未必读过，甚至也不一定知道。不久茅公交给《人民文学》一篇《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其中他颇为兴奋地推荐了上海青年女作者茹志鹃发在《延河》上的小说《百合花》。这之前，编辑部的人除知道茹志鹃是上海一位文学编辑，并不了解她小说写得好，也没有人留意她在《延河》发的这篇小说。当时，这类风格细腻、含蓄、富有诗意的小说，是颇不合那年代大喊大叫、“意气风发”的调儿的，所以作者曾屡遭退稿。茅盾先生真是慧眼识珠，大家找来一看，觉得小说果真是好，茅盾的评语“清新俊逸”也很准确。于是白尘作出决策：1958年第6

期在刊登茅盾先生文章的同时，转载茹志鹃小说《百合花》。这一期杂志出来后，社会人士观感甚好，觉得在发现和扶持文学新人、注重作者不同的个人风格方面，茅盾先生为文学界开了个好头，做出了榜样。而青年女作家茹志鹃就从此脱颖而出。

苏州的青年作家陆文夫，1957年因参与发表探求者文学宣言，被长期下放劳动。他在工厂扎扎实实地工作，向工人学习生产技术，同他们打成一片，几年时间，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于是在1961年、1962年之际，他陆续给《人民文学》寄了几个短篇，这些作品很熟练地写出了工人、技术员的形象，情调健康、向上，有的则妙趣横生。执行主编陈白尘、李季很看重他的新作，有的发在头条，如《葛师傅》、《二遇周泰》。1962年，茅盾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对陆文夫写工厂生活的新作和他长期在劳动者中认真体验生活，给予肯定、赞扬。这期间，上海工人出身的作家胡万春，写了一些反映工厂生活变化的小说，也引起茅盾先生的注意，写信给以鼓励；同时指出了年轻作者易犯的毛病（如写作中会出现概念化），希望勤于思考、学习，继续提高自己。（此信发表在上



1957年，茅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与读者见面

海《文汇报》上)

茅盾是现实主义小说大家,但他对现实主义小说的取材、人物选择、写作方法、技巧等,从不拘泥、狭隘,一向看得很宽广,他自己的小说实践也是如此。就拿他小说的人物画廊来说,是很多样化的。因为社会的人物是复杂多样的,小说的人物怎么能够简单、单调呢?

1962年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开小说创作座谈会。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会,邀请作协主席茅盾出席指导,到会的有北方、南方的十几位作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也到会,同大家见面讲话。我是会议的记录之一。会议的目的,是与作家们共同总结前几年的经验教训,反对创作中的浮夸风、虚假的“浪漫主义”,以使创作回到实事求是,正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塑造真实可信、而非虚假的人物形象,回归现实主义健康轨道上来。会议气氛宽松、活跃,作家们畅所欲言,讲到前几年说大话,鼓虚劲,对创作者造成的压力和有害影响;讲述自己对生活和创作的思考,也诉说着创作中的苦闷。茅盾先生每天到会,认真倾听作家们意见,和会议主持人邵荃麟一道,以发言或插话方式,发表自己的见解,同大家交流。在谈及现实主义应当坚持和深化时,茅盾、荃麟,根据创作规律和中外作家成功经验,提出人物的形象塑造也应多样化,英雄人物是需要我们格外注意的,但处在中间状态的各种人物也不可忽视,也宜放在我们视野中,观察、研究和塑造。这既丰富了现实主义创作,也使我们的作品深入一个更广大的读者群,使这些读者从中受益。茅盾、荃麟的意见,针对了作家们提出的问题,切实而中肯。

茅盾先生是中外知名的中国左翼作家,他信仰坚定、谙熟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谨言慎行,总是在冷静地观察着、思考着。对社会生活,他很少发表自己见解,也不人云亦云,但并非没有自己成熟的思考和见解。1963年上半年,编辑部约茅盾先生写散文,他赐给我们一篇《海南杂忆》,发表于《人民文学》当年第6期。茅盾先生是写散文、杂文的能手,建国后却很少施展。《海南杂忆》实际是一篇杂文,它言

简意赅,凝重、深沉,艺术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我至今记得,他从海南岛“天涯海角”奇拔的岩石,联想到流放在海南荒岛的宋代诗人苏东坡的《儋耳山》那首五绝:“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遗!”又联想到历代封建王朝的当权者,因听不进逆耳忠言,而对忠臣良将给以贬斥、放逐。自唐、宋以来,国家需要的这些名臣良将,流放到海南岛的真是络绎不绝。他们无缘补天,却“获罪”被放逐到这里来作“道旁石”。茅盾先生写道:千载以下,真叫人读了苏东坡这首诗同声一叹!《海南杂忆》的另一段,是从公路旁的草本植物鸭脚粟,联想到明朝海南岛诗人王佐赞鸭脚粟的诗。王佐诗中写了海南岛的劳苦百姓,庄稼大熟、小熟都不能够自己享用,而他们经常借以维持生命的是鸭脚粟。王佐还有另一首诗《天南星》:“君看天南星,处处入本草。夫何生南海,而能济饥饱。八月风飏飏,阊阖菜色忧。南星就根发,累累满筐收。”茅盾先生写道:“这就是说,(大熟八月登)以后,老百姓所得,尽被搜括以去,只得靠鸭脚粟和天南星过活。王佐在这首诗的结尾,用了‘含泪微笑’式的两句:海外此美产,中原知味不?”

茅盾20世纪60年代初期游海南,受到的生活安排和照顾甚是周到,然而他却无心游山玩水,而是忧国忧民,像他的文学先辈屈原、杜甫那样,心中装的是百姓的冷暖。他在天涯海角发思古的幽情,想到历代吏治的腐败,使老百姓忍受饥荒之苦,面有菜色,靠吃野草野菜维持生命。茅盾写的是历史,他期望人们以史为鉴。他心中装着的是在日益频繁的政治运动中被错整获“罪”的那些由“补天石”变为“道旁石”的开国元勋和那些直率进言的知识分子们,那些在“穷过渡”中曾被折腾得忍饥受寒的人们。

茅盾不幸而言中,在此后的年月,他也“获罪”了。1964年的文艺整风,文学界重点是查1962年的大连小说创作座谈会,原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邵荃麟直接获罪,《文艺报》发表大块批判文章《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这个“资产阶级”除了被公开点名的邵荃

麟,还有被内部点名的茅盾先生。指责茅盾不仅是“中间人物论”的鼓吹者,他还“代表资产阶级争夺青年”,说他“吹捧”陆文夫,给工人作家写信就是典型的例子。这是当年一位文学界领导人在1964年下半年一次内部讲话中讲的。1962年以后仍是中国作协主席、文化部长的茅盾,几乎不再在中国文学界的活动中露面。1965年“文革”前夕,沈雁冰(即茅盾)被免去文化部长职务。“文革”中茅盾虽被保护,但在那漫长十年的处境,除了挂着个政协副主席的名,他孤独、寂寞、抑郁,跟被冷落的“道旁石”也差不多。1970年仍有文学爱好者写信给他求助。茅盾在回信中说:“你写了长篇小说,希望我看看,提点意见。但是抱歉得很,我不能满足你的愿望。因为我虽然年逾七十,过去也写过小说,但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旧作错误思想多、极严重,言之汗颜。我没有资格给你看稿,或提意见,一个人年纪老了,吸收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便衰退。最近十年来我主观上是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但实际上进步极少,我诚恳地接受任何批评,也请你给我批评,帮助我。此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沈雁冰一月二十六日。”一个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处在“文革”那样一种境地,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茅盾先生在“四人帮”被粉碎后,虽说年老体弱,但他的精神实现了解放,他对未来重又燃起信心,总愿意为这已经到来的新时期做点事情。我还记得1977年10月下旬,《人民文学》杂志举办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我们打算邀请一些文艺界著名人士和中青年作家到会。这将是文学界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集会,这时文联、作协都还没有恢复。编辑部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立刻想到了刊物的第一任主编、作协主席茅盾先生。于是我和周明打前站,去交道口南三条茅盾先生的新住所,先去探望茅公。我们在后院书房里见到了茅盾先生,他身体比以前消瘦多了,且在这冷季,常犯哮喘,视力也大大减退。但先生仍未放弃看书、写字。一听说《人民文学》将开小说座谈会,先生显得兴奋,答应争取到会。开会那天,天气也是阴冷冷的,但去接茅盾先生的车,居然将茅



郭沫若(中)和茅盾(右)向获得世界和平理事会国际和平奖金的画家齐白石祝贺

公接来了。会上许多文学界的老人走到茅公面前同他握手问好,中青年作家更是热情如火地将他们敬爱的师长围了起来。茅公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一个月后,《人民文学》编辑部邀请在京的更多文学界人士开座谈会,这次除了批判“四人帮”炮制的“黑线专政论”,还酝酿恢复文联、作协。茅盾先生又一次应邀到会。关于恢复文联、作协,记得茅盾先生在讲话中幽默地说了一句,谁也没有听说取消了文联、作协,我还是全国作协的主席呢!茅盾先生的意思很明白,恢复文联、作协是很自然的事,说恢复就可以实现恢复。实际上文联、作协的工作也是渐渐地恢复了,正式宣布恢复则是1978年5月开了文联全委扩大会之时。茅盾先生以自己的行动,热情支持了文联(他原来就是全国文联的副主席)、作协在新时期恢复工作和拨乱反正。不仅如此,他以多病的高龄,写出了极具历史价值的部分回忆录。两份遗言,一是申请恢复党籍,一是稿酬25万元留赠中国作家协会,做长篇小说获奖者的奖金。茅盾为自己追求理想的一生,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责任编辑 舒元璋)

地下影人的重庆回忆

● 钱筱璋 遗作

每个人在他的生活和成长发展过程中,总是有一些难以磨灭的记忆,常常在自己的脑海里回荡,把自己引入深沉的思念之中。我也常常如此。在我走向革命征途的时刻,是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给了我难忘的教诲和帮助,才使我能够踏上自己所憧憬的道路。

1940年春天,我作为电影界的地下党员,刚从香港回到重庆不久,就到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中制”)工作。有一天,陈波儿(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著名的电影演员和社会活动家)通知我,说已和周恩来同志约定了时间,要我去见他。这最初的会见主要是联系我的党组织关系。我听到要见周恩来,真是又惊又喜,我没有料到我的这点事竟会麻烦他,由他来亲自过问。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周恩来,但是我似乎早已认识他了。在那以前,我曾怀着极大的兴趣读过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在斯诺的笔下周恩来传奇般的光辉形象,早已使我神往,深深地在我的心里植下了无限的思念。我还深知,1938年在筹建延安电影团时,周恩来就是积极的赞助者,为她的诞生付出了心血。现在我能有机会同他见面,这是多么值得兴奋的事啊!

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到曾家岩50号,这里就是重庆进步人士熟知的被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宪警重重包围监视的“周公馆”。我被引进周恩来的办公室,他正在工作,见我去了,连忙放下手中的工作,亲切地招呼我和他隔着办公桌面对面地坐着谈起来。开始我很拘谨,神态不自然,这是因为我是带着旧社会固有的习惯看待周恩来的。那时,人们都称呼他周副主席,

我以为他是副主席,是党的重要领导人,是叱咤风云的人物,我当时不过是个普通党员,一个平平常常的电影技术人员,而且是个年纪刚20出头的年轻人,政治上是很幼稚的。可是在交谈过程中,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他由于我的幼稚而另眼相待,相反,周恩来很注意地听我的谈话,完全不像是第一次同我见面。我被他那平易近人的非凡美德和循循善诱的教诲深深感动,我的拘谨不知不觉地消失了。

我向周恩来汇报了我从香港回来后的工作情况和想法,他似乎已有所了解。他和蔼地从当时的形势讲到应做的工作,最后特别嘱咐:要在周围的群众中多做宣传工作,多交朋友,帮助他们进步,争取为将来建设延安的电影事业输送必要的技术力量。周恩来在重庆那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尖锐复杂的斗争,他日理万机,操劳无度,就在这样的时刻,他还为党的电影事业的建立,高瞻远瞩,精心筹划。他对我深切关注,正是表明他对党的电影事业前途的殷切期望。正因为这样,周恩来对我的党组织关系问题作了慎重的考虑,可能由于当时重庆的政治情况和我所处的工作环境,他决定我直接和他单线联系。自那以后,我就和周恩来保持着这种关系。我每隔一个时候总要到曾家岩50号去一次,而每次会见之后,周恩来总是要招呼我到“救亡室”去看看延安的报刊和文件。这对我来说,实在是难得的学习机会,使我能够了解斗争形势,受到党的教育,提高自己对革命的认识。除了和周恩来直接联系外,他还指定张颖(“文革”前在剧协工作)和我联系,她有时也到“中

制”来找我。

我从香港到重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下,感到生活十分苦闷,渴望着陕甘宁边区的自由生活,非常向往延安,真是朝思暮想,恨不得一下飞到那里。于是我去请示周恩来。我把自己的真实思想说了出来请求批准。谁知出乎我的意料,周恩来认为我的要求不合适。他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耐心地说服,帮助我认识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不对。我始终牢记不忘的是周恩来同志严肃地对我说的这句话:都到延安去,这里的工作谁来做?这句言简意赅的话,对我是很好的教育,也是中肯的批评,帮助我打开思索的闸门。是啊,我不是一般的知识青年(那时知识青年到延安去是很多的),我是一个党员,党组织要我宣传群众,团结群众,争取为建立党的电影事业输送力量的工作还刚刚开始做,怎么能只考虑个人愿望放弃这里的工作阵地呢?周恩来从党的原则着想,严格地要求我,端正了我的认识,使我克服个人打算,安下心来继续留在重庆做我应做的工作。

这年夏天,组织上转来袁牧之(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电影演员和导演,已于1938年先行赴延安建立延安电影团)从延安给我捎来的信。他刚从华北敌后拍完《延安与八路军》这部影片,跋山涉水回到延安。这封信辗转递到我的手里已经时隔几个月了。袁牧之在几页土纸上满怀深情地写着要我速去延安,那里的电影工作已经开展,是我去的时候了。我和袁牧之在武汉分别时曾约定,他到延安工作到一定的时候,就通知我去。我激动地带着这封信去请见周恩来同志。他尽管工作很忙,还是抽空接待了我。他把延安来信仔细地看完,思索了一下。从他的神情可以看出,他为牧之信中谈到的电影团的工作情况而流露出愉快的笑容。他立即爽朗地表示同意我就去延安。当时,我是以技术人员的身份在国民党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周恩来考虑到这一点,明确地对我说:要考虑用什么方式走,不能秘密地走,要公开地走,免得给他们抓住把柄。没想到他说完话,就拿起信笺,立即挥笔,以他个人的名义为我给当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郑用之

写信,大意是说,延安准备建立一个小规模的电影制片厂,由于缺乏技术人员,希望借我去帮助工作一个时期,请他给予支持准许我去。他还在信上婉言地说,如果将来“中制”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回到“中制”工作。这位厂长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是周恩来在黄浦军校任职时期的学生,所以,他才亲笔为我给郑写信。他想得很周到,照顾到当时两党统一战线关系,严格地把这件事联系起来考虑,争取我能合法地去延安。他的良苦用心使我深受教育。遗憾的是,我将信交给厂长,他打官腔说,我手头的片子《白云故乡》还没有完成,走不开,以后再说。实际这位厂长就是不肯放我走。我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周恩来,他指示我:既然他们不肯放你走,只好等待以后的时机。我虽然没有走成,却从他对我的关怀和帮助中,进一步体会到他坚持党的方针、政策,对党的电影事业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

此后,国民党反动派阴谋策动新的反共高潮,对我党和革命人民采取种种卑鄙的迫害活动,重庆的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就在这个时刻,周恩来同志在一次同我见面谈到当时的政治形势时,怕我这个缺乏斗争锻炼的人产生思想顾虑,非常爱护地对我说,目前形势还没有到很严重的时刻,可以继续留在那里坚持工作,有情况我们会知道的,到时通知你。他在那样恶劣的政治形势下镇定自若,给了我极大的感染,他的话使我感到很体贴,受到鼓舞,增强了我的战斗信念,坚信党的力量。更使我感动的是他对同志的细心关怀,他的心里记挂着多少同志的安危啊!而他却总是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忘我地献出自己的一切。

1941年初,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重庆的政治形势更险恶了。这时,“中制”内部的政治情况也愈来愈坏,我感到不能再在“中制”呆了,经过和党组织商量,决定我先回贵阳家中去,要有可能去延安时,由组织上通知我,我就立即从贵阳回重庆再去延安。

我不得不离开我的工作场所,抛弃了自己的职业,冒着风险,秘密地隐蔽到长江岸边一

个不为人注目的小客栈里住下,等待搭汽车离开重庆向南边去,这是一次冒险的远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周恩来派人想方设法找到我,给我送来了重要的通知,要我马上改变行动方向,往北撤到延安去。听到这个消息,我是多么的高兴啊!这就是说,我的多年宿愿可以实现了。

1941年6月上旬,按照约定的日期和地点,某日晚上我来到新华日报馆。由于一点事耽误了时间,我迟到了10多分钟。当我走上楼梯的时候,却看见周恩来和董必武同志站在二楼的楼梯口,像是在等待什么人。我走到他们跟前,周恩来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你为什么不遵守时间,让我们等你这么久,不应该这样嘛。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受到这样严肃认真的批评。当时我真是万分羞愧,感到怎么能由于我的马虎而浪费周恩来同志的宝贵时间呢?而且在那样尖锐复杂的地下斗争环境中,准确地遵守约会时间是多么重要。这一次的不平常的批评,成了我终生难忘的记忆。

这天晚上我要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去,以便在那里做好去延安的准备。可是要从重庆市内到郊区红岩确实很困难,国民党反动派在途中设有重重关卡岗哨,到处有特务严密监视,要想进入红岩实在不易。周恩来为了我的安全,让我乘他的汽车同他们一起上红岩。上了汽车,我坐在周恩来同志和董老的身边。车在急驶,眼看着在夜幕笼罩中的山城逐渐从车窗两旁退去。此刻,我的心不平常地跳动着。车子把黑暗的重庆甩在后边,朝着郊区的红岩前进。车到红岩山下停了。我们下车沿着那条小路走上去。虽然夜色深沉,但是红岩却似高擎的火炬,远远地闪耀着亮光显现在我们面前。我跟随着周恩来和董老,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我的心潮澎湃,像游子回到了故乡,到了红岩就是到家了。

按照周恩来和党组织的周密布置,我在红岩做了出发的准备。我们一起去延安的有30多人。从重庆到延安,路途很远,估计敌人不会顺顺当地让我们过去,他们不会不进行阻挠和破坏,甚至蓄意制造借口逮捕我们。党组织

为了防范这种事变,采取了各种相应的措施。党组织决定不暴露我的电影工作者的真实身份,让我化名陈阿祥,改装作为一名汽车修理工人。同时为了应付敌人的刁难和在危急情况下掩护我,还特意让三名真正的汽车修理工人肖一志、鲍世泽、李玉生伪装我的徒弟,尽可能在途中保护我的安全。我是根本不会修理汽车的,临行前,三个“徒弟”还教给我一些修理汽车的知识,以防万一。

周恩来把在他身边工作的龙飞虎,一位精明能干富有斗争经验的老红军派来当我们的领队。这种对于干部无微不至的关怀,对建设党的电影事业的极大重视,怎不使我由衷感激。正是由于周恩来和党组织的周密安排和精心照料,我才于6月下旬平安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后来,阳翰笙告诉我:“在重庆时,有次张治中开玩笑地问周恩来:你们电影界有哪些党员?周说,你看有哪些人?你觉得哪些人是党员?张问,郭沫若是不是?阳翰笙是不是?田汉是不是?周答,这些人都是。他们都同情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你们国民党如果主张抗日救亡,他们拥护你,如果你们不抗日救亡,与日本妥协,他们就反对你。张治中又问,难道你们一个党员也没有?周说有,就是‘中制’的钱筱璋,还有一个你们知道的陈波儿(我们两人当时都已到了延安)。钱筱璋在你们那里学了很多技术,我们谢谢你。”

1943年秋,延安电影团摄制完成了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延安军民都亲切地把这部影片称作《南泥湾》。影片映出后轰动了陕甘宁边区,这是党的电影事业开创后制作的第一部完整的影片。虽然它在艺术和技术上还很落后,但在当时延安极度困难的条件下,能制出这样的影片已是很了不起了。影片满腔热情地歌颂了人民子弟兵,体现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方向,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成就。

有一天,我们来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给中央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放映这部影片。这是一部无声影片,但是我们进行了巧妙的创造,从部队电讯部门借来了扩大器和手摇马达,从

鲁艺音乐系借来了留声机,并请他们帮助选配了适合画面效果的音乐唱片,放映时手摇马达带动扩大器,用留声机放音乐,用小喇叭当话筒现场解说,把它映成了和有声电影毫无差异的“有声影片”了。影片映毕,观众在掌声中散场。就在这个时候,却有一位同志,不是向场外走而是向银幕后面我们放置扩大器和留声机的地方走来。我们很快认出来,他是周恩来。他亲切地向我们问好,看看我们是怎样配音的,并热情地赞扬我们的土法“有声电影”。他鼓励我们把影片送到群众中去,广泛地给工农兵放映,使边区军民都能看到这部影片,鼓舞边区军民克服困难,发展生产,建设边区,支援抗战。他的指示是对这部影片最好的评价。这是

我到延安后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我高兴的是我们电影团能用自己土法制作的影片来向周恩来同志汇报我们的工作成果,让他看到他用心血灌溉培育的党的电影事业,终于突破重重困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长久以来对电影事业的期望开始得到实现。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周恩来才以异常关切的心情,在观众散场之后,亲自到放映机旁来看望我们,指点我们贯彻毛泽东同志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要我们沿着无产阶级的文艺道路迈进。这种感情使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面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我们也以没有辜负他的期望能够制出这样的影片而感到安慰。 (张岱整理)

(责任编辑 赵友慈)

代购代邮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百年聚焦(上中下)	史义军	59.80	6.00
叶剑英在关键时刻	范 硕	23.00	3.00
陆定一传	陈清泉 宋广渭	29.80	4.00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			
分析与反思(上下册)	张 化 苏采青	59.80	5.00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	纪希晨	49.00	4.00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			
	张湛彬 刘杰辉 张国华	25.00	4.00
昨夜西风凋碧树	徐光耀	15.00	3.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4.00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杨奎松	29.80	4.00
石破天惊	张湛彬	29.00	4.00
斯大林秘闻——			
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	爱德华·拉津斯基	39.00	4.00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 思	16.00	3.00
在伟人身边的岁月——毛泽东保卫参谋、周恩来随从			
副官的回忆录	吕荣斌	29.80	4.00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	徐晓 丁东 徐友渔	26.00	4.00
野百合丛书(共六册)(邮购全套六册邮资费减半)			
之一 王实味——野百合花	黄昌勇	14.60	3.00
之二 胡风——死人复活的时候	晓风 梅志	18.80	3.00
之三 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	叶永烈	15.00	3.00
之四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	罗银胜	16.60	3.00
之五 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	谢 泳	14.80	3.00
之六 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	谢泳	16.60	3.00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叶剑英在关键时刻》记述了叶剑英在革命战争时期、十年浩劫及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等几个历史危难关头的杰出贡献,从而体现了他那“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临危而智勇奋,投命而高节亮”的品格。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文革”中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风行时,遇罗克顶风写出《出身论》等文章痛斥唯成份论。遇罗克冤死法场30年后,《遗作与回忆》一书出版,其中收录的他的遗作和他亲友的回忆文章,再现了他在疯狂年代中的觉醒与抗争。英雄的血,平民的泪,令人震撼。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本书将告诉您:周恩来提出辞去总理职务请求的原因;邓小平坦言他也犯过错误;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的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南海;赵树理与陈伯达相近的感受。

欲购者可直接将书款汇至炎黄春秋杂志社。

社 址:北京东城区戏楼胡同1号

邮 编:100007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

邓小平之弟邓蜀平的故事

● 尹 骐

在毛毛（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的三叔邓蜀平（邓先治）解放前是个小地主，人没有什么本事，还抽点鸦片烟。解放后父亲把他送去戒了烟，让他受了点革命教育，然后一直在贵州省六枝地区做点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本人的地主成分和他兄长的倒台受牵连，被迫害致死。”

看了这段话后，不禁使我想起了一段亲历的往事，这就是邓小平如何把他的弟弟邓蜀平送去接受革命教育，又如何让他参加革命工作的故事。这故事在当时似乎平淡无奇，似乎本该如此。然而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却不能不令人感到别有深长之意蕴。

最初印象

1950年的4月末或5月初，我所工作的单位——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西南革大”）二部四班来了一位新学员。此人年纪40出头，身材不高，已经有些发福，一套新的灰布中山服紧巴巴地绷在身上，平头乌发，方脸浓眉，上唇还蓄有一抹短须，在众多的新学员中显得有点异样。

西南革大是由当时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为培养大批急需的干部而创办的一所新型大学。她继承的是延安抗大传统，实际上也就是一所干部培训学校。1950年3月，即在重庆解放还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就正式筹办，4月就招收第一期学员。

这些学员入学以后，绝大多数人都表现了

渴望学习、积极投身于革命熔炉、进行自我思想改造的政治热情。但是那位新来的、有些异样的学员，情绪似乎一直就不很好，对人对事常常是一副冷漠神态，始终保持着某种不卑不亢的沉默，有时显得拘谨，在拘谨中又不时会流露出几分矜持与傲慢。

这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人呢？翻阅他的入学登记表，只知道他名叫邓蜀平，籍贯是四川广安，家庭出身是地主，而在社会关系和个人经历的栏目中都填写得很笼统，简直可以说是模糊不清。单凭这样一些简单的文字资料，自然是无法弄清楚他究竟是怎样的人。

告状挨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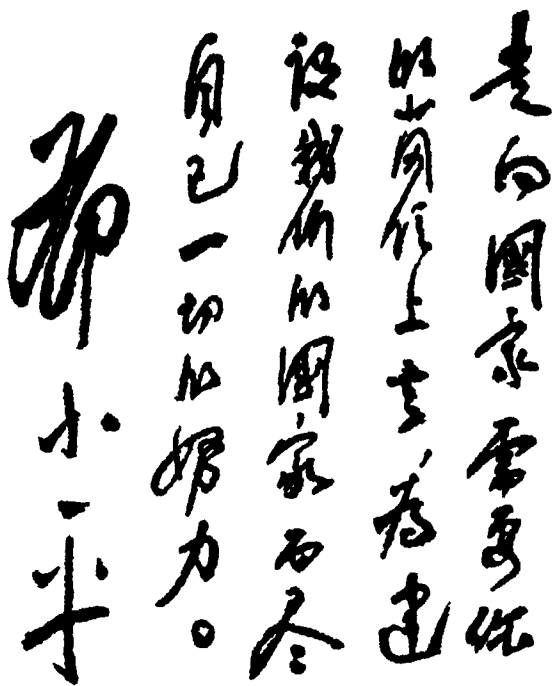
西南革大办学之初，条件十分简陋，生活也相当艰苦。数千名师生员工聚居在重庆市郊化龙桥一侧的山坡上，住的房屋大半是简易平房，且很拥挤。听课只能聚集在大操场上，用扩音器扬声。每个学员还必须坐着小马扎将笔记本放在膝盖上做笔记，笔记的详略和正误，课后要互相检查核对，并作为学习是否积极的评价标准之一。日常生活管理是半军事化的，不仅有严格作息时间，而且小组会、大组会、班会不断地轮流召开，充分体现了八字“校训”中的“紧张”要求。还有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就是要经常下山到嘉陵江边码头去搬运粮食和煤炭。这或许是为了节省经费，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培养学员的劳动观点。因为建立劳动观点正是革大培养人才的宗旨和目标之一。因此，数千人的吃饭烧煤，大部分都要由学员直接运

输到位,距离虽只有 2000 米左右,但一路都是坡坡坎坎,完全是负重爬山,其艰巨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学员中绝大多数过去都是所谓“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的知识分子,这艰苦的劳动,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生理上都是对学员们的严峻考验。不久我们就发现,这革大的学习与生活条件对于邓蜀平这个学员来说似乎是更难以承受的。虽然各项活动他都参加了,但其精神情绪却总是显得压抑,落寞的神态中隐含着某种难以言说的苦痛和烦恼。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我们这个班的班主任是一位从老区来的工农干部,他为人爽直,办事认真,有很多优点,但也有一个很大缺点,就是毛泽东曾经批评过的那种“傲视知识分子”的自我“优越感”。尤其是对于那些旧知识分子味道较多的学员,几乎有一种本能的傲视甚至厌恶,同他们说话往往是态度生硬,批评他们的缺点时,则近乎粗暴的训诫。每当这时,我们便会看到邓蜀平的表情尤其复杂,在无奈中还隐含着某种抗拒的心态。

然而没有过多久,邓蜀平的表现却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还是比较沉默,但脸色却平和开朗多了。小组会、大组会也能听到他偶尔的发言,发言的基调和语气也平和了许多,即使是向班里或是别的什么人提意见,那态度也较过去诚恳和亲切,而不再有愤懑和牢骚的意味。参加重体力劳动时,虽然仍旧有难以承受的压力,但从情绪上可以看出已不单只是沉重和苦恼,而是在无奈中又增添了几分咬牙坚持的意志力。

关注每一个学员的思想动态和实际表现,是我们作为工作人员的重要职责。邓蜀平的变化,当然也引起了我们的重视。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学员的现实表现及其思想的波动起伏,而且还要把这个学员的现实表现同他的经历联系起来,并找出其间的某种因果关系。因此,考察和审查每个学员的历史情况也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有时,历史情况甚至比现实表现更为重要。一个历史不清楚、尚有疑点的人,是连分配工作也很困难的,这在解放初期尤其如此。

经过了解,邓蜀平的变化及其谜底很快就被揭开了,有关他的一些情况已基本被我们所掌握。原来他的确是一个有特殊背景的人物: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西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是他的亲哥哥。他是被“照顾”选送到西南革大来学习的。邓家在川北广安县虽不是豪门巨富,但也算是一户拥有不少土地的殷实人家。邓小平早年就远走异国他乡参加革命,他的兄弟姐妹中也有较早接受革命影响而参加革命的,如邓垦当时已经成了一位革命领导干部。但也还有一些人一直留守在家乡的土地上,继承祖业并臣服于四川军阀统治之下,这位邓蜀平就是其中之一。而且,他还完全不是一介平民,而是在当地有一定影响的,甚至被认为是一位能够呼风唤雨的人物,他参加过在当地很有势力的帮会组织,被人称为“袍哥”大爷。他在当地说话办事,就是国民党的县太爷也不能不给他点面子。当然,由于邓小平的存在和积极影响,邓蜀平在家乡也未做过过分出格的坏事。但他的地主和“袍哥大爷”的双重身分,也早就注定了他的社会定位。不过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加上当地地下



邓小平为西南革大第一期毕业学员题词

党组织的不断提示,使他在同类人物中最早获得了“觉醒”,远在解放军入川之前,就已经主动放弃对农民的剥削,并尽可能地做了一些救困扶贫的善事,赢得了开明人士的声誉。当重庆解放时,他顺利地离开川北老家而来到重庆。他既有上述的特殊背景,又有相当的文化,年纪也不算大,把他送到革命大学学习改造,允许他参加革命工作,给他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就算是“照顾”,于情于理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于是,他就成了我们西南革大的第一期学员。

然而邓蜀平也正因为有那样的特殊背景,多少年来在家乡又一直处于颐指气使的社会地位,过着养尊处优的富裕生活,进入革命大学之后,不仅要过艰苦的生活,而且要被严格管理,被不断教训,这就使他很不习惯,很不舒服,很难接受,很不满意了。因此,他便利用一个星期天,进城跑到西南局去找领导。他要把对革大的生活与工作的所有不满意意见都统统向领导告上一状,以抒发心中的怨天尤人之气。或许是有所顾忌,又或许是邓小平同志正好不在,他便直接找到了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主席、同时兼任西南革大校长的刘伯承同志,一古脑儿将自己对校方的各种意见以及自己所感受到的种种“委屈”向刘伯承同志诉说了一番。但他却不曾想到,刘伯承校长不但没有“虚心”接受他的意见,同情他所受的“委屈”,相反地却严厉地把他批评一顿。了解他的历史底细和思想问题所在的刘校长当时对他说的一番话大意是:你应该好好在革大学习,接受改造,争取以后做一个合格的干部,你不要闹意见,发牢骚。你如果不愿意在革大接受改造,经受考验,那就让你再回到川北老家去,看看当地农民怎么教育改造你,你好好想想吧。

考验合格

刘伯承校长的这一番话果然厉害,使邓蜀平真正认清了自己的处境和前景,并迫使他迅速醒悟过来。他从西南局“挨批”回到革大后,

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出现了我们在前面说到的“很大变化”。此后便不声不响,循规蹈矩,做他一切该做的事,说他一切该说的话,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在思想上和生活上,都让人感到他是在认真地接受改造,不断争取进步了。

革大的学习期限实际是短暂而容易度过的。5月中旬正式开学,9月上旬便正式结业分配工作了。毕业分配对每一个学员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在“一切都由组织安排”的人事体制下,一次分配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去向甚至是终身命运。每个人当然都十分重视。西南革大第一期学员的分配方案是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需要,由上级有关部门统一制定并经领导机关批准。在总数近6000名毕业学员中,约有五分之三的人要分到城市,参加党政机关和财经、文教以及其他系统工作。另有五分之一的人则要分到各地农村去参加减租退押、征粮以及基层单位工作。不用说,这两种分配去向的差别是巨大的。这不单是指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环境,而且由于当时西南各地刚解放不久,农村,特别是一些边远地区的农村还相当混乱:既有恶霸地主的暗中捣乱破坏,更有土匪和兵痞一类的反动武装公开反抗人民政府,抢劫人民财产,杀害基层干部。因此分配到农村去的学员要面临严峻考验,包括生命安全的考验。分配时要求学员服从革命需要,接受组织分配,做好思想准备等。每个人的具体分配,则是由基层干部经过研究并报经上级批准。经过了上述程序之后,组织上便通知每个人的具体去向。

巧的是,为全校学员做毕业分配总动员报告的正是邓小平同志。他在毕业典礼大会上以《到实际工作中去接受考验》为题向广大学员发出号召。

据我的印象,邓蜀平的分配似乎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更没有听说有什么人为他打过招呼,而是综合他的各方面情况,认为像他这样的人,更需要也更应该首先到农村去经受锻炼、接受考验。邓蜀平本人并没有提出任何特殊的要求,一切都很自然,一经宣布分配结果

之后,他也就同绝大多数学员一样,告别重庆这座大城市,奔向了新的岗位。

邓蜀平去的地方是贵州东南部的独山县。这里山高路险,邻近广西,不仅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很落后,而且当时匪患猖獗。著名的十万大山匪巢距此就很近。大约一年之后,从贵州传来的消息说,革大的毕业学员在那里的表现都很不错。还有几位在剿匪斗争中壮烈牺牲了。至于邓蜀平,听说表现也很好,已经担任一个镇的镇长,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干部了。

在劫难逃

西南革大只办了三年多一点时间。由于形势的发展和对干部的需要不断变化,革大培训干部的任务也随之不断变化。每一期招收的学员对象和培训要求也就各不相同,到1953年下半年就基本结束了革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些革大的工作人员也就风流云散,各自走向了新的工作岗位。有关革大各期毕业学员的情况,包括邓蜀平在内,从此也就音讯全无了。

直到20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期,我从北京到贵州的一所大学去任教。在省城,我遇见了两位当年在西南革大的同事,顺便就向他们问起了一些当年被分配到贵州去的学员情况。关于邓蜀平,他们说他一直在贵州工作,表现也一直较好。大概是由于他的那种“特殊背景”吧,后来被当作“民主人士”而受到了重用,当过郎岱的副县长,后又调任六盘水特区的六枝市副市长。“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突然掀起后,以邓蜀平的特殊经历和地位,自然是在劫难逃的。况且,邓小平在“文革”前期一直被定为党内第二号的“走资派”。邓蜀平的离开川北老家以及后来的参加学习,安排工作,获得“重用”等等自然都被看作是邓小平“包庇”的结果。邓小平既成了过江的泥菩萨,自身难保,邓蜀平在贵州那个偏僻地区就更是被斗得死去活来。到最后,他就干脆“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了。

听了这些情况的介绍后,不免令人唏嘘。

在“文革”那个有理说不清的年代,他受到牵连,面临残酷的批斗,遭遇生理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他被迫选择死亡也许更适合于他的性格。

但他大概不曾想到,数年之后的邓小平又会东山再起,并重新开创了一片新的历史天地。真是命运无常,人生难测。邓蜀平若泉下有知,真不知该作何感想。

附记:写作此文时,虽也查了一些资料,但主要还是根据我个人的记忆。所记也许有个别不准确之处,如有知情者指正,谨在此预先致谢。
(责任编辑 方 实)

人民文摘

欢迎订阅2002年《人民文摘》

(PEOPLE'S DIGEST)

《人民文摘》杂志由人民日报社主管

《人民文摘》杂志是学习类时政性综合文摘刊物。

《人民文摘》是人民日报社主管的以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学习类时政性综合文摘刊物。

《人民文摘》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党员理论修养,反映最新改革动态,传播前沿科技信息。

《人民文摘》为16开64个页码,彩色封面,国际标准印刷,本刊辟有《一月大事》、《部委信息》、《理论前沿》、《时代观察》、《决策参考》、《国情研究》、《思想美文》、《以史为镜》、《领导艺术》、《新知视窗》、《海外政坛》、《健康休闲》等栏目,是

学习理论、交流思想、传播信息、获取知识的重要园地。

《人民文摘》注重导向性、前沿性、艺术性、趣味性,博采报刊信息精华,供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决策时参考阅读。

《人民文摘》依托《人民日报》,拥有高素质的编辑队伍,坚持多视角、多层面地为广大读者服务的办刊思想,努力使文章短小精辟、生动鲜活。

《人民文摘》月刊邮发代号为2—641,订阅费每期5.00元,全年订阅费为60元。各地读者可到当地邮局订阅,也可直接向本刊出版发行部订阅,填写清楚回执单,与订刊费同时分别邮寄。《人民文摘》发行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路2号人民日报社出版社,邮编100733。开户行:农行朝阳区团结湖分理处;账号:8010369—69;户名:《人民文摘》杂志社。

联系人:王晓雯 李 杰

电话:(010)65092108 65091833

传真:(010)65091508

解放前夕谢筱迺 在福州做地下工作

● 许翰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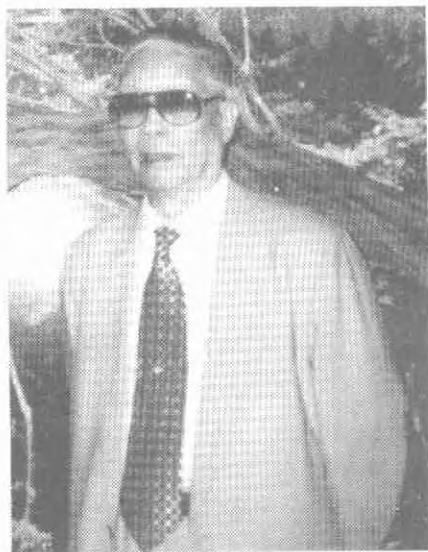
1949年,在福州解放前夕,中共中央社会部遵照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决定选派多年从事地下秘密工作的谢筱迺为福建特派员,去福州搜集军事情报,做策反统战工作。

谢筱迺接受了这项光荣而又艰巨的秘密任务后,感到无比激动和兴奋,但他深知此行进入虎穴,凶多吉少,要有牺牲的准备,于是就写好遗书,交给领导,并十分坚定地表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冒着生命危险,乔装成一名商人——某公司董事长,化名吴寿康,由上海取道香港,秘密潜入榕城,与华东局派去的地下党员取得联系。他从上海带去的收发报机等通讯工具则通过国民党海军少将叶可钰(我党地下工作者)利用国民党军舰秘密运至榕城。

建立秘密电台向中央发报

谢筱迺潜入福州后,住在万寿桥边一号——教会的青年会里。青年会办有高级宾馆、西餐厅等等设施,是一处便于隐蔽的地点。谢筱迺的联系人蔡训忠是当地渔会会长,也是他的掩护人。这个秘密地点只有蔡训忠一人知道,并由他亲自向谢筱迺传递、汇报情况。青年会这个秘密点的建立就成为中共中央社会部派驻福建开展秘密斗争的指挥部。

谢筱迺懂英语,善交际,一身西装革履,戴着茶色眼镜以此掩盖他的身份。为了掩护他的秘密活动,给他创造必要的、又可遮人耳目的工作条件,便调配了一个可靠的人为他拉黄包



车,进进出出都以黄包车代步,俨然“大阔少”的派头。

丁日初原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地下党员。1948年夏回到福州。他的公开身份为福建合作金库经理,主要任务搞策反,建电台。其父丁超伍为国民党福建省参议会议长。丁日初利用此特殊关系在福州开展工作。谢筱迺便将电台安置在丁家新盖的一座楼房的小阁楼里。

党中央派来协助谢筱迺工作的报务员姜平也住在丁家。晚上,他们三人在小阁楼里频繁地向党中央调试发报。红色电波飞越夜空,迅速传向北京,使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华东局三野司令部对闽省敌情乃至整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敌人的军事部署了如指掌。

国民党兵败向南撤退,此时已成惊弓之鸟,他们在福州地区严密设防,我秘密电波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在这隐蔽斗争的严峻时刻,我打入福州戒严司令部的情报人员将特务机关要出动搜查电台的消息告诉了他的联系人蔡学仁(蔡训忠之子,我地下工作者),蔡迅速通知了谢筱迺。得此消息后,谢当即停止发报。一天,丁日初发现他家的一只狼狗被人毒死了,觉察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谢筱迺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临危不惧,处事不惊,他依靠当地党的秘密工作者和革命群众,立刻将电台搬到蔡训忠家。后来恐蔡家不安全,又将电台转移到西湖边一条小胡同内、两

面竖有高墙、环境比较隐蔽的叶可钰的深宅大院,把秘密电台藏在叶家的厕所里。

国民党特务机关经过侦察,知道共产党派来了一个搞情报的负责人,还带来了电台,但始终未能找到他——谢筱迺隐藏的地方。而我秘密电台数易其地,却躲过了国民党的追查搜捕,始终坚守阵地,继续向中央发报……

开展策反统战工作

谢筱迺在福州,一方面择点建立秘密电台向中央发报,另一方面积极开展策反统战工作。他初来乍到,地方不熟,不会讲福州话,对他的工作造成一定的困难。但他想到党中央毛主席交给他这个光荣而重要的任务,便努力学地方语言,在交友中边做边学。他晚间外出活动,与几个单线联系的同志或朋友,在一幢名为“百合”的澡堂子里碰头,借洗澡之机搜集情报,通报情况,布置工作。由于他机敏灵活地积极工作,在不长的时间,与民盟、民革等地下民主党派的上层人物以及当地的县长等实权派都有所接触。他通过这些社会关系,找到并深入警察、特务部门进行策反统战工作。

解放战争进展神速,我人民解放军涤荡顽敌势如破竹,依附于国民党的一些人眼看国民党军难于抵挡,心里恐慌了,想为自己留一条后路。曾与叶飞同时入党、后背叛革命当了叛徒的王××,探知谢筱迺来了福州,他通过民主党派某人的关系求见谢筱迺。王是国民党军统调查室主任,福州最大的特务头子。谢筱迺认为这不是一桩小事,便发电请示中央。毛主席说,叛徒回头革命也欢迎嘛。

谢筱迺与王见面时,向他交了几条政策:一不许轰炸;二不许带走文件;三不许杀害政治犯,要保护城市。

谢筱迺在福州的一个主要秘密联系人是国民党福州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吴石将军,这是党中央交给谢筱迺的重要线索。吴石是黄埔时期周恩来的故旧,是周恩来直接联系的非同一般的关系。吴在广州、武汉、重庆等地与周恩来有过接触,对周的才学、智慧和高风亮节十分崇

敬。也正是在周恩来的影响下,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深刻的认识,对蒋介石倒行逆施的反动政策甚为不满。

秘密造访吴石将军

吴石原是国民党军中资深将领,抗战时期任第四战区参谋长,后任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解放战争期间吴曾秘密为我党工作,在我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以及上海战役中都为我军取得的胜利做出重大贡献。吴本人不抽烟,会喝酒,擅骑马,爱好书法,敬慕林则徐等历代爱国志士,并喜读他们的诗词,对《孙子兵法》颇有研究。他钻研兵学,曾当过兵学教官,著有《孙子兵法研究》、《兵学词典》等书,堪称为国民党军中一名儒将。

1949年初,吴石任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局长时,蒋介石就钦定他为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据吴石当年的随从参谋王强回忆:1948年冬,国民党迫于我大军压境,不得不考虑从南京撤退。而国防部尚有500箱国民党军事当局非常重视的档案资料,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直运台湾。吴石(当时任史政局长)建议说,国共和谈在即,可能划江而治。如划江而治,这批档案资料运至台湾再运回南京不太方便,不如运往福州,届时需运回南京也方便,若要运至台湾,两地只一水之隔也不难。吴石以他的睿智多谋说服了国民党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吴石将军为何要提这个建议呢?王强说:我后来才知道,吴石将军已预知他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在福州起义,将这批军事机要悉数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500箱军事机要于1948年12月下旬从南京用专列运往上海,再由国民党联勤总部调用“中南号”军舰运至福州马尾港。翌年元旦由王强等几人秘密押送至戚公祠。吴石将军命王强要日夜严加守卫,以后他又以寄管为名,将其中298箱最重要的机要档案悄悄地运往由地下民主党派成员掌管的福州研修院书库。

吴石热爱他的家乡,不忍心福州在战争中被夷为平地。他说,如果家乡被摧毁,惨遭涂炭,

有朝一日我回到家乡则愧对乡亲，愧对福州的老百姓。为此，他正为何时起义以配合福州的解放在竭思谋虑。

谢筱迺与吴石将军单线联系。在短短几个月里，他们俩人接触频繁，谢筱迺将秘密造访吴石获得的重要情报，如国民党南京大撤退后的军事部署、番号、军队驻扎地点，有关福州绥靖公署整个战区防御作战形势等极其重要的军事情报火速报送中央。

一天，谢筱迺秘密来到吴石公馆。以往周恩来与吴石有过多次接触，并亲自做他的工作；而吴石出于对周恩来的友情和信任，只恐周恩来未能看见他提供的重要情报，便问谢筱迺：周恩来能看见吗？谢筱迺当然不能只简单说能或不能。他告诉吴石，北京的领导人毛、刘、周、朱都看到了，他按北京的回电说，中央要我问吴先生，有一个番号要核对一下。吴石听了谢的话，立刻明白了，也放心了。

不能忘记的朋友

同年8月14日，台湾总统府侍从室主任奉蒋介石手谕，拍来急电命吴石将军携家眷乘专机速回台北。这飞越台湾海峡的电报好像从天空降下不祥的预兆，吴石感到最高当局对他已有所怀疑。他于15日在公馆里召见王强并对他说，我明天（16日）要回台北，这边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要按照我的命令保管好这些军事机要。我想你会知道怎么处理的，你应当尽到一个军人的天职……王强追随吴石多年，对吴的心意早有领会，他含泪向吴石将军行了个军礼：请长官放心，我明白了。

福州刚解放不几天，王强便按照吴石将军的命令和地下民主党派人士刘风、王学民接上了头，将298箱最重要的军事机要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管会，实现了老长官的愿望。50年过去了，这批军事机要经有关专家鉴定，至今仍具有相当高的价值。

吴石将军由福州赴台后，蒋介石表面上加以抚慰，安排他出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但却受到了严密监视，失去了人身自由。1950年6

月9日蒋介石以“通共”罪将他枪杀，临刑时，吴石将军从容就义，时年57岁。

周恩来总理1975年病重期间，对有关人员动情而又郑重地嘱咐：我们不能忘记帮助过我们的台湾那边的朋友，其中提到两个人，一个是张学良，一个是吴石。我中央人民政府于1975年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毛泽东有感于吴石的凛然大义，在他提供的一份情报上慨然题写了以下的诗句：

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
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党中央毛主席致电嘉奖

福州战役打响之前，华东局为加强策反统战工作，派闽浙赣省委委员苏华秘密进入福州，建立秘密联络点。她与谢筱迺等秘密工作者取得联系，互相配合，深入基层做群众工作。闽江是重要的水上运输补给线，谢筱迺协助地下党发动船工保护船只，防止敌人破坏，秘密地为我党传递有关材料，输送情报人员，运输战略物资；同时组织工人、学生、职工等广大群众护厂、护校，守卫粮库、银行、电厂等重要设施，尽最大可能防止国民党军溃退时进行破坏而造成混乱。

谢筱迺与地下党进行深入的策反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福州警察局连同分布在市区的4个警察分局600余人愿弃暗投明，共同签字发动起义归顺我方。当8月17日我解放大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进入城区时，人们惊讶地发现在街巷维持秩序的竟是昨天国民党的警察，不禁感慨地说：真是新鲜事，国民党的旧警察也解放了。国民党军溃退时阴谋要炸毁贯通福州南北的大桥——万寿桥，也保住了，它确保了我解放大军顺利过江，追歼南逃之敌。

福州解放了，饱受苦难的榕城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欢欣鼓舞。以谢筱迺为主要负责人的地下秘密工作者为福州的解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党中央、毛主席闻讯后十分高兴，立即致电嘉奖。

（责任编辑 舒元璋）

徐杰舜教授如是说：

汉族是一个越滚越大越结实的雪球

● 孟凡夏 刘振贵

汉民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文化最独特的民族。可是说来令人惊讶，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对这个泱泱大族的研究却少得可怜。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前，学者们对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有了研究的专著，唯有对汉族没有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与这个大族在中国和世界的地位相称的专著；中国有不少研究少数民族的刊物，唯独没有研究汉族的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也没有专门研究汉族的机构……这种情况，引起了一位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学者的注意，他在汉民族研究的园地里耕耘不息，他就是目前担任广西民族学院汉民族研究中心主任的徐杰舜教授。

20 世纪 60 年代毕业于武汉中南民族学院历史系的徐杰舜，被分配在浙江武义县一所中学教历史。武义在浙江中部半山区，是一个汉族聚居地。由于周围群山阻隔，封闭的环境，使这里保存了古老的汉民族风俗习惯，居民在为人处事、衣食住行、婚丧喜庆乃至语言上，都很独特。仅语言，20 万人口的武义县竟有三种差别很大的汉语土话，这一切，是徐杰舜这位生长在大城市的汉族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武义独特的风俗民情，引起了深深的思考：汉民族是怎样形成、发展的？汉民族的特征是什么？汉民族为什么拥有这么多人口……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徐杰舜不受混乱形势的影响，一头钻进了学校的图书馆和县图书馆，他把 30 年代以来出版的有关研究民族历史的学术著作看了个遍。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



徐杰舜教授

代和 50 年代初，有过一些关于汉族起源的讨论文章，却是众说纷纭，甚至有人说汉族来源于古埃及、巴比伦、印度、土耳其的。中国学者梁启超驳斥了汉族外来论，说汉族的源头是土生土长的“诸夏”。但“诸夏”又是在什么时候、何种原因转变成汉族的，梁先生没有交代，后来的人则作出了五六种不同的推测。此外，有些人把研究封建统治成败的二十四史之类，看成是汉民族研究著作的。总之，汉民族研究这个园地，仍然是一块亟待开垦的处女地。

徐杰舜作为一个学习和从事民族史专业的学人，从心底发出了呼喊：我要为泱泱而又煌煌的巨大民族——汉族树碑立传，结束世界上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汉民族没有专史的历

史。

为开拓汉民族研究,徐杰舜踏上了一条漫长而坎坷的路。写一部汉民族专史,要占有大量的资料,古今的、中外的、历史的、现实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地理的、语言的、风俗的、宗教的、民族政策的、民族关系的……这些都不是他本人和一些县、地级图书馆所能提供和解决的。怎么办?想来想去,只有到上海图书馆去。但是,徐杰舜当时月薪仅五十来元,刚能够养家糊口,怎么能筹措经常往返上海的车旅费呢?多亏在县食品公司蛋库工作的妻子徐桂兰,她支持丈夫的事业,出主意让徐杰舜跟随上海来武义运蛋的车去上海。虽然日晒夜露,辛苦些,但可以省掉一笔车费,到上海后投靠一个远房亲戚,睡地铺又省去了住宿费;买不起书就抄书……

在上海图书馆,徐杰舜又得到了馆领导的大力支持,在他既没有带工作证又没有带介绍信的情况下,破例批准他查阅为撰写汉民族史所需的一切资料。徐杰舜在这里如鱼得水,不仅查阅了20世纪初以来中国内地的有关学术著作,还查阅了港台出版的相关学术著作。不仅查阅了近代的书籍,还查阅了有关的古籍文献。徐杰舜第一次去上海的一个月时间,阅读有关书籍50多本,做了卡片3000多张。

此后,徐杰舜在继续广泛阅读有关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的同时,他还曾到武义县周围的金华、永康等12个汉族聚居县进行汉民族风俗调查。在努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勤于思考,埋头写作,历时六年四易其稿,从历史学切入,按民族自身发展的规律,以《汉民族发展史》为题,纵横论述了汉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特征和文化。徐杰舜认为汉族的源头既非“西来”,也非“南来”、“北来”,而是来自远古就生息、繁衍在东临太平洋,西到青藏高原和塔里木盆地,南到云贵高原,北到蒙古高原范围内的东方古人类。他认为汉民族的族源不是单一的“夏”或“诸夏”,而是炎黄和东夷两个主源,苗蛮、戎狄和百越三个支源。他认为汉民族的形成不是在某一个时期一蹴而就,而是从夏代至周代,从春秋时期到秦代,从秦代到西汉

三个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即首先是距今4000多年前起,炎黄、东夷、苗蛮、百越和戎狄诸族,分别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崛起,接着是距今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潮流中,这些民族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汇为一体,融合成一个非夏非商非周非楚非越,又非戎非狄非蛮非苗的华夏民族。接着又在秦汉大一统中,发展、转化成为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汉族。徐杰舜分析,历史上汉族人曾被称为“秦人”、“汉人”、“唐人”乃至“宋人”,汉族之所以以“汉”为族称,是因大一统的汉王国国势统一、繁荣、强盛,国运长久,历时400多年,汉民族到此时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心理素质等方面都已经十分稳定,因而汉人自称或被其他族称为“汉”。秦汉之后,有着较高经济文化水平的汉族,又经多次同化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和周边少数民族,逐渐使汉族发展成为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文化传统连绵不断的大族。徐杰舜还论述了汉民族共同的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素质特征。他分析了汉字对汉民族的凝聚作用和汉语的古今相承关系。他特别指出,没有汉字,就没有汉族。汉民族尽管方言很多,南北东西的汉人相互不能通话,但汉字可以让所有的汉族人沟通交流。

《汉民族发展史》于1992年正式出版。它的出现,成了中国民族史书丛中一个亮点,史学家王地山认为,它“既使国人振奋鼓舞,更启迪人们自审反思,有较强的知识性、系统性、思想性与针对性,是一部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民族学专著”。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王文中研究员认为这本书“为汉民族研究安放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徐杰舜并不满足于已有成就,在他接触并学习人类学之后,它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深入研究汉民族。人类学自20世纪20年代传到中国之后,费孝通、吴文藻等前辈孜孜以求,费先生曾写出过引起轰动的《江村调查》。50年代后这门学科一度在中国受到冷遇,80年代中期趁“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大好时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在费孝通等学者的推动之下,联合举行研讲班,请国内外包括

台湾、香港的著名人类学家前来讲学,人类学很快在中国大陆升温。徐杰舜在广西民族学院领导的支持下,参与研讲。他越学越觉得兴奋,感到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才可以从上而下,由远而近地观察研究汉民族,这才能使他的汉民族研究登上一个新台阶。他在90年代初,就打算驾驭人类学这部“新型耕作机器”,为汉民族另写一部著作。他的想法,得到了包括费孝通先生在内的中外人士的鼓励,费孝通还为他题字支持他。国内外人类学家一般都是以一个小社区、一个小族群来进行人类学分析,像他这样以一个民族,而且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



徐杰舜(左)与费孝通在一起

十多亿人口的世界第一大族为对象来进行分析研究,还是第一次。他划分华南、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南、西北七个人文地理区域对汉族的历史、语言、族群和文化进行动态的人类学分析。在多年研究积累基础上,从1996年开始,徐杰舜与来自许多省市的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组成了一个课题组,两次分别在南宁、上海召开学术研讨会。在研讨中曾有过不同意见,徐杰舜以极大的耐心,反复说明为什么要用人类学理论对汉民族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有什么学术价值,对不同意见的学者作了细心的解释和说服工作。正是有了思想的交锋,观点的撞击,才使大家明确了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汉民族的意义和价值。

在1999年9月9日中国首次举行的探讨人类学本土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每一位中外代表都得到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徐杰舜任主编,十多位学者参与撰写的一百多万言的《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

雪球,以雪花凝聚而成,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滚成一个硕大无朋的雪球。《雪球》,以雪球来形容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雪球》,以宏大的气势,“一览众山小”的眼光,纵论了各不相同文化地理区域汉族从

原始族群到现代汉族族群的历史演变过程,其中有土生土长的华北汉族和西北汉族历经迁出、迁入,以及与人主中原的少数民族融合滚雪球发展的历史;有华中和华东部分百越、苗蛮在秦汉的“大统一”中融合成汉族,其后又迁出、迁入,滚动发展的历史;有汉族迁入华南、西南,融化了当地少数民族,滚动发展的历史……给人们展示了一幅又一幅汉族历史沧桑,在滚雪球中不断发展的雄伟画卷,读来给人以深厚的历史感。

此外,《雪球》还以人类学学者独特的眼光和视角,纵横驰骋,对语言学家们提供的大量语言材料,进行了重组和新的诠释;用人类学关于族群的理论,第一次对庞大而复杂的汉民族的结构作了解剖。

过了一山又一山,徐杰舜近来又起程以更大的热情和更坚定的意志力攀登“中国民族团结研究”这座“大山”了。在中国这个由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构成的国家里,民族团结的历史走向,当前的形势,主要的特点,以及新世纪加强民族团结的战略措施,等等,无疑将是他研究的重点。

(责任编辑 方 隼)

一个平凡的人，一个平凡而又忙于事业的人，一般地说，是不大注意自己生活细节的，瀛生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走进他那不大的平房里，看到的只有床、桌子和书。至于和“现代化”沾边的东西，像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之类，则一概没有。似乎瀛生并不需要它们。在旁人看来好像过着另类生活的瀛生，对这些，早习惯了。“哈哈，现在的生活，已经是很好了。”瀛生欣慰地说。这确实是真的，对瀛生来说，生活中只要有笔、有纸，有馒头、有开水就足够了。

关于瀛生

瀛生是爱新觉罗·瀛生的笔名。爱新觉罗·瀛生，名文蓬，字瀛生。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安吉。瀛生1922年12月出生在日本的横滨市，祖籍是现今的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十三世裔孙，清朝最后一代多罗顺承郡王爱新觉罗·文葵之胞弟。

瀛生194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曾任燕京大学农科助教，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译局、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北京农业大学讲师，高等教育出版社农学编辑室主任，镇江农业机械学院教授。

瀛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十年浩劫中被打成“反革命”，1978年才得以平反。平反后，瀛生先后在商务印书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编辑，参与修订了郑易里编著的《英华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学卷》，参与编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自1951年至今，瀛生撰著和翻译并已正式出版发行的图书已有28部。由于瀛生对百科全书事业做出的贡献，特别受到国家新闻出版总

署的表彰。

20世纪80年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进一步落实。1985年，辽宁省成立了三个满族自治县。

接着，黑龙江省、吉林省和河北省也有了自己的满族自治县。各地的满语研究所、满语研究所也相继成立，大家学习满语的热情日益高涨。这使瀛生看到了希望，更是觉得自己迎来了生命的第二个春天，又能利用自己的专长，为社会多做一些工作了。

瀛生从小就在一个特殊的家庭里生活，所以他始终对满族和满族的文化有着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感。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宣传与研究满族语言文化的工作之中。短短几年间，他就写出了四部满语著作，其中的《满语基础讲义》被台湾满语班采用，作为授课教材，《北京土话中的满语》被社科院满语研究所评为全国首届满语研究优秀成果之一，并被列入《20世纪满语研究重要著作》之中。

瀛生与满语研究

我国历来有隔代修史的传统。目前，整理清史的工作已经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满族统治阶级在我国历史上268年的统治，留下了大量用满文书写的文献资料。人们要系统地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研究清史、东北地方史、沙俄侵华史等都需要利用满语这个工具进行学术上的考证和难点的突破。但是，“若用现有的满语专家去翻译清朝遗存下来的满文档案，至少得需要二百年！”瀛生如是说。其中，不仅道出了如今研究满语人才之奇缺，更反映了满史研究之重要。

平凡而又非凡的瀛生

·
刘路

瀛生还着重强调,现代北京话也与满语有着不解的渊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的北京话中常有这么一句话:“我昨天去来着。”这种表示过去正在进行时的句子,完全是满语的语法结构;这在以前的北京话中是没有的。又比如,北京话中,一句话中的最后一个字往往以轻音结束,“帽子(zì)”,而不说是帽子(zī);吃西瓜(gua),也不能说是吃西瓜(guā)。这些现在已是约定俗成的语言现象,都来源于满语的发音。由此可见,研究满语,不仅对于研究清史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研究现代北京话的起源、流变及发展,也有着同样重要的价值。

满族是我国56个民族中的一个古老民族,源远流长,世居白山黑水之间,先秦时称肃慎,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称靺鞨,辽、宋、元、明时称女真。满语与古时的匈奴语、其后的蒙古语同属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它与属于汉藏语系的汉语不同的是,汉语有四声的变化,阿尔泰语则只有轻重音的变化。由于它长期与北方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密切交往,互相影响,彼此融合,使得北京话在轻重音的语调上也发生了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满语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只有口语而没有文字,只是到了后金时代,满语的文字才由建州女真学者借用蒙古字这种音节文字,一个词一个词地拼写而成。由于当时没有较高的语音学知识,只是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拼写,所以根本不标出重音点,因而流传下来的满语词典中也是没有标出重音的。这也正是满语的书面语与口语的区别所在。

瀛生幼承家训,由时称“同光清语六贤”之一的族伯爱新觉罗·朴厚启蒙,学习满语三年。后拜入同为“六贤”的另一满语专家阿克敦布门下,连续学习满语16年。20世纪40年代初,又从满文翻译专家克敏之学习满、汉文翻译。40年代中期,再拜著名语言学专家罗常培为师,学习古汉语音韵学和西方语音学。

瀛生说,清代后期,满语不再是满族人的母语了。要想学习满语,就必须要到专门的学

校里去学,就像学习外国语一样。由于那时精通满语的师资尚大有人在,所以教学能够正常进行。从辛亥革命后,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懂得这样教学的师资相继辞世,正规的满语教学也随之逐渐消失,书面语遂与口语开始脱节。现在学习满语的学生,只学会了音节的拼读,却不知重音,也不懂音变,所以不可能说出口语来。

对此现状,瀛生焦虑万分。为了能让满语口语的研究后继有人,瀛生从1987年至今,已连续在国际学术交流期刊《满语研究》(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主办,每年一期)上发表介绍满语口语的论文15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能藉此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瀛生曾忧心忡忡地说:“满语如再不受到全面的研究,它就要步古拉丁语后尘了(古拉丁语起源于罗马时代,后被英、法、西等语言取代而消失——笔者)!”

“老北京”情结

一说到“老北京”这三个字,瀛生就无比的兴奋。老北京的琉璃瓦、皇城根、小胡同和老爷车……留给他太多太多的记忆。每每谈起来,你就不难发现瀛生的那份依恋,那份钟情,那份执著。

为此,瀛生不肯闲着,隔不多久,人们就可以在北京的报刊上看到他写的有关北京的趣闻轶事。由于从小就生活在“满汉融合”的环境里,所以他的文章也多与满俗有关。什么老北京婚礼丧礼中的满族习俗啦,老北京口语中的满语啦,老北京小吃中的满族食品啦,不一而足。我喜欢读瀛生的文章,不仅因为文如其人,亲切自然,朴实无华;更重要的是他的文章给人以知识的同时,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市井的习俗,街头的小吃,听瀛生讲来,那都是在讲历史,讲民俗,讲民族的融合,讲文化的积淀。

比如说老北京婚礼中的习俗,送订婚礼品,汉族是男方向女方送衣物和首饰。满族则是男方除了向女方赠酒、肉、衣料、首饰以外,



京,经过加工改进,才逐渐成为了老北京的小吃。

顺便要说的是,瀛生著文否定过“满汉全席”之说。据他说清宫御膳房没有这样的菜谱。20世纪20年代有位在京津献艺的相声名演员艺名叫“万人迷”,他编了一段罗列大量菜名的“贯口”词,名曰《报菜名》,很受听众欢迎,由此有人说这叫“满汉全席”,从此传说至今,竟有人真的充分发挥想象力编出“满汉全席”的菜单来。

总想为社会做些什么

古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明年瀛生就整80岁了。他总是想在有生之年,多为社会做些什么。满语研究是他一生宿愿,那是一日不可懈怠的;他又是北京文史馆馆员,文史馆的事不能不积极。去年他想到了他的后事,想到没了这口气还可为生命科学做最后的贡献。经过多方奔走,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公证处、北京市红十字会,与他的母校北京大学达成了捐献遗体的协议:逝世后将遗体交北京大学医学部解剖学及组织学胚胎学系作为大体解剖学(解剖学)和显微解剖学(组织学)的学习和研究材料,并将遗骨制成人体骨骼标本(骨架),供师生进行骨学教学和学习之用。

瀛生在拿到北京大学医学部990279号捐献遗体登记书、北京市[2000]京证内字第5918号公证书、北京市红十字会2000年11月17日发出的证书后,才真正安下心来:他为自己找到了自己认为是最好的归宿。

瀛生实在是一位平凡而非凡的人。

(责任编辑 洛松)

还要送荷包和如意。荷包源自狩猎者,本来是出猎时系于腰带以盛什物的小袋,后来成为满族服饰;如意原本不是满俗,但清代皇帝向大臣赐物以如意为贵,故如意进入满俗之内。这是满汉二俗在互相融合中仍然保留了各自特点的地方。可也有一些满俗完全进入了北京的婚俗里,比如说喜轿一进男家门,过火盆、过马鞍,新郎对轿射三支箭,则完全是女真族的旧俗了。

说到烹调,瀛生更是津津乐道。他说其实“砂锅居”是道地的满族风味菜馆。“砂锅居”的煮肉分为两类,一类是不经烧烤,直接将肉用白水煮,称为白肉;一类是先将肉用炭火微烤,然后入水煮,煮成的肉称为胡肉,肘子称为胡肘。“川菜”中的“连锅汤”和“回锅肉”,就是由“砂锅居”的煮白肉发展而来的,只是四川“回锅肉”加了豆瓣而已。为什么四川菜里有白肉呢?追根溯源,那还是当年驻防四川的满蒙旗人将这个吃法带去的。四川人很讲究烹调,将白肉加工改进,遂使“回锅肉”等菜成为川菜名味。走遍全国,讲究吃白肉的只有北京、四川和东北三省。

还有小吃,像炒肝儿、灌肠、面茶这些小吃,都是满族食品。这些食品由满族人带到北



我为在玉田的朝鲜慰安妇作证

●
刘大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却密令侵华日军不准向坚持敌后英勇抗日的八路军缴枪投降,实行蒋敌伪合流。我们冀热辽军区的八路军奉延安总部朱总司令的命令,向东北挺进,收复京山线上的敌占据点,消灭拒不投降的日伪军。9月20日夜,我军向盘踞在玉田县城内的日军独立第八旅团赖谷胜治大队和1600多名伪军展开了进攻。

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我军英勇奋战,终于从城的东南角突破了敌人防御并迅速扩大战果,到21日上午,大部伪军已被我消灭,只剩下赖谷胜治指挥着手下350多名日军龟缩在玉田南城牆下东侧的日本兵营内,凭着坚固的工事负隅顽抗。

我当时和尖兵剧社的火线工作组,跟随分区参谋长肖全夫和攻城主力部队第十四团政委赵靖远登上距日军兵营最近的一座民宅的屋顶观察敌情。日军隐蔽在大大小小的地堡炮楼中,各种兵器不时地向外射击。数十名穿着短衣长裙的朝鲜妇女被从屋内赶出来,在院子里为日军充当活的掩体……从熟悉敌情的侦察员口中得知,这些妇女都是被迫征来做慰安妇的。平日,她们受尽了日本兵的欺凌,此刻,她们又被日本兵用作迟滞八路军进攻的挡箭牌。

日军的无耻行径,激起了我军指战员的愤怒,赵靖远政委一面命令我们用日语喊话命令敌人投降,安慰朝鲜妇女卧倒不要乱跑;一面和团长布署部队从两侧突入日军院内。在我军的刺刀面前,日军终于举手投降,赖谷胜治和他指挥的三百多名日军做了我军的俘虏,数十名朝鲜慰安妇也得到了解放。

敌人投降了,我们火线工作组的工作也由战场宣传鼓动转为押解看管日军俘虏,我们令被俘的日军徒手在玉田县城牆的南牆跟下站好队,准备把他们押解到城北的一座庙宇改成的学校关押时,赖谷胜治却向我们提了一个让我们实在无法想象的要求,他居然提出他们这群俘虏能否不走大街和鼓楼城中心,而是出南城门,经过城外人烟稀少的地方到城北俘虏营去。

赵靖远政委听了这个无理的要求,义正辞严地指着赖谷胜治和全体日军俘虏大声说道:“日本侵略中国八年了,杀了我们多少同胞,烧了我们多少房屋,抢走了我们多少财富,今天,你们被正义之师彻底打败了,这是你们应得的下场。我们八路军不虐待俘虏,不侮辱人格,但你们必须认罪,听我军的指挥,按我们指定的路线走,我们就是要让玉田的老百姓亲眼看看侵略者的下场……”

平时这些耀武扬威、荷枪实弹在玉田大街上横冲直撞为非作歹的日本兵,今日在我军武装押解下,低着头徒手灰溜溜地从南大街经鼓楼等玉田主要街道向俘虏营走去,沿途人民情不自禁地欢呼着,跳跃着,发自肺腑地高喊:“中国万岁!”“我们胜利了!”“八路军、共产党好样的!”。

把日军俘虏押到俘虏营后,我又受此次战斗指挥员、军区副司令员詹才芳和政治部主任李中权的指派,到俘虏营执行一个任务,责令赖谷胜治给唐山日本驻屯军司令写信,促其投降。

赖谷胜治和他们属下的中队长们,穿着已撕去军衔标识的军装挤坐在屋中的土炕上,我坐在八仙桌旁一张木椅上,原赖谷部队的小翻译——大连金县一个十六七岁的小青年,站在炕前的桌旁毕恭毕敬地把我的话翻译给赖谷听。我对这个小翻译说,八路军不虐待俘虏,让他坐在炕沿上翻译,可是,当赖谷胜治通过他向我回话之时,他又立刻“哈伊,哈伊”地站起来,垂手听赖谷讲话。我当即打断赖谷对小翻译说:“你是中国人,你坐下和赖谷说话。”小翻译听着我严厉而又对其有所关怀的语调,惶恐而又悲伤地对我说:“我被日本人欺压太久了,从小受日本奴化教育……”我告诉他:“我们就要去解放东北三千万同胞,作为中国人应该庆祝自己的解放,你要很快醒悟过来,从现在起你要挺直了腰板和赖谷说话。”

赖谷胜治按我军指令,给唐山日本驻军司令部写完了信,小翻译把信翻译给我听,赖谷在信中如实地介绍了他们妄图顽抗待援,后

在八路军英勇攻击下不得不投降的经过,并劝他们也早日放下武器为好。我认为赖谷的信写得还老实,出于宽待俘虏的原因,我在结束谈话之前,问了一句,你们被俘后还有什么要求?万万也没有想到,赖谷胜治又提了一个令正常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要求:即要求我们把原在他们军营里“军中乐园”的朝鲜妇女也送来,同他们住在一起,好解决他们日本兵的性生活需要……

我听着这个世上极其罕见的无耻、无知、无赖、无理的要求,怒不可遏地拍案而起,我愤慨地指着赖谷胜治痛斥道:“你们吞并朝鲜,掠夺我东北,发动了侵华战争,挑起了太平洋大战,犯下了滔天大罪。你们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奸淫和平人民,又逼着朝鲜妇女做你们的慰安妇。你们的‘军中乐园’是可耻的、罪恶的。在炮火中,你们驱赶这些可怜的朝鲜妇女在院子里做你们的掩体;你们交了枪,成了俘虏,竟然还妄想着找她们寻欢作乐,你们真是要做死不悔改的强盗么?告诉你们,被你们践踏的朝鲜妇女被我们解放了,我们将安排帮助她们早日回到朝鲜去同家人团聚。她们再要看到你们,一定会清算你们的罪行!”

我越说越怒,声音也越来越高,赖谷被我痛斥得从炕上跳下来,立正站在地上,僵硬地弯着腰,不断地“哈伊”“哈伊”。

55年过去了,战败的日本政府至今不肯痛快地道歉认罪,在“慰安妇”问题上,竟胡说“慰安妇”是为了赚钱自愿随军的妓女,拒不认罪,不赔偿。

在日寇制造九一八事变70周年到来的日子里,我以亲历和目击证人的身份,写出战争年代日本法西斯奴役朝鲜“慰安妇”的这一例,目的是告诉善良正直的人们,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卷土重来,不要让世界灾难重演。也正告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略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历史早已做过证明。

(写于2001年8月21日)

(责任编辑 洛松)

庆祝 《炎黄春秋》 创刊十周年



大吉图 王俊英作

王俊英作



小猫戏蝶图
庆祝炎黄春秋创刊
十周年 李默闻作

胡守庭作

李默闻作

爱新觉罗·梦玉作

骑南幽人踪
独行君子德
大
彼林心胡为久吾侧
爱新觉罗·梦玉



富貴神倦

庆祝
炎黄春秋
创刊
十周年
纪念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戴罪功臣林则徐

为宪政流血的“第一人”宋教仁

茅盾在作协往事

顶着风浪为武训辩护的郝瑞琛

邓小平之弟邓蜀平的故事

国内统一刊号:CN11-2581/K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元

ISSN 1003-1170



010>

9 771003 117002